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33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新燕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7.625 印张 150 千字

199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

ISBN 7-80023-136-4 / K · 170

定 价: 2.95 元

# 目 录

## 文 献

- 西安事变前我党就联合抗日问题与张、杨  
部联络谈判的一组文电 ..... ( 1 )

## 回 忆 录

- 平山土改与整党 ..... 冯文彬( 18 )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 ..... 周巍峙( 52 )

## 人 物 介 绍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明方  
..... 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111)

## 专 题 资 料

- 1956年国务院体制会议介绍 ..... 李 兵(131)



史实考证

关于中共陕北建党时间的考辨 ..... 高中哲等(151)

大事记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

.....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76)

丛书编辑组

# 西安事变前我党就联合抗日问题 与张、杨部联络谈判的 一组文电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  
关于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订立口头协定之内容致各军电

(1936年3月5日)

林、聂、朱、徐、程、郭、刘、宋、阎、蔡、罗迈、  
云逸、洪涛、理治、劲光<sup>①</sup>诸同志：

甲、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如下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3月5日开始执行。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

\*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指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朱理治、肖劲光。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郿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四、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郿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出白区办货可着便衣。

乙、两省<sup>①</sup>苏、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郿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支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且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说明方法，应用口头传达，不得出布告，因为此种协定对于蒋介石还要保守秘密。

特达。

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博古

3月5日

---

<sup>①</sup> 指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设置的陕北区、陕甘省。

##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

### 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sup>\*</sup>

(1936年4月10日)

张、毛、彭：

甲、与张<sup>①</sup>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如下：

A、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sup>②</sup>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

B、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同。但他认为方面军<sup>③</sup>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向绥远解决德王，以绥远为根据，靠近外蒙；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sup>④</sup>平汉路西的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活动。

C、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D、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

---

\*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指张学良。

② 指蒋介石。

③ 指红一方面军。

④ 指河北省南部。

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

E、派代表赴友邦，他的由欧洲去，我们派人他可送至新疆，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F、他再不进剿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sup>①</sup>电说他隔岸观火。原意先取关中，并筑直罗、邠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臣<sup>②</sup>则由宜川出延长、延川。最后决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邓城<sup>③</sup>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令陈先瑞向蓝田、雒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邠、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有），如此推延一月，看情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G、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代办并可送弹药。

H、彼此互派一得力人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色彩不浓的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sup>④</sup>因太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

（甲）张驻洛川与他电台另约通电。五台已被人注意，将停止通电。

（乙）阙尊民由沪经张处来苏区，与他谈甚投机，今晨随我们进来。

周

---

① 指阎锡山。

② 即杨虎城。

③ 系澄城之误。

④ 即李克农。



## 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sup>\*</sup>

(1936年9月1日)

毛主席

周副主席：

我廿六日到，卅晚见王菊人，于正式谈话一次，杨<sup>1</sup>定明（二）晚见面，与王谈各重要问题如下：

一、近杨正觉形势急迫，急欲与我谈，要与建立交通，故对我方所提初步实现之协定完全同意并具体决定如下：

1. 互不侵犯。渠表示过去即已实际执行，但民团方面则未能做到，因不能直接命令，现可完全接近我意，以训练为名将各地民团分别集中于指定地点抑制其活动。即有个别问题亦必保障不使继续（此点经我再谈亦认尽力做到不使发生个别问题）与发生。不组保甲。渠部队主力集结郿县以南，延安、延长一带，只以最少数作警戒与掩饰性质，并为更利于接近我方及交通保障，拟调阎<sup>③</sup>团（警二团），但恐孙蔚如生怀疑，故阎虽已收领任务但尚在省未去，欲再考虑最后决定。

2. 通商与取消经济封锁。渠亦表示过去事实上未封

---

\*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写件刊印。标题为编者所加。

1 指杨虎城。

2 指闫揆要。

锁过，但惜未建立与我正式交通关系；现先派定二人专负此责，前面驻一人，西京驻一人，同时我们亦派定二人分驻前后。渠原欲以五辆汽车，因车夫缺，暂以二辆汽车专供交通用，较好的汽车夫已找到一个，欲请我方亦找一个，以免发生意外。除此作我通商办法外，所有驻地允群众自由经营出入，但不欲公开组织自由市场，恐过于公开。初则欲将前面交通站不设延安，而以郃县或太白镇，这一方面后再三谈已允在肤施。

3. 双方联络，允立即做，并希双方军事情报密切确实，不带宣传性（此点渠未指明何种宣传性，我面述及我军事情报素来确切而不虚伪，对友军作实情通报性质，即一般政治宣传亦无不根据事实发表——此点拟在与杨见面正式确定时再申述），渠愿将蒋<sup>①</sup>方一切军情就知者告我。

二、渠提出杨以目前政治形势之急迫（意指绥与桂），不以上达〔述〕三项协定为满足，提拟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杨并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请与我、张、杨<sup>②</sup>三方会议解决（他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在谈上述三项初步协定之先）。据我观察，渠欲以此试探我方军事行动及张与我关系，和有无背他处。我当答复：杨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议发动，我方甚为欣喜。愿杨能提出具体意见。但第一，我、杨双方尚无合作前提（意指上述三项初步协定）与共同意志在事实上的表征，希能脚踏实地真诚做

---

① 指蒋介石。

② 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

出，不徒空〔谈〕。第二，对张方情形我不清楚，对关系第三者情事似非单方可以解决。如真有此种情势与发展到此必要时，当由各方共同会议筹划。届时或有四五方、六七方面亦未可知。但我均无事实根据，尤在此时我、杨双方尚未有初步、明确协定，前提似觉尚谈不到，而不便作徒空推测。彼曾为此争辩，杨方早有诚意与事实证明，而认我无诚意与合作，后仍融洽。

三、其他，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问题，均谈及。我除根据党的策略表示我们意见外，并建议杨即须有自己政治组织，巩固自己部队和防止法西斯分子侵入。渠表示接受，一月前已有过开始工作，但无效果。

四、因为杨胆子很小，对交通人才必须灵活而慎重，且在东北军无关系之人。如果内面有更好的人请重新派来，如没有再好的，则请以王立人负责（因刘向三似应付与慎重上尚差一些），并将两条交通线严密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以免意外，而因小失大，一面致杨对我方之轻视与不敢。并请立即派定此人。

汽车夫如能找出亦请迅派来，但我当尽力要他们设法，这是为适应胆小者的慎重，望注意。

五、我明（二）晚与杨见面后，当作详细的整个报告。就现在情况，我们初步提议是不成问题可以解决实现的。但其所说“军事发动”、“整个军事行动意见”则不过欲徒提空言，摸我动向，避我与他冲突，我拟适应彼之情绪与要求，除实现初步协定外，并作进一步的推动。

杜<sup>①</sup>等其他方面与人物，尚须稍等时日（不过一两天）才能活动，因恐其发觉我关系多故。

六、以上请提示，如认为有重要点应立即提示者，望以电报指示。

—完—

致以

胜利的礼！

再，目前时局上亦望随时提出要点。

张 文 彬

9月1日晚

### 毛泽东致孙蔚如信 \*

(1936年9月3日)

蔚如军长勋鉴：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以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

---

① 指杜斌丞。

\* 本文及附件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标题是编者加的。孙蔚如，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於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另付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sup>①</sup>，并祈省察，匆此顺颂勋祺。

虎城先生即此致意。

弟 毛泽东敬启

9月3日

附：周子健给任弼时的报告  
及毛泽东的批示  
(1945年2、3月)

任弼时同志：

(一) 杜斌丞已於二十三日返西安，高桂滋亦陪同来

---

<sup>①</sup> 指中共中央 1936 年 8 月 25 日《致中国国民党书》。



此。高、孙<sup>①</sup>日内赴渝受训。据彼称：高、孙及此间各友好，均主张在现时情况下，回西安为宜。孙事前曾向胡宗南询问当局之意见，胡担保无事。故未便作返里之行。杜行前曾致我方一信，未知收到否。

(二) 据杜老说，孙对我方态度近有转变。彼过去谈到我们时总认为是不守信义，与缺乏作为之一群。彼与杜谈到我们时，承认我们有办法，只有我们才能将中国的事办好。杜当时即问孙：为什么改变过去的看法？孙即举了河南战事前后情形，以作说明。他说：蒋<sup>②</sup>的军队在河南，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到处遭受老百姓的反对。我们（四集团军）亦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因此亦不大拥护我们。可是，共产党到了后，能很快将老百姓组织起来，收复失地取得人民的真正拥护。同时，他们答应不到我们防区活动，而能守信，这是我过去从没有看到过的。

周子健 丑感<sup>③</sup>

王、戴：<sup>④</sup>

请你们约束部下，勿侵犯孙慰如部利益，并和孙部妥为联络交好。

毛<sup>⑤</sup> 寅冬<sup>⑥</sup>

---

① 指高桂滋、孙蔚如。

② 指蒋鼎文。

③ 指2月27日。

④ 指王树声、戴季英。

⑤ 毛泽东。

⑥ 指3月2日。

## 张文彬给毛泽东的报告 \*

(1936年9月8日)

毛主席：

九月一日报告谅已收阅，兹将以后情形及结果续报如下：

一、卅一晚与王菊人谈话后，杨<sup>1</sup>曾托病拒见。（小病有）据从旁考察，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sup>2</sup>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六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二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七日又根据与杨谈结果，与王、崔<sup>3</sup>二人更具体商定各实行办法，兹分别叙述如下：

甲：抗日合作口头协定的具体决定：

1、互不侵犯。

A、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行动上取消敌对行动。

B、杨负责抑制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

---

\*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写件刊印。标题是编者加的。

① 指杨虎城。

② 指蒋介石。

③ 指王菊人、崔孟博。

织的地方组织保甲。

C、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

A、设专门贸易站，在十七路掩护下保障苏方国家贸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众的自由通商。

C、苏方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驻军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3、建立军事联络。

A、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除将本部属行动通报外，并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

B、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

以上各项经我首先提出后，杨即发言大意谓：各项均能同意，双方意见均无冲突处。七日与王、崔的具体商定如下：

1、十七路现尚未接防，将以十七师王<sup>①</sup>旅驻最前线，旅部将在邠州<sup>②</sup>，肤施及其以北到潘龙<sup>③</sup>止，均以最少部队营连分驻（潘龙是否驻还不定），十七路主力均在邠州以南，以备有事。整个部署俟决定后当再电告。

2、民团将以消极的集中训练统一指挥名义严密纪律

---

① 指王劲哉。

② 即邠县（今富县）。

③ 即蟠龙镇。

等抑制其活动，积极的方式是改造其个别不听从指挥者。（这对巩固杨在民团中的指挥都有关系，故他愿意如此做）保甲组织以目前部队无政训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将来如有政训处也不致成大问题，至少可以采用东北军所用过的方法去抑制。

3、交通地点他们以在鄜州为好，我因离苏区太远，决在肤施及到甘泉的侧翼，由他、我各派二人，以副官名义前后各驻一个，办理货物转运。至于人员的来往，另外由人负责以更谨慎。

4、电台可立即设立，只等你们把新约好的呼号密码收到通知我们以便开始联络。（林院到此时即已将呼号送来，谅已收到）

#### 乙、其它问题

杨、王谈话中均曾提出下列问题：

1、因为十七路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我答与南京应付是需要的，但必须努力实际的抗日准备和防止并打击蒋的破坏阴谋。）

2、杨表示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意即怕我们挖其墙脚，要他变红军。（我答，我方从未有此企图，不过愿其立即成为坚强的抗日友军，并建议他立即进行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抗日纲领和自己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起来。）

3、杨希望我方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争，则对于国际援助也可以。并云，根据地最好在甘、宁、陕。我观察彼害怕我们夺他的陕西地盘以及派队入陕。又

杨以前与林院也谈过陕南富足，红军最好在该〔地〕创立苏区。又王菊人前以侦察的口气向我说，将来红军最好以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等，都是不愿我侵入他的地盘意。如系恐怕蒋介石进攻而要我派兵入陕南，则他问题的提法不会如此，而整个的意见与上面1、2各题都不会如此。——我答复是对杨此意当转告毛、周，同时说明根据地是重要的，是已有的。并且在抗日根据地不一定要成为蒋区才可，只要是抗日友军所在地都可完成，故国际援助不同问题，至于红军所处地位与发展方向，都将根据友军联络及敌人情形决定，至于各地游击战争，多由当地群众自发斗争，非可制止。

4、渠又问及国际援助问题，他表示怕目前不可能，又害怕只给红军的援助和如何援助。（我答目前已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方式与方法则当按具体情形决定。）

5、杨又表示西北要张<sup>①</sup>领导，但感张部复杂，有法西〔斯〕、有汉奸分子，张亦为继父业，非经艰苦经营，恐有不可靠处。（我以为他在此有两种意义，一是要慎重乘机，一是要侦察我与张究有何种关系。我的答复是对张本人及部队情形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国条件，有许多条件足以改变的，并愿杨根据本人革命历史和意志，及共处西北利害相关应倍力推动。）

6、杨提出三方会议及合组各方抗日政治核心组织问

---

① 张学良。



题。(我认为他是表示，一面是拒绝我们党的组织和侦察我、张间有无共同组织。同时他也确有欲组织各方政治核心成分的。故我答这很重要，当代转，并希从各方推动促此成功。)

#### 丁〔丙〕、两个重要问题

一、杨感觉部队无政治组织，又处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接近我们的情形下，害怕我们的组织打入。故拟拉些非驴非马的人进行他们所谓独立政治组织，和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据从王菊人谈话中露出将以蒲子政、吴华之<sup>①</sup>、宋文梅等人组织一工作委员会，首先在蒲城开办训练班，着手政治组织，而以警备二团（阎<sup>②</sup>团）驻蒲城保护。

查蒲子政，又名蒲克敏，蒲城人，大革命时代曾是党员，是右派张慕陶的干部，现在西安。

吴华之是皖人，1927年曾与潘子理<sup>③</sup>同任过陕西党的省委，大革命失败时被捕，为杨虎城释放并送美国留学。1932年曾到莫斯科见过党的负责人，是张慕陶的健将，现在上海。

宋文梅，也是张的干部。金敏生<sup>④</sup>近被调任上校参议，即〔由〕宋文梅继任卫士营（宪兵营名义改了）营长。

---

① 即吴化之。

② 指阎揆要。

③ 即潘自力。

④ 即金闽生。

(潘子理闻在四方面军，王菊人曾向我要求调潘回十七路，望注意考察此人。)

这一工委会无一真接近我方的人，王、杨尚未正式向我提出，但他表示将带蒲与我见面，我拟表示不过问他们内部组织与改选问题，但站在民族革命及友军立场上愿他们有一真正抗日的组织，有真正而纯粹的抗日人才，最好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或可向王、杨单独表示，须注意张慕陶曾出卖吉鸿昌之事，以引起其注意。

据王菊人谈，杨因病重（有点心脏病与虫牙痛）拟到青岛、北平或上海休养几个月，但未作决定。这样杨似欲借养病避开难关，暂观情势。

我以为如果他实际上能做抗日准备工作及实行口头协定，则无甚么问题，故拟约其决定离前与之谈话，并表示不能因渠之离开有损友谊的前进，望其在实际上加强自己抗日与防止敌人破坏的准备工作。

二、我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抓紧他们已允诺的各项实际求做到。本来要林院进来，拟等二天，待汽车弄好及电台架好，并带着他们到前面去建立交通站的人和部队中必要的动员等去以便立即开始做，而免他们迟延。

三、以上各项问题我的观察和答复是否错误？特别是口头初步协定，是否妥当？应如何求得实现，并推向前进？对于蒲、吴等组织工委及活动问题，及共同抗日组织问题，杨如真休养去的工作方针问题，等等都应如何处置？望详细指示。并望根据新的形势给我新的指示！

交通站人员望速决定两个人来，这些人要更灵活慎重

而在东北军没有什么熟人就好，因为杨胆子很小，很怕生枝叶。

(蒲、吴等人情形，如有人知道详情亦望告我。)

敬礼!

职

文 斌<sup>①</sup>

9月8日

---

<sup>①</sup> 即张文彬。

# 平山土改与整党

冯文彬

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和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已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还有人对此缺乏了解，认为土地会议前后的整党和给干部办训练班是“整干部”“搬石头”。我根据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撰写了此文，介绍了土地会议前后，我在平山参加土改与整党的一些实际情况，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 (一) 奉命赴平山

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北平山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研究部署在解放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的问题。少奇经晋绥解放区，于四月下旬到达晋察冀。

少奇走后不久，任弼时来信通知我们中央青委从绥德去平山参加土地会议，并指示要我在会上讲结合土改进行建团的工作。我由陕北绥德出发过黄河前往晋察冀。当时，正值晋察冀开展土改复查的工作。前一阶段，晋察冀

土地改革不够彻底，这次土改复查，又受到周围解放区“左”的影响比较大。那时，中央派康生、陈伯达到晋绥进行土改考察工作。他们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把干部统统作为土改障碍的“石头”搬掉。搞什么划成分要“查三代”，宣扬什么“贫雇农坐天下，说啥是啥”，出现了到处批斗地主、开明士绅，将地主“扫地出门”以及乱打乱杀等现象。晋察冀在土地复查中也传播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在批斗地主时，乱打乱杀的现象亦比较严重。我们沿途看到打死人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尸体吊在树上，惨不忍睹。我见到少奇，向他汇报了沿途看到的情况。少奇对土改复查中打死人的现象非常气愤，叫我立即打电话叫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同志来，当面严厉地批评了这种过火的行为，要求立即纠正。

冀晋区党委于5月30日召开会议，根据少奇的指示，总结与检查了土地复查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会上指出，半个月来的土地复查工作，时间虽短，乱子很大，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错误主要表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提出所谓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挖底财，分浮财”的口号，打击面广，把斗地主同反干部贪污，作风问题等都混淆起来，搞得人心慌慌，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据统计，土地复查中出现严重打死人的，波及河北七八个县几十万人，仅平山县在5月18日到20日的三天当中，即打死了一百多人。王平和刘澜涛在会上总结了这次土地复查的教训。指出，今后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走群众路线一定犯错误，在土改中，右的过多照顾，左的侵犯都是脱



离群众。干部长期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群众，不了解情况，工作带有很大盲目性。对这次错误应立刻纠正。

土改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心问题是要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真正能得到土地，对地主要斗争，对其反攻倒算要坚决反击，但绝不允许随便打人，要进行说理斗争更不能随便打死人。

在纠正晋察冀土地复查的“左”倾错误过程中，少奇在积极进行着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工作。他电示各地领导要认真调查研究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来土改运动中的问题，各阶层群众的反应与要求。他反复思考，如何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而制定一个较“五四指示”更为完备、彻底的土改大纲。为获得基层土改的实践经验，少奇决定在土地会议召开前，在晋察冀平山县和建屏县各搞一个土改试点。中央工委从组织部、青委、新华社抽调了三十余人，组成土改工作团，由钱俊瑞任建屏县工作团长，我任平山县工作团长，后来又兼任了平山县委书记。

约于5月下旬，平山土改工作团先在平山县封城村，进行土改试点工作。开始阶段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各区土地复查的汇报。重点了解了封城村的情况。对党支部进行了初步整顿，并调查了土地占有情况。

平山县是一个包括解放了两年半的半老区和解放了十年以上的老区县。一般均经过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及1946年的土改。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已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真正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已不多。主要存

在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彻底，不公平，特别是占有较多和较好土地的，不少是党员干部家庭和“三三制”的党外人士。而贫农、雇农及部分中农的土地一般都是旱地、山坡地，水田和好地很少，再加上干部长期形成的强迫命令、官僚作风，多吃多占的现象较为普遍，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不满。也有少数村的支部领导，是被混入党内的少数不法地富分子及作风有严重问题的党员所掌握，他们利用职权、欺压群众、贪污财物、为非作歹，干群矛盾很尖锐。还有干部队伍里多存在严重的宗派情绪，往往各拉一派，争权夺利，致使一部分村里党内外群众中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以上这些都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的矛盾和阻力，这些问题在封城村表现的就很典型。

封城村党支部是 1937 年冬建立的。由地主王禄子任支书。抗战时期，支部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及干部的成份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贫农、中农成份的党员在增加。但支部的实权却一直掌握在以王禄子为首的地富分子手中。王禄子虽然当支书只到 1939 年，但直到 1946 年他还是支委（他长期分别担任过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工作团进驻封城以后，王禄子虽已不再担任支委了，但实际上他还操纵着支部。经土改工作团调查，从所掌握的材料看，封城党支部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 1、在五月土地复查中，支部瞒着县上派去的人，私自开会讨论要杀三个人。他们在工作团进村后，公开反对工作团，封锁消息，破坏土改，向党员布置不要向工作团说实话，不要向工作团和群众坦白。

2、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严重不纯，个别人已丧失了党员的立场。有的党员干部公开庇护王禄子，郃吉曾亲自对王禄子讲“你不吃紧，谁敢打你，我早布置了，会上要打起来，我先打死他们（指群众）几个。”

3、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拟假特务名单，打击迫害反对他们的群众。凡不满他们的群众，他们就给戴上“国特”（即国民党特务）的帽子。

4、私分土改胜利果实。一个富农党员干部在1946年土改时为自己私分了两亩地；另一名富农党员干部私分了三万六千元。

5、利用职权，贪污公粮公款。封城村的公粮、公款全由党员干部掌握。封城村有一个合作社，干部强迫群众入股，筹集资金，但却不为群众服务。合作社完全被少数党员干部控制。王禄子等利用合作社公开贪污，他们可以随意“借”合作社的钱用，而群众不能用。有一名干部一人挪用合作社公款达三万五千元，挪用商业税九千元。王禄子在坦白书中讲：“我们掌握政权，常和郃吉等人吃喝，就发生了贪污。民国34年春上，和王文禄等六人贪污了建屏县粮站上的公粮，一共有麦子十几石。”

6、群众负担重。封城村的人民群众负担主要有三项：第一，统累税。1941年以前农村实行的合理负担，主要征收对象为地富，1941年实行统累税后，按人头算，扩大了负担面，减轻了地富负担，加重了贫农、中农的负担；第二，勤务。如给烈军属代耕、各种战勤——抬担架、送公粮；妇女做军鞋等。这也是按劳力多少摊

派。多一半都落到了贫农、中农群众身上；第三，村负担。名义上是让村里每人交一定数量的粮、款用于村里的集体福利，但多数都被干部贪污、浪费掉了。

从对封城村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要真正发动群众，搞好土改，不首先下功夫整顿党的组织，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土改工作团在听取平山县各区汇报中，除了了解到上述普遍存在的干部问题外，还了解到基层区干部及群众对我党的土改政策，思想认识很模糊，政策界限不清，有些区干部讲：“咱晋察冀的领导不是右就是左，刚把地主斗了几天，又要扭转，手又软了。”许多人对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清楚，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胜利果实上，对于如何才能消灭封建剥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都想的不多。对下一步应如何做，思想上更是茫然。在中央工委、少奇领导下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全面总结了《五四指示》发布以来土地改革的成績和问题，研究了下一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 (二) 参加土地会议

1947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刘少奇的信中部署了半年内中央工委的工作。明确指示“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



事，就是很大成绩。”<sup>①</sup>遵照中央的这一指示，少奇带病加紧全国土地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到七月上旬，召开土地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少奇7月10日给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当时，少奇、朱德、康生、董老已到平山工委所在地。各地代表也陆续到了平山。华北大多数地委均有代表一人。会议代表人数到齐约有一百多人。会议将在中央工委直接领导下进行。会议印发的主要参考文件为：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若干文件。会议准备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情况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解决问题。少奇同志指出：“会议问题将涉及很广，我们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sup>②</sup>中央于7月27日对少奇的报告作了指示，同意土地会议的进行方法，特别提出“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sup>③</sup>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开幕。会议开始阶段集中用半个多月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少奇与土地会议主席团分别与晋冀鲁豫、晋察冀等地代表进行了座谈。了解了前一阶段土改中各地普遍存在的问

---

① 毛泽东致朱德、刘少奇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② 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准备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12日）

③ 中央关于在土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1947年7月27日）

题。综合各地情况可以看出，广大农民群众最为迫切的要求首先是土地和民主权利，其次是要求负担公平。由于我们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党内干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与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对群众不负责任，强迫命令、自私贪污，甚至欺压群众，致使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不能得到满足。少奇说这是前一阶段晋察冀和其他地方土改不能彻底，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

会议在汇报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了讨论，分析研究的阶段。少奇经过反复考虑，针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初步设想。他说：“两月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的条件。”<sup>①</sup>少奇预计到要达到改造党政民组织和干部，真正树立民主作风，将要经历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必将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果断地指出“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sup>②</sup>为此，少奇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供主席团及会议讨论，同时上报中央：

---

① 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1947年8月14日)

② 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1947年8月14日)



第一、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一切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完全忠实和正确的执行，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

第二、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全国农民总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政府公粮、预算、征兵、征夫计划等，经农民代表会通过后再实行。经农民代表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官僚主义，树立雇贫农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地位。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

第三、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和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集会自由等权力，监督、鉴定、选举与罢免自己的勤务员——各级干部，反对干部非法侵犯人民权利及压迫人民，并对过去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适当自我批评；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监督、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的决定，为人民作长工，党员要严格遵守纪律。

第四、根据地党员是秘密的，有些地方群众要求党员公开，并要求由农会或贫农组介绍党员，此要求可以接受，无害处。巩固区的党可以公开。

第五、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土改期间，必须劝告家属接受农民要求，不得反抗群众。他们除特许者外，不要在本县、本区工作。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侵犯人民权利，作假报告欺骗上级，封锁上级人员了解情况，威胁报复群众，破坏党群关系，隐瞒自己成份与历史或隐瞒

其他党员的非法行为等，须受到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第六、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要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调查审讯，做出结论。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和大会逼供等行为。

第七、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及犯罪干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方针。

会议除集中讨论了土改中的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外，在后期集中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主要是关于平分土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新华社8月2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引起的。社论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新形势下，我党的土地政策要由减租减息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消灭封建。少奇读了这篇社论后，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就平分土地问题集中进行讨论。他说，过去我们的会议没有集中力量讨论政策，大家注意力所集中的是党内问题，注意党内问题，政策问题被忽视了，这是不大好的。讨论中，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这样做办法简单，能较快进行。可减少地主的抵抗，坏干部想趁机钻空子，多占果实的可能性也可以减少，中农的不安也可减少。少奇讲，平分土地“从理论上讲这是更好的，更彻底的消灭封建的办法”<sup>①</sup>。平分土地的缺点是可能要从上中农那里抽换一部分土地。但总体看来，平分土地还是利多

---

<sup>①</sup> 刘少奇在土地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9月4日）

害少，得益者在老区可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不动者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在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是在总结《五四指示》以来一年多的土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土地会议所讨论的土地政策的集中体现。《土地法大纲》既肯定了《五四指示》的基本方针，又纠正了某些不彻底性的地方。它明确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对乡村中一切地主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使全乡村人民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对平分土地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土地法大纲》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0月10日党中央向全国公布了这个纲领。

全国土地会议，开了近两个月，到9月13日结束。少奇最后作了总结。在总结中他说：《五四指示》后，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三个，即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的领导。现在，从《土地法大纲》的草案看，政策已彻底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而解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整编队伍就成了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sup>①</sup>

鉴于当时全国的形势，土地会议把重点放在充分发动

---

<sup>①</sup>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

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上，把前一阶段土改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及党内不纯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对于运动中已出现的“左”倾错误认识不够，特别是对“民主整党”“平分土地”这样的重要问题，缺乏明确、细致的政策规定。陈伯达等在会上提出“打倒地主”“在经济上搞的越彻底越好”这样一些“左”的论调，没能引起会议足够的重视。这是土地会议后，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平山县的土改，也受到了土地会议后“左”的影响，但在“公开整党”和“平分土地”中还比较注意掌握政策，并取得了一些经验。

### (三) 公开整党

平分土地和整顿基层党组织，是1947年土改的两项中心任务。这两项任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具体执行中不能将二者机械地割裂开来。实践证明，土改工作团如果机械地规定要先斗地主，后解决干部问题，或先平分土地，后进行民主运动等等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土地会议后，平山县土改工作团根据土地会议后中工委的指示和各地的实际情况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向广大群众全面宣传土地会议的精神，解释土地法大纲中所规定的各项土地政策，组织广大贫苦农民诉苦，挖穷根，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划清界限，分清敌我。在群众开始发动的基础上，普遍地组织起贫农团和新农会，建立了从乡到县的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了全县 80% 以上的农民群众，做好平分土地的各种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在基层党的支部有计划地开始了整党的工作。

我们于 1947 年 11 月 19 日，正式向全县各区委发出了《关于除障碍，整顿队伍》的整党通知。此通知对全体基层党支部成员提出了这次土改整党的明确要求和纪律：

第一、党员要坚决执行土地法大纲，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彻底实现平分土地，不得阻碍与破坏；

第二、要服从贫农团与农会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不得阻碍；

第三、要忠实向党、向贫农团、农会报告自己的历史、成分及现有财产情况，不得隐瞒作假；

第四、要忠实向党及农民坦白承认自己以往的错误和一切犯罪行为事实，不得隐瞒与互相包庇、违抗；

第五、要积极维护农民的团结，不得有任何挑拨与分裂的企图。

通知对问题比较严重的少数干部的处理提出了原则意见。规定可分批先后停止党籍，先停止与撤消群众最痛恨、对土改障碍最大的党员干部。对过去犯过贪污及压迫农民的中农和贫农党员干部，除特别严重的外，一般宜放在平分土地以后再行处理。通知强调指出，这次整党工作的基本精神，应当是积极争取、分化、改造，要力免单纯的处罚，须知撤职、开除亦是为了分清界限，使中农、贫农出身的干部与党员积极参加土改。

为了进一步统一对公开整党的认识，我们又几次分别



在区委书记会议和各区土改工作人员会上反复阐明公开整党的目的和方针。

关于公开整党的目的，我们提出了四点：

第一、为了恢复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重新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二、为了改造党员的思想与整顿党的组织；

第三、为了推进工作。公开整党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同当前各种工作结合起来，不论是组织队伍也好，平分土地也好，发展生产也好，凡是群众的活动、群众的斗争都能结合，要从各项工作与斗争中去整党，又从整党中来推动各项工作；

第四、为了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与骨干，使党成为乡村中和地富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坚强堡垒。

关于公开整党的方针，我们概括为“分清、争取、教育、团结”这样八个字：

所谓“分清”即是要揭露一切黑暗与错误事实，暴露地主、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的罪恶行为，以分清界限、分清是非、分清主次、首要与盲从、好与坏等等；

所谓“争取、教育”即是在分清中或分清后，凡愿意彻底坦白和改正错误的，一律团结教育，并积极改造其思想；

所谓“团结”即是经过实际斗争中表现积极的、确有改进的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要采取团结的方针，以孤立最少数的顽固分子。在公开整党中，任何只强调分清、斗争的

一面，没有积极争取教育团结的一面都是错误的。

由于各个支部的实际情况不全一样，具体问题与做法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公开整党一般都经历了这么几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党内外的酝酿准备阶段；第二阶段是开门整党阶段；第三阶段是对犯有错误的党员办不同类型训练班的阶段（有人误会为“石头训练班”）。

第一阶段，党内外的酝酿与准备。

首先由工作组召开支部大会，宣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整党纪律要求。党员在党内自报成份，查阶级、查思想；工作组同时在党外向广大群众宣传整党的目的，动员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特别是向有严重错误和问题的少数干部提意见，动员群众消除顾虑。这一阶段，党员的思想还触动不大，有的党员因“关门”清理思想，很不彻底，甚至有的地富党员还想隐瞒自己的问题，蒙混过关。

第二阶段，开门整党。

这是公开整党最重要的一步，具体做法是，由土改工作组公开党的支部，把党员名单交贫农团、新农会，让他们审查，同时召开有广大非党贫农、中农代表参加的党员大会。参加会的党外群众往往超过党员数量的两三倍。党员要在这个大会上，当着群众的面进行思想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使得每个党员的思想、作风、平时的所作所为，在群众对证下，受到清查。群众可以在大会上发表对每个党员的意见和评论，群众可以提出对党员的处理意见。对群众正确的意见，支部当即接受，该表扬的

表扬，该处罚的处罚。这样的整党大会，群众情绪表现的非常热烈，有时会议开一整天，群众都不愿散。有的支部要连续召开数次这样的大会。许多支部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次公开整党的大会上解决了。下面以三区七乡访家庄支部和六区的支部开门整党为例子来说明：

访家庄支部长期以来为姓王的地主、富农分子所操纵。到 1947 年整党时共有党员 46 名，王姓一家就占了 19 个，贫农、中农党员只占少数。这些地主、富农一人党就掌握了大权，村中的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多为他们所控制。这次公开整党，群众发动起来后，在工作团召开的支部大会上，到会的贫农团和新农会代表约有 200 余人，会上群众争相发言，揭发了这个支部地富党员、犯错误的干部从抗战时期直到土地法大纲公布以来的 21 条错误和罪状：不实行减租法令、明减暗不减；实行合理负担上让穷人多拿、富人少拿；造统累税，同样一块地，穷人造一石二，而给党员造八斗；党员干部王友昌在土改时给自己强分了好地二亩八分；动员兵役时，地主党员干部王科先将自己的子侄隐蔽起来，强迫穷人的孩子去顶替；强奸妇女；贪污公粮；土改时不清算真正的地富，却清算了三户顽属贫农、四户富裕中农等等。群众在大会上一边列举着地富党员，犯错误干部们的罪状，一边气愤地叫着坏党员的名子质问，“你也是党员，你入党多少年了？你给群众服了些什么务？”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有问题的干部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党和群众的处分。土改工作组根据群众的要求和

党员干部的错误事实，当场宣布开除了王科民等 4 人的党籍，停止了 36 个地富和坏干部的党籍。而一般中农党员，向群众检查了自己的问题，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吸收他们参加了新农会。

六区的楼斗岗村，干部宗派斗争非常厉害，这个村分成东西两派，历史上就因男女关系问题和地域观念争斗不息，经常挑动群众打群架。两派头子都为群众所痛恨。东派有全村痛恨的富农盖淑亮，西派有全村反对的干部盖顺祥。东派盖淑亮在土改工作团刚到封城村时就活动起来，组织假贫农团、假农会来对抗土改。这次工作组下来，由区委副书记与工作组共同主持群众参加的揭发批判宗派干部的会，并请邻近村乡的群众代表 40 多人也参加会。在大会上，任村支书的盖华坦白出他的后台是盖淑亮，盖迫于群众压力，坦白交待了他以往的错误，他还供出了混在群众中两派的小宗派头子 6 人，这些人都会被叫到台上，让他们面对群众交待问题。区委代表质问他们“闹宗派有利还是分地有利？”他们只好承认闹宗派干扰破坏了平分土地，对不起大家。其他的宗派头头也都当场向群众道了歉。大会明确规定严格的纪律：闹宗派的双方，各自解散自己所掌握的群众，对双方群众都不得有报复行为；今后干部谁再闹宗派，群众检举出来，坚决撤职查办；为人民服务，不能以公报私。经此，闹宗派的楼斗岗村，在三天之内宗派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公开整党，对解决党内不纯，清理干部队伍，解决老大难问题确实成效甚大。



第三阶段，办不同类型的干部训练班。

在公开整党中，各村都清理出一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他们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被停止了党籍，其中有地富分子党员，也有犯有贪污、欺压群众而又坦白不好的党员。这些犯错误的干部，在被停止和开除党籍后，一般表现都比较消极，思想斗争很激烈，有的有不服气情绪，还想继续与群众对抗，也还有个别想不开跳井自杀的。为了减少对土改和整党的阻力，进一步挽救、教育、改造这一批犯了错误的干部，县委决定在公开整党的基础上，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情况，办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训练班。一类是以区为单位办的干部训练班；另一类是由县人民法院办的“土改犯训练班”。给犯错误的干部办训练班，这不是整党的结束，而实际上是整党的继续。

1947年12月12日，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办区村干部训练班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在村中对土改有障碍，人民有顾虑的村干部以及宗派头子，尽量不禁闭为好（犯罪者除外），均可送区上训练半月。”区里办的这种干部训练班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给全体受训干部解除思想包袱，对他们讲明受训的目的在于教育他们，要求他们要好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第二、学习《土地法大纲》和告农民书以及报纸上有关土改和时局的文章，让他们进一步认清形势，了解党的政策；

第三、继续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



风)；

第四、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让他们各自订出一个回村后向群众认错、改错的计划。

受训的干部，开始的抵触情绪较大，牢骚怪话多，也有的有恐慌情绪，认为受训是坐禁闭。经过半月的集中学习、训练，他们思想多数都有了转变。有的受训回村后，挨门挨户向群众道歉，承认错误。群众反映很好，说：你改正了错误，今后就再不斗争你了。二区东望楼村受训干部回去后，积极帮助工作；有的要求再开大会，向群众坦白；有的回村后，群众让他参加了农会，对支前工作很积极，搬运公粮，比一般群众还搬的多；还有在平分土地中，主动帮助群众算账，打算盘。东回舍村一个犯错误的干部，受训后，将自己的错误一件一件都说了出来，很快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西大吾村的宗派头子任诺芳，受训完回村时，在半路上即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大哭了一场，痛下决心不再闹宗派。

除了以区为单位对犯错误党员干部办训练班外，县委还对破坏土改以及整党中清除出的各种严重犯罪的干部，由县人民法院办了“土改犯训练班”。在这次土改、整党中，全县各区村送交人民法院处理的土改犯共有 136 人。他们原来几乎全是干部党员，其中地主、富农成份的占一半，中农、贫农成份的占一半。他们的犯罪事实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武力对抗农民，破坏土改。如北望楼赵寿恒；尤家庄李连丑等；

第二、土改前借干部权力杀害农民者，如中贾壁闫致祥等；

第三、贪污公款、盗窃胜利果实。如一区王宏昌，五区区长温少平等；

第四、欺压农民，强奸妇女，打人罚人给农民任意戴“国特”（即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如二区闫春魁、盖孟吉等人。

这些人集中到县上后，开始都很恐慌。他们在村里都经过了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都受到一定的压力。犯罪重的有些害怕，不知道怎样处置他们；犯罪较轻的，表示愿意好好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土改犯训练班的这些犯罪干部，他们的问题性质都比较严重，不同于前一类干部训练班。考虑到他们中间有一半是贫农中农成份，也有些思想较好的，愿意改正的。因此，我们确定训练班的作法是：首先划清阶级界限，鼓励坦白，弄清事实，分别轻重大小，从思想上分化他们，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

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步，交待政策安定情绪。对他们进行前途教育。只要他们将全部犯罪事实坦白交待清楚，彻底向人民低头认罪，并揭露所知的一切非法活动，是可以宽大处理的，也是有出路的；

第二步，坦白反省。让他们在各自坦白的基础上，向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展开斗争，先在小组会上坦白，再选比较典型的在大会坦白，让大家评论；

第三步，个别谈话。根据每个人坦白的情况和其问题的严重性程度，采取不同的个别谈话方式。对坦白较好的，给以鼓励表扬；对坦白不好的，或抗拒坦白的，就根据所掌握他的材料，进行审讯谈话。最后根据每个人的实际表现、认罪情况及犯罪事实，分别给以不同的处理：对坦白认罪好的，给以宽大处理，通知村贫农团、新农会保回去；犯罪较重，但坦白，认罪好，愿向人民低头，有悔改表现，送县一般干部训练班继续受训，进一步改造教育，使其真正改过自新；最后对那些少数罪恶大的，又坦白不好的，不愿低头认罪的，根据群众意见，由人民法院，依法判罪。

经过这样反复的教育之后，这些犯罪干部的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例如：西王坡村的马玉兰，当初往县上送的时候，群众对他非常痛恨，认为这个人已不可改造了，但经人民法院受训后，坦白认错好，村里将他保回去，一进村，连家都没进，就先到贫农团汇报自己在县城受训坦白的事。

总之，对土改整党中清查出的犯错误和犯罪干部，我们总的方针就是采取多种方式争取教育改造，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团结教育大多数为目的，打击面要尽量小。

平山县结合土改所进行的民主整党，基本上解决了党内不纯的问题。通过民主整党，既教育争取团结了干部的大多数，也改造了一大批犯罪的干部，整党后，广大群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动，有力地推动了平分土地和各项工作

的深入开展。

#### (四) 平分土地

平分土地是 1947 年土改的一项核心任务，是土地法大纲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而制定的一项重大决策。如何完成好平分土地的历史任务，首要的是掌握政策。也就是说要吃透土地会议的精神，好好学习土地法大纲。其次，是要全面了解与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准确掌握各阶层的真实情况，包括阶级成份、人口、土地分布情况，各种人对土改的态度与不同要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做好各阶层群众的发动工作，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平分土地计划，顺利完成平分土地的任务。

土地会议前，土改工作团已先下到封城村进行了一段土改试点。初步掌握了基层的一些实际情况。土地会议后，土改工作团又在封城村先搞了平分土地的试点，比平山县其他村的平分土地早进行了约四个多月。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当然封城的做法有许多还不成熟，还有不少“左”的东西，比如查阶级、定成份、中农抽地等等。但以后各村的平分土地的步骤、做法大致与封城差不多，只是越往后，搞的越细致了，也更符合实际了。平山县的平分土地的高潮是 1948 年春开始的。

为了便于集中研究、学习党的政策，及时总结平分土地中的经验、教训，具体部署平分土地的工作，县委在



1948年1月下旬到2月初，连续召开了两次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平分土地，整顿队伍的一些基本原则。关于平分土地大会决定以村为单位平分，以乡为单位调剂；关于对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浮财问题，大会决定：富裕中农可动员他献地，浮财不动；对地主主要区别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及没落地主。会上明确规定，对恶霸地主，既要没收土地财产，还要斗争他；对一般地主，没收土地留一份财产；对一般富农抽其多余的土地、浮财；至于有贪污的干部叫其退出贪污的果实，不能提高他的成份。第二次县人民代表大会重点讨论了平分土地的计划，办法和一些具体问题。大会讨论，对这些具体问题均作了规定：关于债务问题，决定废除土改前农民的一切债务；地主工商业问题，大会认为要保护、一般不要动，如属于恶霸地主所经营，可由农会接管。

平山县属于老区和半老区，经过历次运动，地富的地已大部分散，真正无地的农户已不多，以往土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公平、不彻底。主要是干部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这是广大群众最为不满的地方。这一点，我们注意到了，在整党中已做了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动员他们在平分土地中，首先带头交出自己多占的土地。不少村，在这次土改中很好地将整党与平分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面组织队伍、一面整党、一面分地，取得很好效果。如五区韩庄就做的比较好。这个村党员干部在历次土改清算中分得的土地都比较多。多占地及贪污的户共49



户，他们多占的土地，水旱地共为 96 亩，数量相当大，在这次平分土地中，大部分干部都拿出了自己多占的地，对平分土地，发动群众都起了很好的作用。由此可见，做好干部的发动工作，是搞好平分土地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回顾平山县平分土地的工作，大致是这样做的：

首先是做好平分土地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是普遍查人口、查土地、查产量、查需要。即所谓的“三查一要”。搞好“三查一要”的调查研究，是搞好平分土地的基础。

查人口，是要调查清楚每户实有人口，包括孤寡、残、烈属、光棍等应予照顾的人数；

查土地，主要是登记、呈报、审查、丈量各户的实有土地数（包括隐瞒的“黑地”，未开的荒地等），弄清每个村所拥有的土地总数；

查产量，主要是根据土地好坏，评定土地的产量，公平合理的评定土地的品质等级；

查需要，即调查各户对土地的需要情况，首先掌握无地和缺地户，然后了解需要调剂好坏土地的户。

“三查”工作非常复杂，需要做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做好“三查”，各村一般都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清查小组、清查委员会，其成员要经民主选举。具体的清查方法一般采取“自报公议”，实地考察，特别是对土地必须要实地丈量，全村分成若干片和小组来清查。由于各村普查工作做的比较细，查出了许多过去被隐瞒的“黑”地，瞒地的多是

干部，也有地富。如温塘村，在查地中，就查出未登记的“黑地”20亩；水碾村，分成十个小组丈量了五天土地，共丈量出47亩“黑地”。

根据“三查”所掌握的情况，算出每户大致的土地平均数，开始分地工作。这项工作一般由分地委员会主持搞。先把地主、富农和干部贪污、多占的地及清查中查出的“黑地”拿出来，用自报公议的办法，分给缺地户和贫困户；然后再在富裕中农、中农及其他农民中互相调剂土地。也就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要动员占有较多土地和好地的农户献出一部分土地，补给少地或差地多的农户，在调剂过程中尽量注意，好坏搭配；水旱地搭配；远近搭配。分好后，向全体农民公布，征求意见，待大家基本同意，即正式贴榜定下来。

平山县平分土地的群众工作，总的看各村进行的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由于农民头脑里所存在的自私、保守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我们部分土改工作组同志掌握政策不严，在分地中，查阶级定成份有订错的；平分土地中，动地面比较大，大部分村里都不同程度地动了中农的地，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相当一部分群众对给地主分和农民一样多的一份地的政策，思想上有些想不通。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县平分土地的群众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统一基层土改工作组的思想认识，根据前一阶段平分土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全县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1948年春节期间，专门召开了二区各乡土改工作组的座

谈会。在这个会上，我们进一步交待了关于平分土地的政策及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明确平分土地的目的。平分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使贫雇农翻身，从理论上讲，就是要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中把生产力解放出来。广大贫雇农获得土地，翻了身，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因此，平分土地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部分群众只顾眼前利益，对单纯斗地主、分浮财很感兴趣，满足于暂时的“勤吃坐穿”对发展生产不太积极。这种思想是很不对头的。这与过去平山几次土地改革闹的不好，分配不公有关。特别是侵犯了一部分勤劳致富的富裕中农的利益，造成一部分群众怕勤劳发家致富，怕将来和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针对这种思想，我们反复强调说明，分地后一定要好好劳动，发展生产，要树立生产致富的新思想，这是党的政策，这次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后，不会再搞土地改革了。我们还指出，分地后要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要搞好副业生产，组织利用各村原有的合作社，要有计划的给农民以信用贷款。

第二、对地主富农的留地问题。向土改干部说明，在平分土地中，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后，必须要给他留一份和其他农民一样的土地，不能给地主、富农只分坏地和少给他们地，给地富留一份地，让其自食其力，给他生活出路，使他生活有保障，这是党的政策，不给他们一份地，他们生活不安定，也影响社会的不安定，这对我们广大贫雇农也不利。

第三、在平分土地中一定要注意团结中农，不要再犯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性错误。我们指出，在平分土地中，要尽量减少动地的面，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调剂土地过程中，中农的土地原则上一般不动。个别富裕中农献出其多余的土地，也完全出于自愿。还特别强调了对富裕中农要作必要的让步，规定了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不超过平均数的 10% 的可以不动；贫雇农缺地不超过 10% 的，可以不补。但由于相当的一部分农民有“打乱平分”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个规定在具体执行中还比较困难，一些贫雇农思想上还一时想不通，不易一下接受，需要在运动中慢慢做说服工作。

第四、平分土地前，开好两个大会，即以乡为单位开好党员大会和无地少地的农民大会。在党员大会上号召党员要起模范作用，自己所占有的多余的地、贪污的地、隐瞒的地，一定要自动拿出来。我们表扬了白塔村平分土地中党员的表现。这个村党员拿出多余地的户占了全村拿地户的 30% 以上，在无地少地的农民大会上，要强调说明平分土地要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指出贫雇农要与中农一道坐天下，天下才巩固。领导思想不能陷入一种孤立的贫雇农路线，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是要团结绝大多数。

春节座谈会后，各村的平分土地工作普遍注意了纠正以往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当然，要彻底纠正，这还需要一个从思想到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这更多的是应由我们负责土改的领导同志来考虑。



## (五) 经验和教训

四顾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工委和少奇直接领导下，在平山县进行土改的这段经历，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土地改革是一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空前激烈的社会变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群众运动。在我党的历史上，这是一件大事。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需要我们从思想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认真的思考和总结。

对于平山土改的得与失，同志们自可从这段历史实践中去分析与研究。我通过对平山土改的简单回顾中，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从历史上看，中央对 1947 年平山土改已有过总结。记得那是在 1948 年 1 月上旬，少奇找了平山附近的四个县委书记来汇报土改工作。四个县有刚解放不久的新区，有解放两年半的半老区，有十年以上的老区。通过汇报，少奇对平山县的土改工作是比较满意的。他说：“以冯文彬领导的平山县，比较正确与完全地执行了土地会议的方针，没有尾巴主义。犯‘左’倾错误也较少，组织了全县人口 80% 以上的广大群众队伍，建立了从乡到县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的发展步骤与规模，也比较地合于我们理想。”他特别强调指出，在老区与半老区的平山，群众运动一般比较广泛热烈，主要原因就是平山土改运动与整党民主运动在半自觉情形下已有初步的结合。那里有较好的



群众路线作风和有步骤有计划地布置与配合了各种工作。<sup>①</sup>

平山县将土改与整党相结合，实践证明，这是在土改运动中解决党内不纯，消除土改的障碍，正确解决干群矛盾，推动土改与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好办法。它既打击了少数长期利用职权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坏干部，清除了一批混入党内的不法地富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又挽救、教育和团结了干部的大多数。有些人认为平山土改，把干部不分好坏通通作为“石头”搬掉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搬石头”的说法，这不是出自上面，而是群众在土改中自发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在土地会议上少奇同志从未讲过整党是“搬石头”。土改工作团也没提出过这个口号。把土改中的民主整党，理解为是“搬石头”整干部，这显然是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误解。我们搬掉的只是少数坏干部和混入党内的地富分子，而对党员干部的大多数，通过整党，办干部训练班等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和争取，而不是抛弃。

当时，土改一开始群众在批斗地主的同时，出现了大批揪斗干部党员的现象，逮捕、吊打，甚至打死干部。干部出现普遍恐慌的现象，逃跑和自杀者亦时有发生。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采取开门整党，给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办训练班的做法，这在当时看，是为了避免干群直接对立，同时也是对受群众冲击的大部分干部的一种保护措施

---

<sup>①</sup> 刘少奇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致毛泽东电（1948年1月18日）

施。少奇说：“我们长期苦闷，总没有找到一个既能满足群众，又能照顾这些党员干部的两全办法，只有现在平山找到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的好处，少奇概括总结了三点：

第一、整党中有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是讲道理，查事实的，非党群众只是来参加，他们虽在受尊敬的情形下有充分作证、说话、提意见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权力在党的会议上打人或胡闹。党既尊敬了非党农民，非党农民就加倍尊敬党内秩序。这样，我们就可以主动地处理干部，而不致陷入群众大会处理干部那种被动过火状态。这就有效而适当地保护了干部党员，如果在群众大会上则无这种保证。

第二、开门整党，请群众参加，这样的会也是群众大会，有群众的充分压力，充分的人证物证，使村中任何人的错误都无法隐瞒，欺骗与狡赖。这种会议有强的领导，能够细心分析人证物证，了解全面情形、党员干部可在会议上说明他们的某些错误是由上级负责者，上级当时就可替他作证，避免群众中单纯片面观察干部的缺点，因而就能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

第三、用这个办法来对待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恐怕也是最适当的。地富出身的干部党员，有许多是作过一些工作的，或不很坏的，用党内动员说服方式要他们交出土地财产，可能会更好些，使他们不去在群众中挨斗。

平山县将土改与整党相结合，这种在老区有效整顿党员干部作风的民主运动，比单纯平分土地，有更广泛的社

会基础与群众条件，贫农、中农及其他群众都赞成。

平山土改与整党的过程中还注意了民主建政的工作。在运动中除组建了贫农团、新农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外，还普遍成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定期议决土改、整党、生产等大事，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整党后，群众与党员能得到进一步的行使。干部一般都表现比较好，不少党员在扩兵、支前等工作中都起了带头作用。

平山土改的经验，少奇向毛泽东及时作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在给各地关于土改与整党指示中，都多次提到了晋察冀平山县的典型经验，他曾指示要把晋察冀平山县的土改整党经验与陕甘宁边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土改经验及山西崞县的平分土地的经验，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他说：“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丰富生动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sup>①</sup>

平山土改的群众运动，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它和其他各地群众运动一样，也不可避免的有其缺点和失误的地方。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随着时局的变化，我们党不断改变着土地政策。而要制定出一套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改政策，这是要有一个历史

---

<sup>①</sup> 毛泽东对山西崞县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948年3月12日）

过程的；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认识与正确执行，也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同人们认识真理一样，总要经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回顾我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确走过不少弯路，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土改过程中曾几次左摇右摆，特别是1947年的全国土改运动，曾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这在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很好反思的。

平山土改中的问题，我看主要也是表现在没有能摆脱当时“左”的影响。这表现在：

第一、运动初期，在干部的处理上，一些区和村的工作组犯有“左”的错误，对基层干部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出现了个别支部党员全部靠边站等现象；

第二、查阶级、定成份，有“查三代”，层层拔高的现象。特别要提到的是把一批勤劳致富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定成富农，扩大了打击面；

第三、平分土地中，动地面比较大，侵犯了相当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出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

土地会议之后，在全国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所出现的“左”倾错误，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中就着重讨论了土改中的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中央1948年1月中旬陆续转发了任弼时《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讲话及重新发布1933年《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等有关文件。各地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基本得到了纠正。但我们的纠正工作对有的问题做的不彻底，如定成



份问题。对“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者，应定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这一条没能严格地执行。平山县按剥削收入占25%的标准，对错划富农做了纠正，但对其浮财的处理，没有按新规定的标准处理，该退浮财的错定户没有给退。这是错误的。为此，华北局后来给平山县委和我来信，严肃地批评了这点。我认为批评是正确的。

对于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失误（主要是“左”倾错误），要客观地历史地去认识、研究。当时，战事很紧急，中央着重考虑的是通过土地改革，普遍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而对各地的土改斗争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关土改的一些重大决策，只能原则地提出，对于土地会议上所涉及的民主整党、定成份、平分土地等重要问题缺乏界限分明的政策规定。土地法大纲的各项政策应如何具体贯彻执行，执行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等等都缺乏具体地研究和部署，特别是对当时土改中已出现的“左”倾错误倾向，没有引起领导应有的重视，少奇在以后的工作总结中曾明确地讲到了这一点。他说，在土地会议前后出现的“左”倾错误，有些与我有些关系，“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sup>①</sup>毛泽东在总结1947年土改中的失误时说“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地（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或者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

---

<sup>①</sup> 刘少奇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他人的经验不重视……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员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sup>①</sup>当然，1947年土改中的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上级领导方面的原因也有基层土改干部方面的原因，也还有群众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从领导方面，从政策的制定和提出者方面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却更为重要。

（刘昌亮执笔，郝一峰协助整理）

---

<sup>①</sup>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

周 巍 峙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和它有着异常深远的历史缘分，我对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它艰巨复杂的斗争历程中，我在它的怀抱里成长并把我的青春献给了它。

1937年8月20日，我和出狱不久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读书生活》杂志主编、著名作家柳湜先生，还有后来写了著名歌词《太行山上》的桂涛声先生，共4人，一同离开上海赶赴华北前线，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李公朴先生做为救国会的代表通过八路军直接和共产党共商抗战。为了宣传全民抗战，9月中旬他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以及阎锡山方面共同商定创办了“全民通讯社”，以救国会名义出面，由李任社长。我即留在太原和沙琴晖同志一起主持全民通讯社的采访、编辑和发行工作。9月初我经太原去大同时，日军已迫近该地，当地政权已瘫痪，军队大都撤退。当时日本军队曾讥讽国民党军队逃得太快，他们赶不上。而我在太原时却见到刚改编的八路军正英姿焕发、纷纷开往华北，我曾多次到火车站迎接和欢送八路军上前线，见到那些刚由

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战士、军官，个个都是那么生气勃勃，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他们见面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还从他们手里要到我梦寐以求的用红、黄、绿有光纸油印的红军歌本。我们全民通讯社多次发出八路军挺进华北和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消息。这些部队中有许多指战员以后就成为晋察冀军区的骨干。我后来也与这些无畏的战士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长期并肩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就必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具有为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雏型的深远意义。晋察冀边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从事斗争和建设的。

## 一、晋察冀文艺队伍的构成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在炮火硝烟中，一支朝气蓬勃的文艺队伍应运而生，前后发展人员近三千（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员）。这些青年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抗日，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战斗在太行、五台、恒山、燕山的崇山峻岭之间，挺进在滹沱、永定、沙河、滦河的广大流域，拼搏在冀中、冀东、辽西的广阔平原。这支文艺队伍创造的晋察冀文艺作品和所进行的文艺工作，是我国近代文艺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支文艺队伍思想先进，作

风朴实，善于克服困难、开创工作，富有自我牺牲精神。

三千文艺战士，除几位年方而立者，皆为“文艺青年”，大的20岁左右，小的仅仅十二三岁。他（她）们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青少年（如歌唱家、演员王昆、电影演员田华、作曲家曹火星等），也有少数原工农红军宣传队的骨干，如抗敌剧社的黄日升、挺进剧社的袁琴谱。有相当一部分是京、津、沪、汉等大城市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是抱着报国之心和追求革命之志而汇集延安又由延安派出，或者径自奔赴晋察冀的。如作家孙犁、杨沫、刘佳等。

可数的几位是早在三十年代就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文化界人士，如文学家、教育家成仿吾，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音乐家吕骥、周巍峙，戏剧家崔嵬、丁里，作家王林，木刻家沃渣等。其中有些过去已有较高知名度，或者作过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

汇集晋察冀的文艺战士，均依其所长、所能，分配在各个文艺团体和文艺教育的岗位上。当时，军队、地方的文化艺术团体、剧社、文工团、宣传队，犹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

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仅1个月零4天，边区就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演出团体——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它开始是由红军宣传员和当地青年学生组成，而后逐渐发展成艺术人员甚多，业务实力甚强，在部队艺术系统中起着带头和示范作用的一个文艺团体。不久，一军分区战线剧社，二军分区七月剧社，三军分区冲

锋剧社，四军分区火线剧社也先后相继成立。

在冀中，1938年初即成立了冀中军区火线剧社，蠡县新世纪剧社和回民支队抗战剧社。同年，冀中各军分区剧社相继成立。火线剧社是冀中大平原最具影响，有着较高艺术水平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抗战剧社是边区少数民族抗日文艺团体，有其特殊贡献。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〇师到达冀中，带来了有着光荣传统的战斗剧社。后来到达冀中的还有东北战地服务团。这些文艺团体在冀中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也为冀中文艺史增添了光荣篇章。

边区抗联群众剧社是由平山县铁血剧社发展而成，深受边区群众称赞。晋东北的大众剧社足迹遍及雁北、北岳。平西军区挺进剧社、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不仅在当地影响广泛，在全边区也是闻名的。

延安革命大本营十分重视晋察冀文艺运动的发展，多次派来规模不等的艺术团体，以支持和推进边区文艺工作。有由周而复等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团；东北干部队的诗歌团体“铁流社”；以雷烨为组长的总政前线记者团；主要成员有汪洋、陈播等的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袁牧之、吴印咸率队的延安电影团等等。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也随妇女儿童代表团来到敌后访问。其中有些同志就留在晋察冀工作了。

1938年底，我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察冀，团员中有抗战前即从事文艺工作的田间、邵子南、方冰、凌子风、贾克、朱星南等诗人和戏剧家。西北战地服务团是



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在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指示下，由丁玲、吴奚如等于8月中筹建成立，它是抗战时期组成的第一个专业人才集中较多、业务门类配置较全，规模较大的抗战文艺工作团体。西战团来到晋察冀对边区文艺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带来了利用民族旧形式表现抗日新内容的丰富经验和新形式，带来了抗战题材的话剧、歌曲、绘画、木刻等多种新艺术，带来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艺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工人、学生文艺运动的革命作风。它创办的多期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为边区培养了大批地方文艺人才；初期为部队剧社举办的专业学习班，使一些青年戏剧、音乐干部的业务能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赞扬西战团“对边区文艺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以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领导苏区文化工作的著名文艺家沙可夫为首的，由一部分三十年代文艺活动中的杰出人才为骨干而组成的华北联大文艺部及联大文工团于1939年9月来到晋察冀后，边区各地造就、培养了众多的文艺骨干，对发展边区的文艺创作、文艺教育，起到了影响深远的重要作用。尤其联大文艺部教员和联大文工团艺术精湛的演出，更受到普遍的赞赏。

值得提及的是，在边区文艺队伍里，存在着几支少年儿童艺术小分队。西战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冀中火线剧社等规模较大的一些团体里，均设有一个儿童演剧队、儿童歌舞队或少年艺术队，人员按文、音、美、剧等专业分成班组，边学习，边工作。西战团、抗敌剧社的儿

童队尚能独立演出整个晚会节目，并被派到各地（包括游击区）完成演出任务。

## 二、党的关怀

边区的文艺工作从萌芽到开花、结果、兴旺发达，自始至终都得到党中央及边区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的深切关怀。早在卢沟桥事变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就对刚刚建立准备开赴前方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丁玲说，西战团“这个工作很重要……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又说：“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只要对抗战有利。”在西战团建团大会上，毛主席亲临致贺，勉励全团同志要继承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要大众化；要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扩大党的影响，争取抗战胜利。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1939 年 7 月 10 日为华北联大、联大文工团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送行时强调指出：“你们到敌人后方去，不但要打日本，还要创造新社会”。

在晋察冀，这支队伍更是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彭真、聂荣臻等领导的爱护和关心。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沿着毛泽东指示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聂荣臻从率部开辟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天起，就把文艺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正如他在第二次艺术节看过《母亲》的演出后所说：“我们的战争是全面的……战斗虽然胜

利，如果在文化上放松，也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他在1942年8月谈到部队文艺工作问题时，强调说：“就是在红军时代那样窄小落后的地方，荒僻闭塞的山野地区，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上，我们虽然没有象今天这样堂皇的篷帐舞台，受着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的限制，但我们仍然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活，有自己的艺术。在艰苦的长征当中，我们同样有演戏，有跳舞，在雪山山上也响着雄壮的歌声”。这些话充分说明他对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怀。

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37年12月抗敌剧社成立时，聂荣臻勉励当时负责同志勇敢地负起重任，发奋工作，并十分令人感动地说：“再困难，我也不调你们的人”。1939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次创作问题座谈会，彭真、聂荣臻均亲自出席并做了重要指示。聂荣臻提出：“我们的作品要求与边区的战斗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希望作家“深入群众之间，多多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和他们的心理”。

聂荣臻要求部队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真正了解战士生活，“真正与战士结合走进伟大斗争中”，写出“真正反映战争的伟大作品”。他指出部队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隔离斗争生活，但还不够丰富，不够深入”。这需要“丰富自己的生活，锻炼自己的修养”，有个努力发展的过程。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努力的方向”。“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你们发展的前途”。

关于如何对文艺作品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

题，聂荣臻也做了重要的讲话，他说：“我对于文化作品的好坏，就从来很少批评，这不是自由主义，因为我们的同志还是在创作的过程。我的批评少，也不是因为今天的创作毫无成就，不值得一评。我们的作品当然也有好的。但我决不说，某人的作品如何伟大，怎样空前绝后，因为这样的批评没有一点好处，过份的夸奖和乱捧一通，是害死人的事情。好的当然应该鼓励他继续前进，但过份的夸扬都会使年轻的作品短命夭折。可是，另一方面，向同志们泼冷水好不好呢？批评作品总是‘一无所成’或‘失却立场’，这也是不好的。固然有些问题，严格地讲起来是立场问题，但我们决不严格的批评，因为这不是作者主观上故意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同志们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如果这样过高的批评，就使人没法工作。我们的批评主要是采取善意的修正的方式，使同志们在工作上有所取舍，求得工作上的渐进。如果开口就是‘政治问题’，闭口就是‘原则问题’，这将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战战兢兢，不敢动手了。我们鼓励同志们大量创作，大胆创作，有缺点就纠正，就是有些成就，也不必特别夸耀”。

彭真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和文艺工作者能够平等相处，不使人紧张。1938年秋，彭真在延安时，就到西北战地服务团来介绍晋察冀边区的情况，鼓励大家到敌后工作。1938年11月，中央决定西战团跟随彭真同志到边区工作，他为了赶到边区开会，走得快，沿途他告诉兵站和有关机关，对西战团要加以照顾。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



十分强调文艺在抗战建国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号召大家摧毁帝国主义的与封建主义旧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为了建设地方文艺事业，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939年他决定把西北战地服务团调离晋察冀军区，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直接领导，在行政上由边区政府领导、管理，使西战团可以专心致志地为地方文艺事业的建设、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和辅导作出更好的贡献。

彭真常常看戏，有时突然钻到由幕布或芦席围起来的演剧“后台”看望大家，和大家交谈，赞扬戏剧创作和演员的表演，问起大家的生活情况，使人受到鼓舞，感到亲切。他在1941年初就回延安参加“七大”去了。后来有不少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见到彭真时，都象见到久别的亲人，十分激动。聂荣臻后来也回到延安开会，他还特地向毛泽东引见了我和西战团的部分同志，介绍西战团在前方的工作情况，那天毛泽东非常有风趣地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华北前线工作那么久，应该改称华北战地服务团了。

晋察冀文学艺术事业能够蓬勃发展，获得丰硕成果，我认为就是由于党中央和晋察冀许多负责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正确指导，由于那些至今仍然令人感念的良师。

为了适应边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进行党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于1939年12月成立了以成仿吾为书记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有沙可夫、邓拓、何干之、周巍峙、李凡夫等同志。1940年初又改任为沙可夫任书记，委员都是文艺



工作者，如周巍峙、崔嵬、丁里、汪洋、田间、黄天、王林等。

边区政府和各专署、晋察冀军区和各级政治部门对文艺工作都是很关心的。在党的支持下，在民主的气氛里，边区的文艺战士以极高的兴趣和热情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以领导、组织诸如创作、演出、学习、研究、观摩、交流等多方面的业务活动。

1939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1939年7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1940年4月成立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1940年7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实为文学工作者协会）。

1941年6月18日，晋察冀边区还召开了文化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联），并选举沙可夫同志为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边区文协、剧协、音协、美协等团体。

各协会及文联成立后均制定了切实的工作纲领，并向全国文化界发出通电，表达了晋察冀全体文艺工作者的抗战热情和决心，确定了晋察冀全体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职责，阐明了晋察冀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远大理想和追求。

由于战争残酷，地区分散，交通常被隔绝，北方分局文委、边区文联及各协会要对边区文艺工作进行经常及时的领导和指导当然十分困难，但还是在反“扫荡”间隙期间，在环境相对比较安全的条件下，争取时间，进行调查

研究，对各协会及文艺团体进行指导，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边区工作需要，组织和奖励文艺创作和理论著作，出版各种油印刊物，文艺书籍（包括创作及翻译作品）。

在文艺工作中文联还特别强调向鲁迅和高尔基学习，出版他们的部分著作，举行座谈会，纪念会，成立专门的研究会进行深入研讨。从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各种伟大作品中求得很多教益。

沙可夫于 1926 年在巴黎学习艺术，来年去莫斯科大学学习，即开始戏剧创作和演剧活动，三十年代他在中央苏区负责文化教育及戏剧活动，编过报纸，后到延安参加鲁迅文艺学院的筹备工作，并从事戏剧创作。由于他在文艺创作、文化工作和艺术教育等方面有十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在担任北方分局文委书记、边区文联和文协主席、联大文艺部（文艺学院）领导人期间，对边区文艺工作的指导，文艺干部的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平易近人，能及时发现问题，组织大家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他发表了不少指导性很强的文章。如《向高尔基学习——祝〈母亲〉二次公演》、《回顾 1941 年，展望 1942 年边区文艺》、《目前边区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等一系列文章，总结、探求文艺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及时地推动着边区文艺活动前进。他翻译的《列宁与文学》、《艺术家与艺术科学》、《丹钦科和青年戏剧工作者的谈话》，以及他亲自编写教材主讲的“苏联戏剧”和其他

文艺理论课，都丰富和活跃了边区戏剧理论工作。

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虽然担负着培育边区各类干部的十分繁重的任务，还负有其它领导责任，但还是十分关心边区文艺活动，他积极参加一些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肯定文艺工作人员的工作成绩，鼓励大家创作。联大文艺学院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培养大量的文艺干部、轮训文艺团体、取得很大成绩，是学院领导及教职员的共同努力，但离不开联大和成仿吾同志总的教学布置，离不开他坚持的教学紧密结合实际，更好地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正确方针。

我和沙可夫、沃渣、田间、沙飞五位文艺工作者在1942年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出席了1943年初举行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成仿吾被推为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长。

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以及文联与各协会的领导、推动、倡议下，边区文艺工作者荣幸地把每年11月7日这个晋察冀军区成立和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个美好的日子，选定为自己的节日——晋察冀边区艺术节。

艺术节期间，集中演出较高水平的戏剧歌咏，举办绘画展览，召开座谈会，研讨边区各类文艺问题。艺术节期间还在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可以说边区艺术节是边区文艺工作者检阅自己的创作演出成绩、提高自己并向边区人民汇报的节日，也是各地推进乡村文艺活动、大众文艺更好地普及的节日。1940年11月7日首届艺术节就由联大文艺学院、联大文工团、抗敌剧社和西战团联合演

出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这是在十分缺乏戏剧资料，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完全凭着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和辛勤劳动在短时间内赶排出来的一次苏联名著的重要演出。在历届艺术节期间，不仅演出中外名剧，还有现实题材的新作。艺术节丰富多彩的活动，把文艺工作者们的欣赏水平、审美意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通过观摩、交流，文艺工作者们的收获是很大的。为了使普及与提高更好的结合，在艺术节期间各县、村剧团也进行各种演出及比赛活动，大大推动了乡村文艺的开展，促进了乡村歌咏队和村剧团的成长。

为了发动和鼓励创作，边区设立了鲁迅文艺奖金。对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作品设有季度奖、年度奖、特别奖（包括“军民誓约运动征文奖”“政治攻势文学奖”等）。尽管当时受着战争环境的限制。征稿偏多于环境比较稳定的北岳区（虽然冀中也有些作品应征，但冀中大部分同志坚持地下斗争，未得参加。冀东、冀热辽环境艰苦，交通困难，未能送作品来），但它的影响却遍及全边区，对全边区发动创作，鼓励创作，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入选作品包括短篇和中篇小说，墙头小说，小故事、叙事诗、街头诗、儿童诗、诗传单、歌谣、鼓词、传说、童话、报告文学、散文、歌曲、合唱、歌剧、话剧、相声剧、木刻、招贴画、连环画、布画等，都是现实题材，而且多是普及性艺术作品，此外获奖的还有建筑设计，篷帐舞台设计，画册，音乐论文选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创



作题材、形式、样式、体裁、风格等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说是边区文艺创作的缩影。其中不少作品不仅当时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即或现在读起来也是激动人心的。1942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也举行了文艺创作评选活动。应征作品300多件，入选50件，也包括音乐、文学、美术、戏剧等各类优秀作品。

晋察冀是抗日的民主根据地，在这里，人民沐浴着民主的雨露阳光。在党的引导下，经过战争的血的洗礼，人民苏醒了、自觉了、组织起来了，即或被认为自私、保守的农民，一经接触真理，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便成为不惜捐躯为国的英勇战斗者。我们垂危的民族顿然神采焕发，充满雄威，同敌人展开殊死的决斗。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运动战，出奇制胜，打得敌人懵头转向，寸步难行。白发老奶奶、扎着红髻髻朝天椎的儿童，都毫无例外地参加了英勇的斗争。传奇式的战争，“连桌子板凳都能咬人，连山药萝卜也会爆炸”。党领导的战斗的边区，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我们晋察冀文艺生根、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英雄史诗般的生活场景，成为文艺创作的丰富源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颗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和那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奋勇前进、不断开拓的革命意志以及创造精神，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广大军民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良师益友。

在敌后各种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出版了不少文艺报刊和文化书籍，这也充分说明了领导上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对文化工作者学习的关心。仅根据1942年的统



计，可见一般，当时正在出版的文艺刊物或文艺副刊有边区各个文艺协会主编的《文艺报》、《五十年代》、《山》、《鼓》、《晋察冀文艺》、《晋察冀戏剧》、《晋察冀美术》、《晋察冀音乐》；有各部门和各文艺团体主编的《诗建设》、《边区文化》、《晋察冀艺术》、《路》、《冀中文化》、《文艺学习》、《文艺习作》、《歌与剧》、《歌创造》、《战地木刻》、《连队文艺》等等；另外有些分区报纸也有文艺副刊。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等国的文学名著和其他文艺论著，如《睡眠》（卡达耶夫）、《意大利童话集》（高尔基）、《死敌与其它》《苏联小说集，晋察冀日报出版）、《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卡达耶夫）、《錶》（班台莱也夫，冀中文建会翻印）、《第四十一》（拉甫列涅夫）、《铁流》（节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聂维洛夫，冀中文建会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草叶集》（惠特曼）、《艺用人体解剖 A、B、C》（杜焚编）、《音乐家和音乐家的故事》（边区音协、肖何译）以及《斯坦尼斯基演剧体系》、《演员修养》（丹钦科）等。还出版了《鲁迅杂感集序言》（瞿秋白，联大文艺学院）。

### 三、文学创作活动

#### 1、诗歌

诗歌，是晋察冀较早开放的文艺花丛中的一束鲜花。无论供吟咏的、能歌唱的，或是抄写在墙上的、印刷在纸

上的，都是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都是言人民之志，抒人民喜怒哀乐之情的。诗人们的心、诗人们的情，和人民的心、人民的情，水乳交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之类诗作，完全绝迹。诗歌，“向外转”，转向人民。

。有街头诗、岩壁诗、枪杆诗、诗墙报、诗传单、诗与画等短诗，也有长卷诗。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还有格律诗，歌谣体诗。

边区早期的诗是出现在 1937 年底创刊的《抗敌报》上，有邓拓、舒同、孙毅等十几位同志的作品。1938 年秋，延安文协“战歌社”诗人柯仲平、林山等，和由战地返回延安的西战团“战地社”诗人田间、邵子南等共同发起的“八·七”街头诗运动的盛况及其部分诗作，经《抗敌报》文艺副刊《海燕》介绍到晋察冀。

1938 年底，西战团到达晋察冀，把街头诗也带到边区，写在街头屋墙上、岩壁上、枪托上、配画的传单上，朗诵在晚会上、课堂上、集市上。1939 年春，“战地社”诗人和一分区“铁流社”诗人钱丹辉、魏巍等联合发起开展边区的街头诗运动。由此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940 年李公朴考察边区后写道：“新诗歌，已为晋察冀广大的知识者之群所爱好，练习诗歌的写作，已成为一种风气”。

边区街头诗忠实认真地实践了街头诗的宣言：“让诗和人民在一起”。并且在作品上、在活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以抗战的、大众的斗争生活和抗日与民族存亡为根本题材，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现

实，并鼓舞和帮助人民前进”。它揭露敌人的阴谋，控诉日寇的暴行；歌颂战斗英雄，赞扬劳动模范；号召农民多打粮，鼓励军工多造手榴弹；讴歌民主生活，赞美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支持妇女婚姻自主，夸奖儿童站岗放哨；痛斥封建老顽固，批评懒汉二流子……总之，凡与人民相关的现实生活领域，无一不有它涉足其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街头诗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历史功绩显著。街头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次创举，一次革命。

一册街头诗集《粮食》，仅两个月就在晋察冀售出7000本。而当时在大后方，一本诗集充其量不过印刷二千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街头诗的威力及大众对它的喜爱了。

随着街头诗蓬勃发展，广泛普及，人民大众对诗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叙事诗、抒情诗也绽开花蕾。1939年战地社的《诗建设》着意提倡叙事诗和“更深刻的抒情诗”。田间、邵子南、魏巍、陈辉和林采等陆续写出了千行以上的长诗。

诗社、诗刊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继战地社、铁流社之后，文艺前卫社、边区诗会、冀中新世纪社先后建立。战地社的《诗建设》、铁流社的《诗战线》、边区文救会的《边区诗歌》、《诗文》，文艺前卫社的《诗歌前卫》，边区诗会的《诗》，新世纪诗社的《新世纪诗歌》先后创办。各种诗集也先后出版发行。

《诗建设》是西战团战地社于1939年2月创刊的晋察

冀边区第一个诗刊。它以发表诗歌为主，兼刊诗论、诗评。它是边区广大诗人们发表作品的阵地，也是培养年轻诗人的课堂。它出版了 70 多期，刊登了几十位颇具影响的诗人及成百诗歌爱好者的近千首诗歌，对边区诗歌运动的发展和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铁流社和它的《诗战线》，是边区的重要诗社和诗刊。该社该刊闻名边区的诗人丹辉、魏巍等的不少诗作，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继之出现的诗社诗刊，对边区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擂鼓诗人”田间，是晋察冀街头诗最热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坚壁》、《义勇军》、《啊，游击司令》等众多的街头诗名篇，不仅始终鼓舞着边区大众的抗战激情，而且也常常鼓动着大后方一些人们的心灵。大后方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称田间是“时代的鼓手”，称赞他的诗“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他的叙事诗《亲爱的土地》等，抒情诗《祝山》等，以及抗战胜利前后开始写作的长卷《赶车传》，描写了边区的现实生活，记录了边区的历史，表达了边区人民的心声。

田间、邵子南、钱丹辉、魏巍、方冰、史轮、陈辉、孙犁、曼晴、鲁藜、蔡其矫、邓康、远千里、商展思、周奋、席水林、流笳等名噪一时的诗人星群的诗作，在战斗性、群众性方面，勇猛地朝前开拓，跃进了一大步。无论



街头诗、叙事诗或抒情诗，都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战斗色彩，饱满的革命激情。都“触到了时代的动律”，“伸入了人的心脏”，“表现了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对新社会的憧憬”。诗歌在艺术表现力方面也在不断的提高，出现不少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诗作。这些诗人当中有的也是小说作家。

在晋察冀诗歌战线上，1943年初，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燕赵诗社”。“燕赵诗社”是在1943年初边区参议会召开之际，由皓青、聂荣臻、阮慕韩、张苏、刘奠基、宋劭文、吕正操、于力、邓拓诸公发起成立的一个以吟咏写作旧体格律诗词为主的学术团体。成仿吾、马致远、沙可夫、田间以及各地耆老缙绅、硕彦鸿儒纷纷报名参加。社友甚众。该社缘起谓“昂扬士气，激励民心，以燕赵之诗歌，作三军之鼓角”。该社曾一度集会，各社友均兴奋挥毫，所作诗词甚丰。

边区诗歌界重视诗评、诗论。田间的《现在的街头诗运动》、《讨论二则》等数篇评论文章，影响广泛。边区不少诗人撰写评论文章，其中针对一些街头诗存在一般化和过于空泛的“诗病”，针对街头诗的提高，针对提倡叙事诗和发展抒情诗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对边区诗歌的繁荣和提高，对新一辈诗人的培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 2. 小 说

晋察冀一些小说作家的作品，曾得到郭沫若同志的称赞：“尤其是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邵子南的《地雷阵》、刘石的《真假李板头》，简直是惊人之作。这几位作



家的笔力，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外边的水平。寂寞的中国创作界可以说不寂寞了。”

战斗频繁、生活动荡，情况变化急速，这一切都影响着小说作家们难以创作长篇。但短篇、中篇及微型墙头小说，产量是可观的。边区小说创作，起始仅有些简短的小故事或墙头小说；中期作品渐多且逐渐成熟；后期直至抗战胜利前后则果实累累，孙犁的《荷花淀》，邵子南的《地雷阵》、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佳品相继出现，影响深远。这一些成就是作家们经过长期刻苦的生活准备、思想准备、艺术准备，有些是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更自觉地深入群众生活、向群众学习而取得的。

生活在冀中九河下梢白洋淀文安洼的孙犁的小说，被人赞为“苇笛儿吹出来的”。《荷花淀》等名篇，如同湛蓝湛蓝淀水上的荷花一样美，它和邵子南的《地雷阵》、晋冀鲁豫边区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度被誉之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

抗战前即在青岛左联从事工人剧运，抗战中成为冀中文艺运动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作家王林同志，1943年写成了歌颂冀中人民粉碎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的长篇小说《腹地》，孙犁称其为“一幅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王林还创作了艺术上更加成熟的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五月之夜》等。《十八匹战马》深受人们喜爱，连队战士曾把它作为必读的学习材料。

邵子南曾写过长篇小说，并请人阅读提意见，但存稿

在战争中丧失了，十分可惜。敌后文学家同此遭遇的怕不少。

### 3、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边区最早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之一。它以其快速、真实、形象的特性，发挥了强烈的教育和鼓动作用。它充满敌后的战争烟尘，浓郁的边区泥土气息。真实，使其具有无法估量的文献价值；形象，令它享有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它是真正的史诗般的文学篇章。

晋察冀报告文学作品数量很大。它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体裁不一。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没有它不触及、不报告的。特写、传记、文艺通讯、游记、访问记、速写、急就章……出现在边区所有的报刊杂志上。《战地通讯》（西战团创办）则是专门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期刊。

具有坚固的现实主义基础，更多地表现出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报告文学，自始至终得到边区党政军领导的关怀。

1938年10月《抗敌报》副刊《海燕》创刊号就发表了《谈报告文学》，号召边区文学工作者把报告文学“发展起来”。边区军民丰富多彩的生活，英勇卓绝的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迅即把报告文学带入繁荣境界。

《解决战斗的保证》（夏风）、《雁宿崖的歼灭战》（林朗）、《雁宿崖的战斗小景》（魏巍），描绘了我军灵寿陈庄大捷和涞源黄土岭毙敌“山地战专家”阿部中将的重大胜利。

邓康的《五十九个殉难者》，真实地报告了1940年望都柳陀村59名群众和干部，不幸被敌包围，被俘后宁死不屈，遭敌残酷杀害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它无情地揭露了敌人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满怀崇敬地展示了中华儿女坚贞不屈的高风峻节。作者由衷地发出如此赞叹：“五千年的古老的民族，在这里找着热爱着她的女儿和孩子了。”这篇报告，在边区和大后方，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边区著名记者、“七七事变”后怀着热烈的爱国心由新加坡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仓夷的报告文学，鲜明生动，真挚感人。周扬同志赞美他的报告文学集《幸福》时，写道：仓夷同志的作品，正如作者一样年轻活泼，充满清新朝气，给予人一种衷心喜悦。他写了人民的新的自由生活。也写了人民为争取生存与自由的流血斗争的故事。他的《纪念连》，真实生动地描述了被冀中区领导人程子华誉为“纪念连”的一个八路军连队在1942年反“扫荡”期间艰苦、曲折的英勇战斗历程。

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记录了“在平原上依据一座被孤立的村落，对抗着2500拥有精良装备的敌人”的八路军两个连队胜利突围的事迹。叙述有声有色，动人心弦。

周而复有关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纪事受到中外读者重视。

在边区报告文学活动中，值得着重提及的是冀中出现的一次全区规模编写《冀中一日》的热潮。1941年初，冀中军政领导人吕正操、程子华、黄敬一起热情发起了以当年5月27日这一天个人见闻为内容的“冀中一日”写作

运动。全区党政军民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应征稿件多达9万件。《冀中一日》由王林、孙犁主编。精选出233篇共35万字的作品于1942年编成4辑出版。它反映了冀中区各个方面的战斗生活。《夜过平汉路》、《不稀奇的事》、《阵地》、《十勇士》等大批作品写得饶有风趣，深刻生动。

可以认为，边区文学作者及其创作，在抗日战争整个历史时期，主要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1938年初，孙犁就介绍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39年文救会创作座谈会与会作家、理论家对现实主义诸多原则进行了认真研讨。会上，邓拓作了长篇发言，对文学的真实性、典型性、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多样化等问题作了详尽论述。

#### 四、戏剧、曲艺活动

晋察冀边区文艺运动中，戏剧活动，无疑是规模最大、效果最强的艺术门类之一。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群众性、可信的真实性，是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特色。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来晋察冀考察了半年之久，对边区戏剧创作和演出作了如下描述和评论：“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的、坚决的参加了抗日部队。不少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边区话剧已走上了中国化的途径。电影明星的动作，洋八股式的对话，在晋察冀的舞台上已经寻觅不见了。在观众眼前展



开的是令人泣下或令人发指的血淋淋的人生和战争的现实。在这里还能看出未来的光明远景，和侵略者、反动力量的灭亡”。

剧本，一剧之本。众多的剧社，常年的戏剧演出，要求着戏剧文学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各戏剧团体条件不同，任务各异，因之都无例外地要有自己的剧目。即使在边远、艰苦的雁门关以北地区的七月剧社，在敌情异常紧张的平西、冀东地区的尖兵剧社、挺进剧社，客观形势要求非有适合当时当地的剧作不可。

因此，和剧团发展同步的戏剧文学，是边区最早发展起来的且最为活跃的文学样式之一，品种丰富，规模洋洋。现在根据大家记得的很不完全的统计，在抗战八年中，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个人和集体创作的剧本就有600个以上，仅冀中区，现在统计到的各类剧本就达144个。

剧作家近百人，有沙可夫、崔嵬、胡可、王林、刘肖芜、梁斌、胡丹沸、王炎、陈乔、傅铎、杜烽、刘佳、丁里、凌子风、胡苏、王犁、何迟、贾克、王血波、牧虹、洛丁、田野、邵子南、王久晨、朱星南、羽山、胡朋、林塞、梁冰、鲁易、张学新等。

王林于1938年1月创作的《自取》、《父与子》等是边区第一个话剧；凌子风编的《人间地狱》、《打击侵略者》等是边区第一批活报剧；崔嵬1939年12月初的《参加八路军》（吕骥作曲）是边区第一个歌活报，刘佳1939年12月的《在这土地上》（徐曙作曲）是第一个小歌剧；丁里1940年的《春耕快板剧》，是第一个秧歌剧；邵子南



1942年冬的《不死老人》（周巍峙、陈地、李劫夫等作曲）是第一个大型歌剧。假使我记忆没有错的话，他们都是戏剧园地某一方面的开拓者。

剧作者们的生活、创作和劳动是极其艰苦的，王林——冀中区文艺运动早期发动者和中坚。即使在冀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一度沦为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异常困难岁月，他也一步未离“腹地”，继续坚持在冀中的土地上写作。洛丁、朱星南深入到修有炮楼的平山县回舍镇的地窖子里去“生产”《粮食》。没有稿酬，没有稿纸、没有写字台，有时还饥肠辘辘，夜以继日地以秫秸棍绑着的钢笔尖，蘸着自己泡就的紫的或绿的颜料水，往麻纸或各种颜色的有光纸上写着一句句台词。他们的劳动是认真的，剧本不断听取演员和观众的意见进行修改；是自觉的，没有半文稿费却常常在油灯底下“连轴转”。为了及时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创作了反映边区各方面生活，塑造了边区各式各样人物的戏剧作品，为边区的抗战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冀中火线剧社演出歌活报《参加八路军》后，有时当场就有人报名参军；《慰劳》在敌占区村子里演出时，动员组织伪军来看，不少人看了痛哭流涕，当场请求我方给他们安排任务。

艰巨的战争环境，丰富的斗争生活，多层次的观众对象，不同的欣赏水平，不同的时间地点，要求边区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内容、形式、体裁、风格，必须多样化。八年的戏剧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讲，在晋察冀这块战争大地上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动人景象。

晋察冀戏剧创作的特色有下边几个方面：

题材广阔，现实的或历史的，正面歌颂的或反面揭露的，人民群众的或敌伪顽的，成功的或失败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事件、故事、传说，都可以自由地创作和演出，只要对抗战有益。比如除了大量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也有《岳飞之死》、《陆文龙》、《李自成》等新编历史剧的演出；有歌颂战斗英雄的《狼牙山五壮士》、《李国瑞》（杜烽作）、《李殿冰》（刘肖芜作），也有批判开小差战士的《把眼光放远点》（胡丹沸）；有暴露日寇糟蹋为其死心塌地效劳的伪军官家属的《慰劳》（王犁作），也有描写日本士兵受军曹欺压，厌战反战的《哈娜蔻》（凌子风作）；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日本同志用日语演出的大型话剧《前哨》是一朵奇葩，丰富了边区的话剧活动；它在平山陈家院第一次演出，立刻引起了轰动。

这里强调说一下戏曲、曲艺推陈出新的成就。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京剧新编历史剧和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的京剧现代戏，全都服务于抗战救国的伟大目标。

1939年1月冀中火线剧社演出陈乔编写的《大报仇》，同年11月联大文工团演出了王久晨的《救国公粮》，是边区最早的抗战京剧。其后又陆续出现了王久晨的《陆文龙》、郑红羽的《史可法》，崔嵬的《岳飞之死》、《老英雄》等等。这些京剧的创作和演出，已非“旧瓶新酒”了，而是“新酒”涨破了“旧瓶”，至少在导演处理上已经“出新”。1944年王久晨据《甲申三百年祭》创作的《李自成》，是边区京剧艺术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

品种齐全，有正剧、悲剧（如《马母》等）、喜剧（如《把眼光放远点》等），还有闹剧（如《活捉鲍里斯》等）。

戏剧形式多样：有新兴话剧、歌剧，也有传统戏曲京剧、河北梆子；还有活报剧、秧歌剧、小调剧、快板调、相声剧。“旧瓶新酒”、“新瓶新酒”相互竞芳。更有专为少年儿童写的话剧、歌剧以及以霸王鞭舞蹈为表现手段的儿童舞剧（汪洋创作导演）。“田庄剧”，也是在敌后艰苦环境中“逼”出来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和城市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有相似之处，是利用自然场景为舞台，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墙”完全消失，两者几乎融为一体地进行演出的一种形式，效果出奇。有时剧中事件和人物行动惹得观众“忘我”地“进戏”中来。

体裁不限，大中小并举，但多数是群众易懂的短剧。也有目的在于艺术工作者自身提高而借鉴外国或学习大后方优秀戏剧的演出活动。如演出了曹禺的进步话剧《日出》、《雷雨》、苏联革命话剧《母亲》、《带枪的人》，田汉以托尔斯泰名著改编的同名话剧《复活》以及契克夫的《婚事》等一些名剧。这些演出不仅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为广大党政军干部所欢迎。对边区戏剧工作者的剧作、导演、表演水平的提高，也有很大益处。

边区的戏剧佳著还有丁里的《钢铁与泥土》（歌剧）、《子弟兵与老百姓》等，贾克的《程贵之家》、《田营镇》等。刘佳的《到山那边去》（独幕话剧）、《当兵去》（多幕歌剧），刘肖芜的《我们的乡村》等，胡可的《清明节》

(三幕儿童剧)、《戎冠秀》(话剧)。牧虹的《我爱八路军》(歌剧)等，胡苏的《父亲与女儿》、《母亲》等。傅铎的《王秀鸾》(大型歌剧)、西战团集体创作(田野执笔)的《模范公民》(话剧)。抗敌剧社创作的《晋察冀之歌》(大型活报剧)等。专为村剧团创作的作品有洛丁的《地雷阵》(快板活报剧)，胡可的《翻身记》，贾可的《庆祝反‘扫荡’胜利大歌舞》(歌舞活报剧)等，这些剧作在阜平的村剧团演出时，很受群众欢迎，这也是戏剧工作者与群众结合，普及戏剧，提高村剧团演出水平很重要的好的方法。

边区戏剧的演出活动，是极端艰苦的。没有剧场、没有灯光、舞台，一切都在旷野里，在河滩、高坎、山坡、梯田……栽上几根杆子，围上几块布条，或几张席子就是演出场地。边区唯一的一间剧场——参议会礼堂，建好后没使用几天就被日军飞机炸毁了。即使如此，演出却一丝不苟。

敌人的封锁，使边区与大后方完全隔绝，演出物资和设备极端匮乏，偶而能从敌占城市弄回一点汽灯纱罩，还要节约使用，其他演出用品就根本没有来源了。但戏剧工作者们，为保证艺术质量，群策群力，以创造性劳动克服着异乎寻常的困难条件，保证着演出的艺术质量，追求各方面尽可能的完美。

一般服装道具都是农村或连队临时借的，用后就还。有许多演出用品要自己动手制作。抗敌剧社的汪洋等同志为了避免农民和士兵看戏临时搭台花费很多人力，发明了



篷帐舞台，轻便适用，拆装方便，符合战斗化；有前台也有后台，既能遮风又能挡雨。西战团的朱星南等同志以白铁皮制成各式各样灯光筒，改造了汽灯照明；灯光筒罩上各种颜色的灯光纸，五彩纷呈，蓝天白云，风雨雷电，黑夜白昼，黎明黄昏……都能在舞台出现。

以驮架子为框，砌上背包，蒙上画布做成的沙发，看上去跟真的差不多。红粉子、白粉子、蓝粉子、锅烟子、凡士林，合成五颜六色的油彩和鼻油灰。女同志用自己制作的钩针钩结出各式精致的头套，粗布缝制的各种款式的西装、大衣，把观众带到另一个世界……

演员们化装下装，往脸上涂的是麻油、核桃油、大麻子油，有时还用猪油。眉笔用火柴烧制而成；没有火柴就捻个纸捻代替。

演出时，自然环境也常常给演员造成很多困难。夏天野外演出，要忍受蚊子咬、“小咬”叮。风沙季节咽喉呛得连讲话都难。夏日演规定情景为冬天的戏，演员们捂一身汗，棉衣湿个透；冬日演剧中时间为夏天的戏，如《雷雨》里的角色，都穿单衫，还扇着扇子，而老天却扬着纷纷大雪。数九寒天，也只有露天舞台的隐蔽处燃起盆微弱的炭火取暖。但我们可爱的演员均置严寒酷暑、雷雨风霜于度外，十分认真忘我地进入角色。

在敌后演出，不仅条件艰苦，而且要保持战斗化的作风。常常是白天防空袭，夜间防突袭。有时在山前不时响着炮声，制高点上布着身披伪装的岗哨，要道埋着地雷的境况中开场。甚至情况发生紧急变化，有时也要尽可能为

难得看戏听歌的农民或战士演出。未演出先按部就班地宣布应付发生紧急情况的对策，安排观众和演员疏散的方位，这是“环境优越”的了。有一次我参加武工队在繁峙川下敌占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时，在岗楼下的村子里演出，那就更要提高警惕，演员们于下午在宿营地早早吃过晚饭，化好装，带好道具，行军一二十里甚至二三十里，到达进行演出的场地，马上布置。没有灯光，以几个饭碗盛上植物油点亮，放在板凳上照明。演员是现在的名导演凌子风和名演员陈强等同志。我是“舞台监督”兼报幕，我喊一声就“开幕”。演的是《活捉王家祥》，是打击汉奸，争取伪人员的活报戏，敌后边区群众从未看过演话剧，演出条件又这么差，但他们能看得懂，受到鼓舞，效果是很好的。一般在敌占区、游击区演出，多用实景，或在室内演，根本不要天幕。有时在横杆上挂块幕布，由两个人各在一端举着就当前幕，把演员和观众在开幕前、落幕后隔开。演出结束后，立即转移，又要行军到另一村子里住宿。半夜里喝上一碗小米稀粥，算是很优裕的演出生活了。睡上一会儿，白天还要早早起身，找人开会做宣传；晚上又开始另一场演出。无论在冀中、冀东平原、在游击区、在“敌后的敌后”，在交火的枪炮声中坚持把戏演完或来不及卸装就得转移或突围的事虽不是家常便饭，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岳飞”、“文天祥”与日本侵略军开仗的事就不是荒诞不经的了。

晋察冀边区的曲艺创作和演出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不少文工团、剧社都很重视，表现新内容的大鼓、快板和

相声的创作，表演者多是戏剧演员，也有歌唱人员，虽然大多是“半路出家”，但均热心从艺，努力创造。如李同春原是冀中一个村子的青救会干部，经常在欢送新兵等群众大会上演唱竹板书及西河大鼓，并创作了作品《掘堤》，揭露了大汉奸掘堤放水淹根据地的罪行。1945年他20岁时报名参军，开始专业曲艺演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成为活跃在人民解放军当中，创作了大量曲艺作品，受到广大战士欢迎的曲艺演员。

王尊三是一位西河大鼓演员，能唱不少传统书目，在抗战中他自编自演了许多新曲，他还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说唱新书，对教育群众，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解放后创造了妇孺皆知的“马大哈”（相声名篇《买猴》中的人物）这一典型形象的何迟，当年在晋察冀就是深为群众爱戴的相声作者和演员，他的相声《改行》，表现了敌占区艺人的悲惨生活。《二·五减租》在农村的激烈斗争中收到强烈效果。他讽刺三风不正的相声作品《某甲乙》在边区参议院大礼堂演出时博得了满堂笑声。

徐曙创作、张非演唱的《晋察冀小姑娘》和《减租小唱》是在曲艺基础上创新的优秀曲目，今天听起来还很动人。

## 五、音乐舞蹈活动

“村村有歌手，处处有歌声”，是人们对晋察冀歌咏运动亦即对晋察冀音乐业绩的赞语。

时代的急需，人民的喜爱，音乐工作者的巨大热情，使边区音乐成为与人民结合最广泛、最密切、最深入的艺术门类，成为时代的最强者。随着边区的开辟，晋察冀歌咏活动即蓬勃兴起。开始时主要唱一些聂耳、冼星海、麦新等音乐家创作的救亡歌曲。1939年由延安派到晋察冀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艺部等文艺单位中有不少专业作曲家，如早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吕骥、周巍峙等同志。这些作曲家的创作理论修养较高，创作经验也较丰富，他们对边区音乐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诗人、剧作者们——成仿吾、沙可夫、田间、邵子南、方冰、魏巍、史轮、刘佳、蔡其矫、郑红羽、牧虹等，为边区歌咏和歌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诗词，对边区音乐活动贡献很大。吕骥、周巍峙、卢肃、劫夫、陈地、曹火星、徐曙、王莘、晨耕、唐诃、张非、罗浪等人动听的曲谱，则为诗词装上了翅膀，使之飞翔于千山万水。

歌咏运动，是晋察冀音乐活动的主要表现。从文化水准较高，在“七七”之前就由地下党领导在一些学校传播着抗日救亡歌曲的冀中、冀东大平原的城镇，到五台、恒山一些甚至在八路军来到之前尚不知有个中华民国存在，仍



过着“大清”岁月的杳杳晃晃，无处不响彻抗日歌声。即或在游击区，在一些修有炮楼的敌占区，人们躲在地道或地窖子里也唱抗战歌曲。

人们以歌曲鼓舞斗志，坚定信心；以歌曲抒发热情，表述心声；以歌曲激励士兵，鼓扬士气；以歌曲安慰伤兵，悼念烈士。胜利时纵情欢唱，即使在就义前多少烈士也引吭高歌。歌曲使同志们和谐团结，万众一心。歌曲还能瓦解敌伪军，教育俘虏。歌声曾使一些伪军反正投诚，使那些俘虏眼泪横流，泣不成声。文艺工作者们在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时，还常用日语演唱歌曲，争取日军士兵。……歌曲以它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歌曲不仅是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节目和教唱教材，而且成为广大军民文艺生活中最活跃的一种形式。由于音乐工作者经常辅导以及学习班的短期培训，在战士和农民中出现了不少积极分子，成为推动群众歌咏活动的骨干。广大群众不仅能独唱、齐唱，还会轮唱、合唱。在边区的歌曲创作可能超过平原，比较广泛流行的歌曲至少有 100 多首。大量是反映边区战斗生活的新创作。其中群众歌曲较多，也有叙述战斗故事的叙事歌曲和抒发革命情怀的抒情歌曲。许多歌曲唱起来特别亲切，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著名音乐家吕骥同志，是边区音乐运动领导者之一。他领导音乐教学，从事音乐理论研究，还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他创作的《抗大校歌》、《华北联大校歌》，不仅为教职员工喜爱，并且飞出校门，在边区流传。他谱写的大型歌活

报《参加八路军》的主题歌为边区许多剧团排练和演出，每场演出都产生强烈的观众反映，这一歌曲在庆祝灵寿陈庄战斗的大会上第一次演出后，就被群众学会，并传唱开去。

我在担任繁重的西战团的行政工作、参加北方分局文委、边区文联、音协的领导工作并着力于乡艺干部培训活动之余，也抽暇从事创作，我创作的《子弟兵进行曲》（方冰词）是1942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征求“军歌”中被选的三首军歌之一。它和其它两首——卢肃的《子弟兵战歌》（蔡其矫词）、徐曙的《前进，子弟兵》（郑红羽词）伴随并鼓舞着边区广大指战员直到胜利。我谱写的姐妹篇《李勇要变成千百万》和《李勇已变成千百万》，先后均迅速在群众中传唱，有力地推动了地雷战的开展。我于1939年冬第一次在敌后根据地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还参加了儿童歌剧《八路军与孩子》和大型歌剧《不死的老人》的作曲。

卢肃谱写了诸如《晋察冀边区艺术节歌》等优秀歌曲。他为歌剧《团结就是力量》谱写的同名主题歌，一经演出，立即传遍边区，唱遍全中国，至今仍脍炙人口，传唱不衰。徐曙的《八路好》，张达观的《军队和老百姓》，都是十分优秀的歌曲创作。

在群众歌曲、叙事歌曲创作中，李劫夫是卓有成就的。他写了《自由的农夫王老三》、《王禾小唱》、《五十九个》、《忘不了》、《狼牙山五壮士》等多首为群众喜闻乐唱的歌曲。他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至今仍受着现代听众的

欢迎。

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真挚的语言，质朴的风格，流畅的旋律，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而被人民厚爱并长久流传”。王莘的《战斗生产》、《永远跟着共产党》，张非的《让地雷活起来》、《张老汉》，罗浪的《生活在晋察冀》等，都深受边区人民喜爱。

限于物质条件，器乐曲在边区不算活跃，但也时有演出，有二胡、三弦、口琴、小提琴等的合奏，也有二胡、口琴、小提琴的独奏，这方面的能手有边军、刘锡贤、朱星南、张达观等同志。为了演唱《黄河大合唱》，西战团张文师傅用煤油筒制成“低音琴”，他与音乐工作者合作制成的小提琴质量是很不错的。不少单位用土法把羊肠子制成琴弦，解决很大困难。

在音乐理论活动方面，联大文艺部因时因地编写了大量音乐教材。我和卢肃等同志的一些音乐理论著作，还获得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奖励。

舞蹈在边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

讲古老，千百年来群众中间就广泛流传着秧歌舞、高跷、旱船、霸王鞭等民间舞蹈，抗战后经过改革，加上歌唱，很受群众欢迎。有时节日活动或文艺比赛时节，各村剧团上千的男男女女演员上街表演。霸王鞭则主要在少年儿童中流行。在我们创办的乡村艺术干部训练中，如何利用这些民间舞形式表现新内容是重要课程之一，我曾看过唐县的学员表演的《宪政运动舞》，不管词作如何，但舞姿十分活泼好看，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

讲年轻，我们还缺乏经过训练的舞蹈演员，更谈不上专业编导了。最初有一位在红军宣传队工作过的同志叫黄日升，他先后在冲锋剧社和抗敌剧社工作，他把红军时期流行的《儿童舞》、《叮铃舞》、《海军舞》等带到敌后，教给部队剧社演出后，受到战士和农民，特别受到农村儿童欢迎。在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跳这些舞。

专业剧团表演秧歌舞的，首先是西北战地服务团，那是1939年新年时演出的。由陈正清、吴坚领舞，名《打倒日本升平舞》。联大文工团也演过新秧歌舞（《工农兵学商一齐打东洋》），当中用地方小调和对口快板宣传抗日内容。领舞的是丁里、陈强，可以跳出许多花样。其它剧社、宣传队也都有表演秧歌舞的。当时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冀中火线剧社以及各军分区和回民大队等宣传队大都设有儿童队、歌舞队、少年艺术队等儿童文艺队伍，他们成了发展舞蹈的机构，他们不仅打霸王鞭、演秧歌舞和儿童歌舞，而且与“大同志”（也不过是比他们大几岁）一起演出。不少文工团还用秧歌舞形式（加歌唱、快板说白）编写好些歌舞活报，抗敌剧社还演出以霸王鞭、秧歌舞为主的舞剧《空城记》，是汪洋导演的，十分生动可爱。

当时边区的舞蹈表演是群舞多，独舞少，歌舞和歌舞活报多，纯舞和舞剧少。这些舞蹈节目当中有的比较简单粗糙，艺术性不强，但有生活气息，能和群众情感交流，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在演出方面，舞蹈演员多由戏剧演员担任，少年儿童



演员们虽然也向民间舞学到一些表演技巧，有的农村来的儿童队员本来就会扭秧歌、打霸王鞭，但没有什么正规训练，谈不到有什么专业技巧，但是他们热心这一艺术形式，有些又比较熟悉民间舞，因此他们的演出，也使观众感到亲切动人。

少年舞蹈演员们同“大同志们”一样革命精神旺盛，斗志昂扬，他们都能艰苦奋斗，服从抗战需要，努力工作，发奋学习。在抗敌剧社“少年儿童演剧队”中就有田华、魏风、郝玉生等队员，他们后来都成为名演员，名作家和摄影家了。西战团的少年艺术队中的李百万、甄崇德后来成为优秀演员和名诗人。后来成为文化部门、文艺单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

在敌后残酷战争环境中，有些少年儿童队员在与敌人战斗中牺牲，如抗敌剧社的宋玉田、陈雨然等。回民支队抗战剧社的少年歌舞队员在1941年和1942年冀中两次战斗中就牺牲了十几名队员，联大儿童团也有团员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 六、美术活动

1983年初冬，一部分晋察冀的老文艺战士到老区访问，一幅距今40多个春秋的巨大宣传壁画《看，鬼子又杀人了！》仍然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平山县陈家院的一座三连间砖房的后山墙上。40多年的风风雨雨，其间包括敌人多少次疯狂的大“扫荡”，乡

亲们一直不懈地精心保护着它。日军来了，乡亲们就把它糊上泥，打走了日军，又把它冲洗干净。壁画是美术家画的，但它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边区美术和边区人民的关系。

晋察冀的美术活动，是从八路军挺进敌后，边区建立之初就开始的。各部队宣传队、各剧社、各报社、各宣传部门的美术工作干部，是美术工作最早的开辟者，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战的美术作品。

1938年以后，西北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联大文工团以及抗大二分校等单位的一批具有专业水平及相当创作经验的美术家沃渣、陈九、丁里、田风、徐灵、孙逊、安静、钟惦棐、辛莽、秦兆阳、古塞、田零、李又人、娄霜、吴劳、焰羽、李劫夫、吴坚、靳夕、阎素、吴芬等同志陆续来到边区，晋察冀的美术活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通过办学校、开训练班，尤其通过他们丰富多采的各种美术作品，把他们自己广博的美术理论知识和较高的绘画技巧传授给土生土长的年轻新人，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美术人才，其中有高虹、秦征、曹振峰、王一之、常征、屠光、马秉铎、郑国强等人。边区的专业美术人员约在200人以上，业余美术爱好者就很难统计了。在抗战期间长期坚持美术普及工作的基础上，解放战争期间晋察冀部队开展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兵画兵”活动。

边区的美术活动，是服务于战争、战士、农民、工人和学生中的最迅捷，联系群众最密切的艺术门类之一。尤

其在文化落后文盲居多的地区，美术为人易懂的形象化特点，其优越性是明显的。美术工作者每到一地，便立即在群众的围拢中开始他们写美术字标语、画宣传画、素描、写生以及为群众画像等等活动。边区军民的战斗、生产、民主生活、文化娱乐，从站岗放哨到百团大战、从抢种抢收到坚壁清野、促宪会、选代表、上冬学、婚姻自主……无一不出现在他们的画笔和木刻刀下，有的直接画在农村大街的墙上，有些还配上诗歌。边区群众极其热爱亘古以来破天荒来到他们身边，描绘他们生活，表达他们意志的新美术。比如：尽管标语、壁画常常激怒敌人，把写有美术标语或宣传画的屋壁或院墙加以摧毁，但群众并不以为意，平时总是抢着让标语、壁画出现在自家房前或屋后；每当美术工作者书写时，群众就纷纷争着搬凳子、扶梯子、送开水，有的还送来干粮。群众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从底稿到墙上的一笔一画都议论短长；美术工作者随时都可能听到他们的好意见。绘画、又美又真。标语、醒目美观。白色字，红勾边；红色字，黑勾边；也有用投影方法凸出的。壁画，一般都三色组成，有条件则配以其它颜色。它们令人民喜爱，受到鼓舞。

美术创作的题材、形式、体裁是多种多样的。漫画、宣传画、招贴画、年画、组画、水彩画、连环画、黑板画、布画、木刻、雕塑、陶制锡制工艺作品以及油画，还有诗与画、歌与画，各色各样，应有尽有。

木刻发达。鲁迅先生当年提倡版画艺术，说它的特点就是便利战斗，是一种简单有力的武器。鲁迅先生的名

言，在边区变成了现实。边区木刻起步甚早，1938年10月26日《抗敌报》副刊《海燕》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刻制的鲁迅肖像。大批艺术家来晋察冀后，把边区木刻提高了一大步。

版画家，曾任过延安鲁艺美术系主任，抗战前即从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沃渣同志，来晋察冀后创作了大量反映边区军民战斗生活的作品。他的《夺回我们的牛羊》，以娴熟的刀技表现了“八路为人民利益而战”。《铁骑兵》是一幅表现八路军骑兵在太行战场上向敌人冲锋，钢铁意志、英雄气概压倒一切敌人的优秀作品。它是不但具有高度思想性，而且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这一木刻获鲁迅文艺奖。

徐灵是较早晋察冀开展美术工作、木刻作品最多的一位版画家。他的优秀木刻《选举》被收入了1972年日本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木刻》。他的木刻题材十分广泛，《日本之家》在当时就是获奖作品。被制成明信片，装入“慰问袋”在政治攻势中散发给日军士兵，起到一定影响，有的日本士兵还偷偷把它寄回家乡。

陈九的《运输队》，丁里的《拂晓袭击》，秦兆阳的《村干部会》，辛莽的《民兵》，吴劳、焰羽合作的《军民誓约》，阎素的木刻《坚壁》，尤飞虹的《送粪》等均为获奖作品。

《战地木刻》发表的大量木刻作品，是西战团艺术家们木刻创作的一部分。古塞的《轻伤不下火线》、《休息》、《为茂林惨案而呼吁》和李又人同志的《水磨》等，



都是很好地描绘了时代面貌的作品。在边区印刷工人帮助、合作下，把木刻原版装在印刷机上，印刷出来的作品，竟有锌版的效果。一般情况下都能套印三色木刻作品。

晋察冀的美术工作者很重视美术作品的展览工作，农村、街道、打麦场、连队的救亡室，常常有他们的展览。有时还把美术作品带到“敌后的敌后”进行展览，向敌占区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阶层的观众进行教育和鼓动工作。在1941年美协还成立了“边区美术工作队”，更好地推动轮回展览工作。

连环画、漫画，作品丰富，深受欢迎。1938年初，军区政治部石印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就不断刊登漫画和连环画，1939年并有连续漫画《李铁牛》连载，这是孙逊编绘的，共登40期，在战士中反映强烈，李铁牛成为他们的学习榜样。这类战斗性强而又大众化的美术作品在边区很早就出现了。孙逊的《不投降的姑娘》，曹振峰的《五勇士》都是获奖作品。曹振峰、王邦彦等不辞辛劳作画，并随身携带钢版，利用一切机会，把它放在膝盖上刻划，出版画刊。秦兆阳、丁里等的漫画，尖锐生动，给人以力量。

边区美术工作者，在利用、改革旧形式上，成绩是十分显著的。如西战团的美术家们把群众家家春节贴的门神的画面加以改革，刻印成色彩艳丽的英武的八路军和民兵形象，远胜过原来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模样，更不用说那面目丑怪凶恶的左神荼右郁垒了。这些“新门神”画在除夕

以前推出，大受欢迎。冀中区的美术工作者，冲锋剧社等团体的画家，在印制新创作的作品时，尝试使用杨柳青风格或旧年画色彩表现新的内容，也赢得了群众的赞许。

所有的报刊杂志以及《抗敌画报》、《冀中画报》、《战线画报》、《冲锋画报》等等，都经常发表美术作品。一些报刊也发表美术评论文章，美术工作者也有自己的画刊，如《晋察冀美术》和《战士木刻》等。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美术工作。边区政府特准在平山油盆的晋察冀钞票印刷厂为美术工作者印制作品。古塞的组画《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真相》，从构思到出版直接得到军区政治部负责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在对敌政治攻势中用“诗与画”的形式并印有日文说明的宣传品在敌人中间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反响。那一幅漫画组画《五次治安强化真相》使华北敌酋震惊，竟贴出告示，悬赏高价买作者的人头。

边区美术工作者不仅从事绘画、木刻等美术创作，还做了大量的布置会场和连队救亡室的工作，这些场合既有宣传画、漫画，又有美术字标语、美化的墙报等等，不仅有教育作用。而且能培养审美兴趣，这也是美术工作者的一大功绩。

边区美术理论工作也是比较活跃的，在《晋察冀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秦兆阳、徐灵、金肇野、沃渣、钟惦棐、唐炎、丁里、辛莽等同志的多篇文章，从创作到连环画、壁画、年画的专题讨论，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对创作有推动作用，其中关于民族遗产的继承与革新、外国美术成果的借鉴和吸收、美术大众化工作等方面的不少论点今

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 七、摄影和画报

人们在论及晋察冀摄影及其出版刊物事业时，便不由得想起聂荣臻、彭真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亲自批示拨专款，委托冀中军区程子华、吕正操等同志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从敌占区购进大批照相器材。由于他对摄影工作的关心和经常予以指导，并且不断地给予的物质支援，才使晋察冀新闻摄影事业，在极其艰苦困难的环境里迅速发展起来，极快地在军区建立了摄影网，并在山沟沟里出版了以照片为主的大型的《晋察冀画报》。这些，被大后方的爱国人士及来边区参观的国际友人称之为“奇迹”。

北方分局对摄影工作也是很重视的，西战团的摄影器材也是从敌占区买进来的。

沙飞拍摄过《鲁迅与木刻家》、《鲁迅遗容》、《上海各界为鲁迅送葬》等著名照片，1937年10月作为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到华北前线采访了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他是第一个参加敌后抗战的摄影家，是晋察冀摄影及其出版事业的创始人。

1939年2月，聂荣臻司令员为加强摄影在新闻、宣传中的作用，在军区政治部设立了新闻摄影科，调沙飞任科长。新闻摄影科的建立，为边区摄影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人民的摄影事业，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新闻

摄影过去也有表现，但更多是少数人的时髦行为，或个人兴趣的产物，而现在成了揭露敌人罪恶、歌颂中国革命斗争和人民新生活的重要形式。沙飞跑遍了各个军分区，深入连队，亲赴前线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为地方民兵、民主建设、生产活动等方面留下许许多多动人的形象。在沙飞推进边区摄影事业过程中，罗光达是他最早的合作者和战友，罗在1938年冬就和沙飞一起工作，随后又在新闻摄影科担任摄影干事。他不畏艰险，闯过紫荆关，拍摄过大龙华战斗。他不仅在冀西活动，还深入平西根据地地进行摄影。

1939年新年，沙飞、罗光达等同志选择部分反映八路军收复城镇，缴获敌人战利品以及当地群众斗争、生活的小照片，裱贴装饰后，在军区驻地蛟潭庄举办了晋察冀第一次影展。影展受到党政军民热烈欢迎，轰动四乡，参观者人数众多，象赶庙会一般。后来他们白手起家，四出网罗人才，在军区负责同志的领导和直接帮助下，从无到有，异常艰难地创造了从洗印、放大到出版等一系列摄影设备。

和边区所有文艺工作者一样，摄影事业的开创者们每人每天也是只有老秤一斤二两小米（有时还要节约二两救灾）和五分钱的菜柴金。困难时只有黑豆和野菜，物资极端匮乏。没有电源，以水壶提纯蒸馏水；自制滴漏瓶以计时间，黑矾代替硫酸铜；阜平枣酒代酒精；山西陈醋代醋酸……

1941年4月4日，《抗敌三日刊》刊登了摄影提供的



刚刚试验成功的铜版照片，大受欢迎。一时，“晋察冀的铜版”随着“陕甘宁的广播”一并传为佳话。

1942年5月，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地筹备，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7月7日，即抗战五周年纪念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了。画报的出版，力求做到了装璜美，印刷精，内容丰富多采。在当时战争环境中，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出版这样精美的画报，令人赞叹不已，誉为“奇迹的奇迹”。

遵循着聂荣臻“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光辉史绩反映出来”的指示，晋察冀画报在它的发行了4万余份的十三期画册里共发表了3000幅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晋察冀人民各个方面天翻地覆的伟大抗日战争史实。那些记录了黄土岭大战、陈庄大战、百团大战，记录了狼牙山五壮士、子弟兵生活、边区建设。军民关系、民主政治、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情景的清晰、生动的历史图画，至今仍使人激动万分；每一张表现敌人暴行的照片，都令当今的观众咬牙切齿。1988年11月出版的《人民战争必胜》——抗战中的晋察冀影集只选用了部队和地方所摄照片的很少一部分，就已使中外观众赞叹不已了。

当时摄影不仅强调思想性、多样性、战斗性、时间性，还尽可能注意到艺术性，现存的照片中还有不少是有一定审美价值的。

为建设晋察冀边区摄影事业作出贡献的还有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石少华等同志。在边区参加专业摄影工作的同

志在百位以上，他们都是怀着抗战救亡、怀着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从事这一工作的。他们爬山涉水日夜奔忙，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拍战斗场景，他们不顾危险，深入敌占区、游击区摄取珍贵材料，有的就牺牲在摄影阵地上。英勇的摄影战士，一直为人们所怀念。他们拍摄的许多动人场面，如沙飞的《塞山风云》、《沙源铁骑》，罗光达的《金顶妙峰山》、《肖克将军指挥战斗》，吴印咸的《白求恩大夫治疗伤员》，吕正操的《八路军铁骑驰骋冀中平原》，贾健、刘沛江的解放张家口系列照片之一的《进军张家口大境门》等许多著名照片，不仅被人们当作历史画页，并且视为艺术珍品收藏。

## 八、群众文艺活动和训练班

晋察冀建起了民主政权，人民群众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得到了改善，随之而来是要求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在自己的文艺活动中表达自己的革命感情，表达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的喜悦心情。他们用文艺歌颂抗战，也鼓舞自己的抗战热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等专业文艺团体的辅导、培养下，边区不脱离生产的村剧团、秧歌队、宣传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仅冀西就有 300 多个。望都县一个游击区就有 22 个。甚至在敌人“蚕食”掉的地区也有地下村剧团。如修着炮楼的平山回舍村，根据地每次会演，都派剧团来参加；排练，是在地窖里进行的，锣鼓家伙点都是用嘴“打”出来的。

部队业余文艺活动也是丰富多采的。每次集会，以排或连组成“啦啦队”，排连之间互相拉歌，简直象集体赛歌会，热闹非凡。抗敌剧社及各分区剧社的文艺工作者，是部队业余文艺活动的当然辅导者。抗敌剧社每年都为部队开办一次文艺训练班。分区剧社有条件的亦均如此。非部队文艺团体，同当地驻军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西战团每与连队邻近，必派人去教歌、教画画、教写标语、教指挥、教识简谱等等。炭灰铺的煤矿工人，曾得到冀中火线剧社专职文艺工作者的辅导。工人出身的艺术工作者鲁前，曾较长时间派往油盆印刷厂作文艺辅导，群众剧社以辅导和开办文艺班方式，帮助许多村剧团，作出了成绩。

群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编剧、导演、演员；需要自己能识谱、练唱、化妆；村剧团、歌咏队演出如何组织；节目内容如何充实……等等问题需要解决。西战团等文艺团体，勇敢地担当起建立和巩固村剧团、帮助群众不断提高村剧团水平的重大责任，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文艺知识。

西战团在 1940 年提出开展边区乡艺运动的号召，并在唐县、完县、易县开办了几期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两三个月一期，培训了大批乡村文艺运动骨干和县区文化干部。学员中不少同志被吸收到专业文艺团体，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解放以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田流、河北诗人甄崇德、歌唱家顾品祥、画家马秉铎、歌剧作家李建庆等都是乡村艺术训练班的学员。后来，边区战斗更加频繁，条件更为困难，但还是利用战争空隙，因地因时地继续开

办各种短期艺术训练班，培训村剧团骨干。1942年敌人大“扫荡”期间，凌风（凌子风）等同志把训练班一直办到五台山的大庙里。

每次办训练班，事先都经过严密准备，编写出全套教材，计划好教程。学员日常生活，一般由地方派人协助管理。

时间较长的训练班课程较多，除政治外，戏剧有编剧、导演、表演、化妆知识，利用民间戏剧形式等；音乐有识谱、指挥、作曲知识、唱歌方法等；美术有绘画基本常识，写标语法、画宣传画等；文学，包括一般写作常识介绍、报告文学、诗歌、小说特点等。

这些训练班还成立了文音美剧各种研究会，自愿参加。这使得具有某种特长和爱好的学员，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每期培训班都有实习，以对学员们的学习进一步检验和提高。实习包括排戏、练习指挥、试填民谣小调词、练习绘画和文学习作，编辑出版壁报等。实习演出、舞台工作都按正式演出要求，并有观众。一切由学员自己动手，教员一旁指导。1940年唐县、完县两个训练班的实习就演出了《谁是好孩子》、《组织》、《姚王桥》等话剧，演唱了二部合唱《风陵渡的呼声》、四部合唱《万岁啊，晋察冀！》。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还一起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样的大型歌曲，其中独唱全由学员担任，成绩之好，令人惊奇。

在专业剧团带动、帮助下，边区群众戏剧活动不仅在



战争中能够开展，而且在边区环境有所改善、开始稳定的条件下，规模、质量更加扩大和提高。1944年抗敌剧社辅导阜平县高街村剧团创作演出的新颖别致、融话剧、歌唱、舞蹈、快板等各种形式于一剧的《穷人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和极高的评价，被誉为群众剧运的方向。在它的影响下，冀中河间县护持寺村剧团、平山柴庄剧团和各地村剧团普遍开展了学习高街村剧团活动，积极创作和演出了各自的《穷人乐》式剧目，把群众戏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专业团体在与群众文艺活动密切结合过程中，尤其注意从群众中发现艺术人才。如当今著名歌唱家王昆、著名演员田华，都是西战团、抗敌剧社在当地演出、辅导时发现并吸收的。

部队也很重视战士的文艺活动和连队文艺人才的培养。军队抗敌剧社和不少军分区的剧社都办了不少连队文娱骨干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唱歌、教歌和美术人才，这对活跃连队文化生活、提高战士的音乐、美术水平和欣赏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通过文艺活动，在团结和教育广大战士，和睦官兵关系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 九、“政治攻势”

“政治攻势”是我深入“敌后的敌后”，对敌伪军和伪政权开展思想、心理攻势的一种宣传活动，也是边区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一种政治斗争。它是我八路军在敌后抗战

中举世罕见的创举。而大批文艺工作者参加到政治攻势的队列，并且作为重要方面军运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更是以往中外文艺史上绝无仅有。

政治攻势是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岗楼旁、壕沟里以及有伪政权的村子里进行，在敌火力射程以内，视线以内甚至面对面开展的。通过扩音喇叭把歌声和“喊话”直接传到炮楼上敌伪军的耳朵里；抗战戏剧也动员伪军出来坐在观众席中观看；宣传画、诗传单贴到敌伪军居室的大门上，刷在火车上，一直到平、津去“展览”……

敌工部、武工队的干部战士、文艺工作者，有时尚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或“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边区分盟”、“朝鲜义勇队”的朝鲜朋友，共同组成十儿人、二三十人或五六十或仅仅几个人的精干宣传队伍，带着轻武器，傍晚越过我们的警戒线，天黑翻过敌人的封锁沟到达伪制高点上的炮楼火力控制着的村镇。迅即布好岗哨，选定场子，集合群众。然后先演出，后开会……活动结束后，若天亮前能够返回我方警戒线以内，则连夜返回；否则，就隐蔽在其它村子的老乡家里。

每一参加政治攻势的文艺工作者，至少发给一颗手榴弹别在腰间，以备遭遇敌人时使用。

仅 1942 年三次政治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冲锋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七个艺术团体，就曾在游击区、敌占区演出 315 次，展览 109 次，写大标语 234 件，街头宣传 215 次，吸引观众 12.5 万余人，编大小剧本 188 个，歌曲 91 支，通讯、报

告、宣传诗等 154 篇。

值得着重述说的是在政治攻势中文艺团体的演出效果，简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奇迹。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话剧《慰劳》，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伪军队长的妻子，被日本军官抓去蹂躏之后，又被当作“慰劳品”赏给这个为虎作伥的伪军队长“享受”，伪军队长在不堪忍受的羞辱中，当场打死日本军官，投诚了八路军。这个戏给伪军演出时，每每满座哭泣声。一次有个伪军小队长，看过戏之后，当夜就请求敌工部的同志给他安排任务。

在日军碉堡附近的隐蔽地，把事先扎制的樱花树布置好，由“日人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对炮楼日军喊话，唱樱花歌（参加演唱的有王昆等）并提议共同欢度樱花节，然后用口琴吹奏一支日本歌曲。琴声終了，炮楼上的日军不仅热烈鼓掌叫好，并且也吹奏一曲回敬。这不但扩大了“日人反战同盟”的影响，并给厌战的日本兵暗示一条逃往边区躲避战争的道路。西战团的《哈娜蔻》，写一个日本人反战的故事，反战的日本人这个角色，由“日人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担任，演出时同样收到较好的效果。1943年敌人大“扫荡”期间，西战团几个同志（有凌子风、陈强等）在军区敌工部厉易的领导下，在繁峙川下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一个多月。他们演出的活报剧《活捉王家祥》对打击汉奸、坚定敌占区人民胜利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抗敌剧社的《弃暗投明》、《回头是岸》等歌剧、话剧在政治攻势中演出后，观众中常有些敌伪人员的家属特意留下来，向我们探听八路军对待敌伪人员的政策，并表示

要捎信给自己的儿子或丈夫，要他们不再给敌人作事，或者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看清形势留条后路。后来，不少伪军或做伪事的各种人员，纷纷向我们表示要“拉关系”、“擦黑点”、“将功折罪”。冀中的文艺工作者参加政治攻势中，散发歌篇，使不少厌战的伪军学会并唱起内容为离间敌人的《五更叹》，对瓦解伪军起到一定作用。

参加政治攻势的同志，均具有时刻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在炮楼林立并组织成交叉火网的“敌后的敌后”活动，时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严重情况。曾演过《日出》中小东西的抗敌剧社的演员方璧，就是在参加一次政治攻势的演出活动中牺牲的。崔品之被俘了。著名演员胡朋，也在这次演出活动中受了伤。

## 十、参加地方工作和连队工作

由于战争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了解生活、学习群众和所从事的创作的需要，晋察冀文艺工作者除了进行创作和演出外，还经常直接地参加到地方上做实际工作，参加到连队做政治工作，甚至有的还指挥战斗。

边区地方的一些文艺团体（以及在任务许可时部队的一些文艺团体）的同志，都积极地参加地方的各项中心工作：减租减息、村民选举、贯彻“双十”纲领、动员参军、动员做军鞋、缴公粮、抢收抢种、布置统一累进税、动员担架队、办冬校、民兵训练、优待抗属军属烈属、坚壁清野、参加反“扫荡”斗争等等。



文艺团体还经常抽调一部分同志较长时间地参加区、县群众团体的工作。西北战地服务团作为一个地方文艺团体，每年都有一批团员以区干部身份，直接参加地方工作，后来连穿的服装也从军服、干部服改成了和老百姓一样的“便衣”，以便工作。戏剧家牧虹，当年就被西战团派往平山赵各庄区参加区公所及青救会工会，著名歌唱家仲伟参加妇救会工作。仲伟同志在参加区妇救会工作期间，并曾勇敢地参加了区武装部部长指挥的袭击平山南甸以北炮楼、火力驱散敌伪修沟民伕队伍的战斗。

著名导演凌子风、崔克等同志曾亲身和地方干部一起，武装开辟繁峙西三区。西三区，是沦为敌占区的繁峙四、五、六区的统称。是位于平型关以南、五台山西北麓、滹沱河上游的一个三角地带。凌子风等同志白天隐蔽在山洞里或西台的寺庙里（穿戴上早已为我争取过来的五台山大和尚准备好的僧衣僧帽），晚上就下到沙河平原开展工作。他们和县、区干部一起，活捉并依法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伪军队长王家祥。

1942年，战争形势十分残酷，根据客观形势和斗争需要，挺进剧社分到平北一分区的同志们全部编入了战斗团，走上武装斗争岗位。剧社同志，有的任教导大队政治教委，有的当宣传干事，有的当军事教员；大部分同志直接编入战斗连队，担任文书、文化教员、支部书记等职务。他们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袁辅义，就是在连队当支部书记时，带队冲锋壮烈牺牲的。青年诗人陈辉，以县武工队政委的身份率领一

支由 60 多名青年骨干游击队员组成的队伍，出没于平西房、涞、涿一带山地平川，巧妙与敌周旋，出奇制胜，连连告捷。敌人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只好贴出告示，悬赏一千大洋收买陈辉的人头。他后来牺牲时年仅 24 岁。原西战团少儿队员，贾健身参加拍摄了 1945 年 8 月 24 日我军解放张家口进入大境门等一系列著名新闻照片，他在连队中竟指挥过一个正规营进行战斗。

文艺工作者直接地参加地方和连队工作，深入到斗争生活之中，不仅锻炼了意志，并且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加符合人民的需要，历史的要求。

## 十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和优良作风

边区文艺队伍是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继承和发展着红军文化工作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和晋察冀现实斗争生活相结合，和边区土生土长的民族民间文艺相结合，水乳交融，创造新型的、同现实斗争及人民感情密切相连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的、大众的抗战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战斗中和边区军民生死与共患难相处，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对我边区进行“蚕食”、“突袭”、“扫荡”、“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碉堡政策”、“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等一次次紧张、激烈、残酷的战斗生活中，磨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精神风貌日新月异。文艺工作者们不仅能文、能唱、

能演、能画、能摄影。许多同志还学会做地方工作，连队工作，辅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大批同志还勇敢地和敌工队、武工队一起到“敌后的敌后”去宣传组织群众，去瓦解敌伪军、锄汉奸。有的同志竟掌握了指挥战斗的艺术，西战团的曾平，辛毅还被派到北平等敌人占领城市搞地下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地区文艺团体之间、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团结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文艺工作团、剧社、宣传队虽有历史久暂之分，艺术水平也不相同，但都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发扬彼此的长处，克服彼此的缺点。在工作上、创作上、学术上，一起交换意见，有时你我之间也争得脸红耳赤，不可开交，但绝不会形成团体与团体的隔阂，个人与个人的成见。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对立情绪，团体之间如此，个人之间也如此。

领导和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业务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事务工作者之间，一律平等相待，亲密无间。行军时，男同志抢着为女同志背背包；驻军时，女同志争着为男同志缝缝连连。大同志总忘不了夜晚为小同志盖被子；小同志早晨则高高兴兴给大同志打盆洗脸水。如兄如弟，似姐似妹。有时也叮叮咣咣争吵，但过后仍是好同志，毫无忌恨。越是战斗紧张，越是环境艰苦，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越显得诚挚、珍贵。枪一响，彼此就手拉手地奔赴同一战场。

民主空气较为深厚。集体生活带来彼此互相了解，包括脾气秉性。重要创作，一个剧本、一支歌、一次演出，

大家都热心参加讨论，意见不管多少，看法是否正确，都是言者主动，听者尊重。如果有谁不关心本单位的创作、演出、工作、不参加讨论，无疑会遭到旁人的不满。领导者平时虚心参加各队、组业务工作会，或参加各班甚至少儿队的生活检讨会诚心诚意检讨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司空见惯的事。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诚然是最好的领导，由此而生发的凝聚力、号召力是无可比拟的。

每逢发鞋子、发衣服，最后去领取的，往往是领导者。行军时，配备给领导干部的骡子或马匹，每每都是让给病号或女同志骑着。号房子，连打前站的同志都遵守着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最好的房子分给女队而不是领导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体弱的同志，对党外高级专家、技师，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健康津贴或开小灶，而领导者则在大灶和大家一起吃黑豆、野菜。

文艺战士之所以为文艺战士，在于自觉。每个同志，随时随地把自己作为革命集体的一员，革命集体的代表。集体主义深入每个同志的心灵。一言一行，同志们都以主人翁的姿态随时注意将要产生什么“群众影响”，产生什么“八路军影响”、“党的影响”。一诗一画一歌一剧，都要随时考虑将要产生怎样的“读者反映”、“观众效果”。

他们也有“自我”，那就是不为自我的自我牺牲精神。

作曲家、演唱《黄河颂》十分受听众欢迎的男高音歌唱家赵尚午，为了抢救一位战友的婴儿，牺牲了，撇下了自己的遗腹子。

尖兵剧社社长、剧作家黄天，为掩护剧社的同志们突



围，被敌人重重包围，用剩下的最后一粒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右太阳穴。乐队队长今歌，誓死不投降，牺牲在日军刺刀下。诗人史轮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在敌堡里。

联大文工团团员，虚岁才 14 岁的小姑娘陈芸，面对日军刺刀，英勇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

诗人陈辉，被敌包围，身负重伤，拉响手榴弹和前来抓他的敌人同归于尽。

.....

晋察冀边区各地烈士陵园，诸多文艺工作者烈士的名字，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生者。

人们永远怀念那些不为自我而自我牺牲的烈士们！

1943 年边区文艺开始整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思想上受到很大教益，他们自觉地以《讲话》精神联系边区和自身的文艺实际，作了严肃认真的对照检查。他们肯定了自己用文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和群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和广大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等正确做法。也深刻检查了在深入斗争、深入群众生活方面还有不够的地方，在思想要求方面有时还不够严的缺点，认识到反映人民斗争的优秀作品还不很多的欠缺，从而更自觉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在更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上山、下乡、入伍掀起热潮。诗人田间下到雁北一个县的县抗联，邵子南当了阜平的小学教员。冀中火线剧社许多同志到了炭灰铺煤矿，部队剧社的许多同志下到连队当兵，当指导

员，……邵子南由于在地方上工作表现突出，被选为模范工作者，参加了1944年边区召开的群英会。

边区文艺工作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艺术修养、艺术技巧方面的提高也还很不够。因此在深入现实斗争的同时也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努力创造了一批具有高度艺术性和高度思想性的深刻完美的作品。如话剧《李国瑞》、《李殿冰》、《王瑞堂》、《戎冠秀》、《洛唐歌》、《粮食》、《我们的母亲》，歌剧《团结就是力量》、《过光景》等。

晋察冀边区广大文化工作者经过整风学习，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水平和理论修养，更加深入斗争，与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更加积极地进行创造，更加认真地向民族艺术的优秀遗产学习，向外国进步文艺学习，奋发有为，向着党的“七大”提出的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 \* \*

晋察冀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共有文艺工作者3000人左右，其中有不少著名人士，文坛老将，他们不会是没有作为的，不会不在历史篇章上留下光辉一页的，也不会不对胜利后的新文艺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的。他们不但有很丰富的、带有开创性的可贵的文艺经验，而且写下大量的文艺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戏剧创作有600多个，歌曲创作还没有完全统计过，肯定是四位数的。文学、美术创作数量也很大，这当中有很多优秀作品，可惜由于战争关系大部分作品已经丧失，留下来的是极少的部分了。

战争胜利后晋察冀这支 3000 人文艺工作者队伍散布各地，主要在北方，更多的集中在北京，他们是中国文艺事业的骨干，文艺创造的名家，几十年来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忠诚，他们卓有成效的创作和工作成绩，他们同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团结协作的精神，不但说明这支文艺队伍善于学习、长于创造、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前进，同时也证明他们在晋察冀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时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根据实际情况晋察冀文艺的影响，超逾了晋察冀边区的地理限制，也超逾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年的时间限制。不少作品不仅当时在边区流行，而且在延安等革命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国统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到今天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它们还将长期发挥作用。

经过几十年来的文艺实践，经过战争和多少次风风雨雨的政治考验，证明晋察冀这支文艺队伍是可信可靠的队伍，是具有光辉业绩的队伍。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马明方\*

强晓初 李力安 姬也力

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活动转入地下，转向武装斗争。

在陕北地区，盘踞在榆林的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疯狂的“清党”运动。1927年8月4日，井部旅长刘润民军包围了绥德师范，命令全校师生全部离校，焚烧了进步书刊，一时火光冲天，喊声一片，校长常汉三愤慨痛哭，学生们一个个被迫走出校门，受到严格的检查，绥师教员、中共绥德地委书记蔡楠轩和中共绥德地委宣传委员关中哲以及党员教员雷五斋、赵少西等被驱逐，校长常汉三禁居绥德，三年不准任职、任教，不准离开绥德。与此同时，延安驻军高双成部参谋长张采芹亦奉令封闭了延安四中，延安地委书记、四中校长田伯萌被软禁在校，大部分教师被遣散回家，尔后由反动分子冯楚锡接任校长，对学校进行

---

\* 本文节选自《马明方传略》。该书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改组，党、团员多数被迫离校。井岳秀部驻地榆林也下令通缉榆林地委负责人马云程、周家干、郭洪涛、杜年德等七人，他们随即离开陕北。党、团组织大多数陷于无人主持的散乱状态，革命迅即转入低潮。

1927年9月，陕西省委陆续派人到陕北恢复和整顿组织，1928年4月，陕北特委成立。1931年1月马明方任特委委员。

### 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聚革命力量

1927年下半年至1932年，陕北党组织处于秘密工作时期，马明方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聚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下半年，马明方任横山区委书记，在横山响水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当时，响水堡小学校长曹亚华，教员强雄飞等都是党员，街上也有些党员，他在响水堡积极开展了党的工作，在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响水堡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后来大多数参加了陕北游击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1928年至1929年，马明方，先后在绥德北区、东区、四十里铺工作，担任绥德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巡视员等职。

在北区任区委书记期间，前半年是在杨家沟小学教员掩护下工作的。校长马醒民，是杨家沟的大地主，教员和学生大部分是本村人，地富子弟多，和外村联系很不方便，半年后马明方就离开学校了。当时与马明方取得了工

作联系的有李林威、魏锡九等，他们所在地区的工作有进展，发展了一些农民党员。

1928年下半年，马明方没有社会职业作掩护，以绥德县委巡视员身份，到各区巡视和帮助工作。1928年8月，马明方和景仰山到绥德南区巡视工作时，在铁茄坪无定河畔开了区委会议，要求党员深入群众，大胆开辟工作。当时南区区委书记崔田夫，雇农出身，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威信；区委领导成员崔田民、崔正冉等能密切联系群众，所以南区铁茄坪一带，农民党员较多，群众工作基础很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随后，马明方又去绥德城区、东区巡视工作，发现东区义合镇马家川一带工作较差，便指导党员积极在群众中开展工作。雷家沟、深沟里、义上坪一带工作较好，区委负责人刘汉武、霍维德等同志工作积极，这一带有一个小学校，冬天有冬书房作为党组织活动的场所，党员数量和党的工作有所发展。马明方对区委的领导人员做了调整。这半年来，马明方在巡视各区委工作时，向很多党员和群众进行了调查，对农村情况和党在农村的工作，有了较多较细的了解。他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重要性。陕北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深受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生活极端贫困，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如果脱离农村、脱离农民，革命斗争是不能成功的。

1929年，马明方任北区区委书记，在四十里铺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工作，校长是一位农民，教员马绳武等都是党员，农村、街上、学校中都有党员、团员，党

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在学校师生和农村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当时北区建立起四个支部，党员发展到 20 多人，都是农民和雇工。

1929 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吞糠咽菜，不能一饱，地里的野菜挖光了，榆树皮也几乎剥光了，百姓饿得没办法，成群结队逃荒讨饭，到处都有抬龙王楼子祈雨的人群。“黑龙大王老儿早铺云头，下普雨哟！”的呼叫声此起彼伏，有的党员自动地带领饥民结队成群吃大户，打税局，闯衙门，有的饥民问我们的党员：“平常你们宣传闹革命、闹翻身，现在怎么办？”当时绥德县委书记周发源一心做生意，工作消极，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马文瑞，到米脂参加陕北团代会时找特委委员刘志丹、县委书记白乐亭等研究如何拯救饥民问题，刘志丹同志提出：“发动饥民斗争，向地主和官府要粮。”马文瑞回绥德后，向县委传达了这个意见，决定通知全县党团组织，发动群众于 7 月某日，齐集绥德县城向地主官府要粮，当即用鸡毛信传遍各区。马明方接到通知后，立即作了部署。由于他是小学教员，不便公开进城，便组织农民党员带领群众进城。到了约定的日子那天，四、五千农民背着口袋，拿着镢头，浩浩荡荡地汇集绥德县城。驻军营长张建南看见群众声势浩大，下令关闭四门，士兵荷枪实弹，守在城墙上面，但饥饿愤怒的群众，不畏强暴，挤开城门蜂拥而入。张建南下令朝空鸣枪，但仍然阻止不住如潮水般的人群。当时，县长和士绅正在开会，闻讯张皇失措，用绳子拴在腰里缒城而逃。群众找不到县长，就在地主家里挖粮，但不知藏处，

没有挖出粮食，于是齐拥到一个山西资本家制蛋粉的鸡蛋厂，动手打砸，抢吃蛋粉，这就是有名的“打蛋厂”斗争。张建南感到事态严重，派人同县长商量后，劝说群众出城，但群众坚持不给救济，决不出城。最后不得已在南城搭起台子，给每人发放一块银元。当时进城的党员很多，绥德四师（此时已复校）的党团员李光白、党永亮、许金何、贺晋年、吴志渊、白如冰、白寿康等也化装成农民在群众中做工作。有的同志提出，要把经济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马文瑞召集各区进城的负责党员研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斗争应适可而止，于是动员群众陆续出城。这次饥民斗争，是陕北党组织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说明这个时期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0年，马明方任镇川区委书记（直属陕北特委领导），1931年陕北特委决定，米脂、佳县和镇川两县一镇，合并成立中心县委，马明方任县委书记。此期间，他一直以镇川小学教员为掩护进行工作。镇川小学校长刘绍让、教员崔明道、李俊藻、刘述向、杜宏亮都是党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党员发展到60多人，团员发展到23人，在镇川堡、上盐湾和无定河以东的农村中，建立起几个支部，建立起盐工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开展了抗租、抗税、抗捐等斗争，并开始酝酿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0年4、5月间榆林国民党特派员孙士英带兵到



镇川，对镇川小学进行了搜查，毁掉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但党的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党的工作没有停顿，而且继续向前发展。

这个期间，马明方还以特委委员身份，到绥德西川一带巡视工作，他到过周家峪、苗家坪、三皇峁等地，那里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都有发展，群众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一度处于涣散、停顿、无人领导的状况，经过恢复整顿已经有所改变。此期间，由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的影响，城市中党的组织和军队中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力量有所削弱，但党在农村中受到的影响不大，农村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都有较大的发展，陕北党组织几年来秘密工作期所集聚的力量，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正当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的时候，马明方受到敌人的通缉。1931年3月，马明方回家时，被衙役捕捉，他奋力挣脱，头发被揪去一撮，幸得村人救护，得以逃脱，村人李禄喜护送他渡过黄河，马明方到了太原后，同山西特委刘天章取得联系，他向刘天章报告了他被捕逃脱的经过和他所知道的陕北的一些工作情况，要求山西特委将他被捕逃脱的情况报告陕北特委，并要求山西特委给他分配工作。刘天章要他暂等一等，待陕北特委来信后再决定他回陕北还是留在太原工作，他在太原住了30来天，山西特委分配他在太原市摊贩中工作（也叫互济会的工作）。有一天，他回到所住的会馆，会馆里乱哄哄的正在捕人，马明方回头就走，走出大街口时，也被捕了，被捕的人先集

中在一个房子里，他趁空隙把小本子上记的简单的工作要点撕毁，以防止敌人检查。同时被捕的人中他只认得陕北的马子敬。不久，敌人传讯，他编了一个供词，说他叫赵得胜，山西碛口人，父亲在北京做生意，他是在去北京看望父亲，路过会馆门口时被捕的。敌人未加深究，将他释放。随后，山西特委任他为巡视员，去晋北巡视工作。他在大同和附近的煤矿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回到太原汇报工作，但当时太原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无法找到关系，所以又返回陕北，住在下盐湾，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取得联系。从此以后，马明方就不可能利用社会职业作掩护来进行工作了，于是就在特委专职做党的工作。1932年冬，赵伯平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马明方任特委代理书记。此时增加马文瑞、王兆卿为特委委员。

## 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在井冈山道路指引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坨召开，由马明方主持。这次会议对于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出席会议的人员除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丹、王兆卿、常学恭（后叛变）、崔逢运、鲁学曾（鲁贲）等同志外，还有各区代表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赵福祥、高长久、张岗、张达志、贾怀智等18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开展陕北游击战争问题。马明方在政治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陕北革命斗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充分说明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报告

中指出：陕北统治阶级残酷地压榨老百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租、高利贷剥削很重，老百姓已经到了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引起陕北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陕北地广人稀，山多沟深，而井岳秀军力单薄，除各县城和较大的一些镇子里驻有少数敌军队外，广大农村没有驻军，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陕北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联系着广大的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陕北特委已建立的游击队第一支队坚持斗争一年多了，可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又有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影响和有力支援，只要党的领导正确，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马明方的报告。会议决定：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物，分配给劳动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展党和团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同时决定：（一）扩大第一支队，创建安定（今子长县）游击区。（二）建立第二支队，创建绥清游击区。（三）建立第三支队，创建神府游击区。这三个地区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首先在安定地区、绥清地区、神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北起府谷，南接延安，便于打击敌人，扩大党的影响，互相呼应。会议决定，派毕维舟任第一支队政委，王兆卿协助整顿一支队的工作，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到绥清组建第二支队，马文瑞到神府组建第三支队。

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在选举前，已经酝酿选举马明方为特委书记，可是，崔逢运说：中央驻北方代表指示，书记要选工人当，他提出绥德的一个木匠贺牛任书记，大家不同意，商议的结果大家选举崔田夫为书记。因为崔田夫是雇农又是很老的党员，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强，勇于对敌斗争。会议选举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舟、王兆卿、崔逢运、鲁学曾、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等 11 人为特委委员，马明方任宣传部部长、王兆卿为军委负责人，崔逢运任秘书长，毕维舟任组织部长，张达志为农工部长，鲁学曾、马文瑞、崔田民负责团特委工作。鲁学曾离开陕北后，马文瑞任团特委书记。

会后特委同志分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毕维舟和王兆卿到安定第一支队，高禄孝去一支队给特委取活动经费，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到米脂县姜家新庄起草会议决议。其他委员分赴指定地点传达会议精神。毕维舟、王兆卿、高禄孝去安定时途经镇川堡，住在该镇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米脂国民党驻军的一个特务董佩义，混入共产党，和共产党员高庆恩住在一个院里，侦察到党的一些活动情况，董佩义即带敌军首先逮捕了共产党员高庆恩、王守义，接着带领敌军去镇川抓崔明道。适逢毕维舟、王兆卿、高禄孝在崔明道家里，于是这四个同志同时被捕。敌兵在董佩义带领下又去姜家新庄捉拿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幸亏这个村子群众的觉悟高，看见国民党军队进村来了，就大呼：“白军来了！”马明方、马文瑞、常



学恭闻声跳崖逃去，敌人扑了空，随后跟踪追捕，被群众指到另一条沟里去。马明方、马文瑞等脱险后，到镇川去找崔明道，从群众口中得知崔明道等四个同志被捕，于是又分路转移到佳县南圪村。被捕的毕维舟等六同志，在米脂城内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四天之后，被敌人杀害在十里铺无定河畔，这就是“米脂事件”。马文瑞后来写了一篇《无定河畔的六烈士》，寄托深切的哀悼。

“米脂事件”发生后，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常学恭、高长久在佳县寨子沟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崔田民去绥清巡视工作，未参加），分析了事件发生后的形势，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特委两位委员和四位同志遇害，但陕北党、团组织没有受到破坏，并在继续积极活动，一致表示，要以对敌人更大的仇恨坚持斗争，坚决实现扩大会议的各项决议。当即决定：派常学恭去北平汇报工作，特委委员分头到各地传达扩大会议精神，整顿组织，振奋党员革命精神，加强组织纪律和保密工作。这是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坚定了陕北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会后马明方去安定帮助第一支队和地方工作，马明方未到安定时，得知一支队失败，他又回到佳县。

扩大会议之前，崔正冉、王巨德搞到土匪的三支驳壳枪，开始了打土豪的活动。扩大会议之后，8月5日，崔田民根据特委决定，在清涧王家山宣布正式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由高朗亭、崔正冉、王巨德负责，在绥德南区和清涧东区一带活动。旧历8月15日，杀了绥德南

区区长薛运统，旧历 12 月 7 日，在清涧解家沟杀了土豪劣绅收款衙役九人，砍伤一人，人称杀了九个半，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九十月间，根据特委指示，将特务队改为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活动于神木南区一带。

至此，陕北已有三支游击队，建立了安定、绥清边、神府一带三块小的根据地。

1933 年 12 月下旬，郭洪涛、李铁轮奉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回到陕北。郭洪涛被北方代表指定担任特委组织部长。在此前，11 月 17 日北方代表委任谢子长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

1934 年 1 月，陕北特委在佳县曹家坳村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李铁轮等。会上郭洪涛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北方代表听了不符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实际情况的汇报，认为陕北特委把二支队的三支枪调给三支队是取消了绥清游击队的活动。一支队冒险攻坚，没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后又未采取分散活动，而是埋了枪支，散了队伍。中共北方代表们据此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和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马明方、马文瑞等进行了抵制。

实际情况是：1933 年 9 月，特委决定将二支队的三支枪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保卫特委，不久，特务队取消，将这三支枪调给神府三支队。二支队的番号并没有取消，先后又搞到四支枪，在绥清地区活动。安定一支队的

失败，是他们 11 月下旬从陕甘边回来后，打了几个败仗，队长、政委先后牺牲，一时群龙无首，埋了枪支，不久特委派人取出枪支，继续活动。谢子长回到安定后，迅速恢复了一支队，扩大了游击区。所以不能说特委犯了什么路线错误。郭洪涛在后来也认为他传达北方代表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并做了自我批评。

曹家坬会议对陕北革命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总结了过去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一年来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已有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已传到陕北，对指导陕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起着极大的作用。会议强调指出，只有发动武装斗争，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而这种武装斗争，必须是乡村游击战争，而且必须同群众结合起来，为群众利益而战，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武装斗争，必须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而建立政权以为活动的依托和目的。会议决定：扩大和发展一、二、三支队，新建绥、米、佳、吴边游击根据地。同时决定，健全党、团组织，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组织，广泛开展抗粮、抗税、抗租、抗债的群众斗争，坚决打击反动势力。

会后，马明方到米脂组建米东县县委，马文瑞去三边做兵运工作，郭洪涛、高长久、李铁轮到吴堡找马佩勋成立了四支队，绥德党组织负责人与崔正冉等建立了五支队。游击队和根据地都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1934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府沟

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高长久、张达志、崔田民、李铁轮等七人。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并提出为创造一师红军而斗争的奋斗目标，组织突击队，武装公开村庄，扩大游击根据地，把分割的各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会后召开了一次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的联席会议，具体部署会议各项决议的实施。根据会议的决定，马明方、李铁轮留特委机关工作，并筹备把机关迅速转移到清涧，其他委员赴各地指导工作。

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于7月8日在安定扬道岭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即带领一、二、五支队，在数百名赤卫队配合下，一举攻进安定城，歼敌数十人，打开监狱，放出被捕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逾百人，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其时，马明方、李铁轮在佳吴积极开展工作，随后，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东区，马明方留住特委机关工作。

此期间，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余县。红色村庄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8月间，已经形成村村相连的四大块根据地，即：神府边；绥、米、佳、吴边；绥、清、延川边和安定一带（包括横山、米西、绥西等地区）。

1934年6月，崔田夫去天津向北方代表汇报陕北工作时，马明方同崔田夫商定了汇报内容，提出统一陕甘边



和陕北的领导，确定陕北红军的番号，给陕北派干部等重要建议，得到北方代表的同意，并派黄汉和韩鹏飞向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做了传达。

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的时候，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开始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直属一、二、五支队于八月返回陕北，在苏区广大群众和赤卫队的配合下，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除神府苏区外，其余三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纵横数百里，人口40万。

1934年9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圪里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将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团（后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并决定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分配土地。马明方分管政权建设工作，很快组成陕西省苏维埃筹备委员会，展开了政权建设工作。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特委在赤原周家岭召开了联席会议，统一领导两个苏区和两支红军，原陕北特委撤销，所属各县委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仍保留，刘志丹、高岗、马明方、郭洪涛参加了会议，马明方任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苏维埃主席。这次会议为粉碎第二次“围剿”在组织上、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并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年5月西北工委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

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刘志丹指挥下，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

马明方没有参加前线军事指挥，但他同特委其他同志领导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赤卫队、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站岗放哨，清查敌探奸细，监视敌人活动，带路送信，组织担架运输，安置慰问伤病员等，在新开辟的地区，摧毁地主统治的乡村政权和旧秩序，建立贫农会，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 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分配

从1934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陕北先后成立了1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称革命委员会），即：吴堡、佳县、米东、绥德、清涧、延水、延川、延长、赤原、靖边、安塞、横山、米西、秀延、神木、府谷、佳芦。1935年1月29日至31日，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白庙岔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县代表150多名，马明方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就建立和加强各极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分配，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马明方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省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粮食、财政、教育、劳动、内务、贸易、保卫等部门，后来又设立了巡视员。会议还通过了《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1月

31日，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在马明方领导下，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兴办教育。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马明方经常到各地指导工作，他到秀延县检查工作时，正遇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强晓初在场院召开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站在一棵树下仔细观察，强晓初当时不认识他，问他姓名之后，方知是马明方（其时他化名李明方），强问他这个会开得怎样，他说，这样很好，后来他对特委同志讲，有个青年娃娃主持大会，开得很好。后来强被调任陕西省苏维埃巡视员。

马明方平易近人，工作踏实，下去巡视，检查工作的同志和下面来的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问得非常仔细并给以具体指导。有时睡在一个炕上，谈到半夜。他没有一点架子，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给干部很大的教育和帮助。当时，省苏维埃还办了县、区干部训练班，魏怀里、强晓初、谢怀德等都在训练班学习过，各县苏维埃也都办了短期训练班，训练区、区级干部。马明方曾给训练班讲过党的建设、苏维埃工作等课程。这些训练班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县、区、乡干部，对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陕北的土地分配是1934年9月正式开始的。为了取得土改的经验，郭洪涛等到清涧袁家沟搞了土改试点。袁家沟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

- (1) 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
- (2) 中农土地不动；
- (3) 红属、贫雇农分好地；
- (4) 参加革命的富农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分给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其他富农分坏地；
- (5) 参加革命的地主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同农民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
- (6) 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

这些政策措施，特委同志一致同意，并编成教材，组织训练班，培训干部。这些干部经过培训以后，派往各地进行土地分配工作。马明方也到一些地区巡视指导土地分配工作。

在分配土地中，有的地方动了中农的土地，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有的地方不加区别给富农一律分远地坏地，给地主一律不分地；有些地方将地主、富农、商人农民的契约全烧了，有的地方侵犯了工商业。马明方发现这些错误做法，随时报告特委，加以纠正。

尽管在土地分配中发生过某些“左”的偏差，但这是陕北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广大贫雇农分到了土地，革命热情更高，绝大多数中农的土地未动，而且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推翻了封建统治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他们对革命也是真诚拥护的。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革命斗争更加向前发展。

#### 四、贯彻执行中央到陕北后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35年12月，刚从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随之颁布了一系列调整阶级关系的新政策。1936年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决定》，规定富农土地不动；8月6日，发布了《土地政策的新规定》，规定地主与农民一样分地，留够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陕西省委和省苏维埃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各项决定，在一切尚未分配土地的地方，按新规定分土地；在已经土改的地区，凡未给地主分地的，也进行了必要的调剂。并对回到陕北的逃亡地主，做了适当的安置。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部队和机关人员的供应问题。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林伯渠曾找马明方商谈如何解决供应问题。马明方、霍维德、艾楚南等同志，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把没收地主土豪的银元和物资上缴中央，动员妇女织了许多毛衣、毛袜和缝制许多军鞋给部队穿，动员群众拿出粮食给部队吃，组织商人到山西等地买回大批布匹和棉花，做成军装供部队穿，终于渡过最初的困难。

1935年11月下旬，林伯渠、毛泽民和马明方等在瓦窑堡召开了陕北各县、区的财政工作联席会议，编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统一了财政，建立和健全了财政制度和机构。

1936年5月24日，省委、省苏维埃发出紧急动员收集粮食的号召，决定进一步向群众借粮2000石，买粮2500石，6月底以前完成。同时发动群众送粮慰劳红军，

各机关开展节粮运动，以保证红军供应。

1936年1月15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公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陕西省苏维埃指示各县按照选举办法，选出陕西省苏维埃代表。3月10日，陕西省苏维埃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339人。吴亮平、王观澜等先后致词，马明方作了报告。大会选举马明方、霍维德、艾楚南等49人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在16日举行的第一次执委会上，推举13人组成主席团，马明方任主席，霍维德任副主席。

在红军东征和西征时，马明方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同时号召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争取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1936年7月，马明方在党中央办的《党的工作》第三期上发表《游击区域的苏维埃工作》一文，文中指出：“主力红军向西行动之后，党中央明确的给我们指出：陕北的主要任务是支持着顽强的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第一位重要工作是积极领导游击战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原来的游击队，创造新的更多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使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如蛛网般普遍地发展起来，在敌人的前方侧方后方去行动、袭击，以至消灭进攻我们的敌人，而决定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是全体赤卫军和全苏区群众的总武装与总动员。……使群众的武装动员和游击队的行动打成一片。”“苏维埃应在边界和工作薄弱的地区，加强侦探网的布置。要将得力的可靠的同志打进民团、保甲、白军部队作

间谍。对于豪绅地主和对苏维埃表示不满意的可疑分子，应监视和侦察他们的行动。”“白军长官士兵一般地存在着抗日与同情我们的情绪，苏区的每个男女在接近白军士兵长官时，应当注意做争取他们的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建立白军中上层和下层关系，争取一切可能，与敌人建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等协议。”“在土地革命未解决的地区，必须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使群众在封建地主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而能更坚决为着自己利益而斗争。”“最后我们的同志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应当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为着巩固和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创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马明方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陕西省苏维埃的动员令，对当时陕北革命斗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1936年9月，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被中央任命为陕西省委书记。

1937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党委。5月2日至14日，全国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正式代表226人，列席代表74人，马明方为正式代表，并被选入主席团。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郭洪涛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马明方当选为委员。陕西省委随即撤销。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央决定马明方为边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后因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于1938年8月去苏联治病。

# 1956年国务院体制会议介绍

李 兵

1956年，是我党历史上思想解放的一年，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可喜一步的一年。这一年夏季，由周恩来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及会议制定的经国务院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是党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一次重大成果，掀开了我国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由于历史的原因，1957年开始的我国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在1958年因“大跃进”运动的冲击而受挫，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以及他在体制会议上的讲话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参考作用。

## 一、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从国内条件来看，这一年，我们国家完成了三大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三年多，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起草。建国七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积累了许多宝贵



的实践经验，就国家经济体制来说，经过国民经济恢复、“一五”计划建设，在继承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和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来讲是适合我国的经济状况的，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逐渐扩大和三大改造的完成，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和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主要是国家集中过多，中央集中过多，妨碍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1956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觉察这一点，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尖锐的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国家和工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便调动和发挥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主义建设搞的更好。

从国际条件来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来也暴露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缺点和错误。诸如忽视农业，中央集权过多，把农民搞得太苦等等。毛泽东要求大家要以苏联的教训为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少走一些弯路。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已经把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的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195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指出：毛主席讲的这十大原则，十条方针，把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总结了，也把国际的经验吸取了。他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具体剖

析了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所以要研究体制问题，一方面是总结我们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国家。

为了研究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于1956年5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思想武器，上下结合，通过认真讨论和检查，找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保证重点建设和支援边远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则下解决中央与地方分工的问题，解决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事业的分级负责问题，下放一部分权力和企业，以加强地方和下层企业、事业单位的职权，大家挑担子，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 二、会议的概况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国务院于1956年5月4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通知，指出国务院定于5月11日召开体制会议，研究有关计划、财政、经济、事业、组织等方面的体制问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须由省长、主席、市长、或者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副书记一人参加。并准备有关计划、财政、经济、事业、组织等方面体制的问题和材料，于5月10日前到京报到。

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体制会议所涉及的问题很重要又很广泛，各部、各委员会和直属机构，必须确定一位副部长（或者部长助理）、副主任，局长或者副局长负责研究

部门主管工作中的体制问题，并参加体制会议讨论主管工作问题的会议，必要时并应参加或者派人参加讨论其他有关问题的会议。周恩来还要求各部门负责研究体制问题的负责人，必须将本部门所准备的问题和意见，会议进行情况和会议上提出有关本部门工作中的意见和问题，随时向部、委、局务会议提出汇报，进行讨论和处理。

会议于5月11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体制研究的省长、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副书记27人，以及国务院各部委有关负责同志。

会议成立了七个体制问题研究小组：

1. 财政组：组长金明、副组长骆耕漠。

2. 计划组：组长张玺、副组长杨英杰。

3. 工业组：组长贾拓夫、副组长彭涛、谷牧、宋劭文。

4. 事业组：组长王首道、副组长廖鲁言、钱俊瑞、牛佩琮。

5. 基建组：组长孔祥楨、副组长万里、周荣鑫。

6. 政法组：组长罗瑞卿、副组长高克林、陶希晋、王翰。

7. 综合组：组长习仲勋、副组长张策、常黎夫。

各组日常工作的问题，财政组请示李先念副总理解决；计划组请示李富春副总理解决；基建组请示薄一波主任解决；工业组由贾拓夫主任解决；事业组由王首道主任解决；综合组由习仲勋秘书长解决；政法组由罗瑞卿主任解决（罗瑞卿不在京时，可请示习仲勋）；重大问题提交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

会议从5月11日开始到8月28日结束，共进行了三个半月。

会议大体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5月11日至7月22日，主要是按七个小组分别讨论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工业体制、事业体制、基建体制、政法体制、检查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第二阶段从7月25日至8月28日，在前一段分组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和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一开始叫改进国家体制纲要）。前一段分组会多一些，后一段大会讨论多一些。

会议在召开过程中注意了上下结合。会议期间国务院多次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有时与体制会议结合进行，听取体制会议情况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周恩来一再要求国务院各部委都要指定一位部长、副部长，或者是部长助理、委员，负责研究本部门的或系统的体制问题，并参加体制会议的各种会议。要求各部委认真纠正不愿意把业务下放的倾向，摆脱“左支右绌，东倒西歪，日夜劳累，腹背受敌”的被动状态。腾出手来，抓更大的问题和经常下去检查，真正加强领导。国务院还就这一问题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国务院部委要认真派人参加体制会议，并讲出本部门和自己的看法，与各省（市）同志详尽地交换意见，做到上下沟通，取得一致。

会议在召开的过程中，还注意了内外结合。在会议开始时，会议要求各地方的同志研究问题时，应当随时和家



里联系，取得配合。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就与本单位有关的问题，及时向部长、主任汇报，在部委的行政会上进行研究。

会议在召开过程中，还注意了大小会的结合。为了避免泛泛地摆情况，摆问题，漫无边际的现象，会议强调开好小组会，特别是在第一阶段一般不采取开大会讨论的办法。要求各小组在开会前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开始时各小组一定要先提出报告，然后讨论，准备好的小组可以先开始讨论，全面开始后各组可交叉进行。在第二阶段，即讨论草案时，为了互相交流思想，集中人家的意见，大会讨论的形式要多一些。

这次会议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主要是由于体制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家也缺乏经验。会议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调查研究过程，最后形成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 三、周恩来的两次讲话

周恩来自始至终主持和参加了体制会议，并在6月23日全体会议和8月28日国务院第三十六次全体会议上就体制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就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的，将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领导问题、改革的步骤发表了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体制会议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讲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进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的。他说，“体制会议主要是根据十条指示，解决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他说，四月毛泽东提出十条关系，“这十条关系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以来，特别是进行经济建设以来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在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生产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变，生产力将大大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生产力大大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改变。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因此，在各种制度上也就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要求大家从这样的高度和意义上理解体制改革。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就是“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在维护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适当地分散一些权力给地方。他说“过去的体制那样集中是有必要的，搞五年计划，大家没有经验，中央搞了三年才由人大通过。”“财政的集中，稳定金融，统购统销，稳定了物价，这是很大的成绩。”他说，三大改造的胜利和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通过分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动员一切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说，“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上层建筑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各种制度，要有利于把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

针对有些部门怕分权后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周恩来指出，“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会不会带来阻碍和分散呢？他说不会的。他引证毛泽东的比喻说，“我们过去背个筐子，现在挑个担子，过去背 50 斤，现在可以担 100 斤，重量可以更大，生产更增加。如果过去中央背 60 斤，分权给地方以后，看起来中央少了，但两头加起来就是 100 斤，还多 40 斤。”他说“分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去，力量没都用上，厂矿动用 200 元以上就要报中央批准，给地方的权很少，使得地方有力无处用，限制住了。现在是全部用上，生产会发展起来。反过来说，过去担子一个人挑，现在很多人挑，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应该承认，现在主要的不是把现有的分掉，而是要地方搞更多的生产，更多的事业、企业。”他说“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就是行政权）以外，还要有人权、财权，有权就能增加生产”。

为了搞好体制改革，周恩来强调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尽量减少偏差，能防止的尽量防止。”他指出，“全面规划与加强领导必须密切结合，规划要全面，执行时要加强领导，纠正偏差。”他要求“各级领导要经常检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原则，纠正错误。”另外还要“统一计划，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他说，“计划要统一，如农业生产全国有大的指标，各省市也有指标，要统一，该种蔬菜的种粮食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不

利嘛。”“有了分工还要有合作。”因地制宜，就是不要一律，各省市不可能都一样。“适宜这个省这个省就作，不适于那个省，那个省就不要作，如糖厂，适于广东，广东就搞，棉花少的地方就不要搞很多纺织厂。”“要因事制宜，就是有些事可以集中在中央，有些事可以多放下去。”他说有了因地制宜和因事制宜这两条，就可以把普遍真理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照顾的全面。

关于体制改革的步骤，周恩来指出，“改进不是一下子实现，而是逐步实现。七月份拟出大纲，还要经过四五个月的准备，就是说今年准备，明年试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有更好地改进。”在体制改革问题上，他要求“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一步登天。”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讲了财政体制、基建体制、企业分工、事业体制、民族自治、物价问题、物资储备、技术指导、科学规划、双重领导、专业机构、对口问题、编制问题、干部等 14 个具体问题。

在财政体制方面，周恩来有这样一个设想，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先是中央与省市分，县乡两级缓走一步。”“先只搞中央和省市两级财政，看那些应该归省市，那些应该归中央，过去肥的归中央，瘦的归省市，的确有些偏向，应该再订一下，订了以后，中央要保证稳定，不要一见到省市有肥的就抓上来，但也不能经常一成不变，订得太死。”“一个体制搞他几年，等有了一定的条件以后再提高一点，不能因为某一个省市搞好了一点，就改变体制。”



在基建管理方面，周恩来指出“大的项目，一般的说要归中央，因为中央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当然也要和地方协作，有些小的，地方上又有条件的可以分给地方搞。”

关于工业企业的划分和管理。周恩来指出：“带有全局性的（中央不掌握就影响全国经济、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和关键性的（如纺织厂都由中央管不行，中央可搞几个关键性的大厂，以便搞好花色、提高质量、出口等）单位，必须由中央管理。炼钢基地，主要机械工业应当归中央，地方协助，搞成了将来也可以考虑下放。他说，“有了关键的，就可以推动全局，在这个原则下就好分了，是否如此就够了，还要再研究。”

关于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的事业，周恩来主张“应更多的交给地方，事业是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服务的，是为了保证它的发展，就好像国防是保卫建设一样，要因地、因事制宜，中央要统一规划，更多的放到地方上去管。”

在民族自治方面，周恩来说要单独研究，因为各民族自治区有共同性，应该肯定，首先应该照顾共同性，但也有特殊性，所以要照顾特殊性。

物价问题周恩来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经常注意。“物价的机构、组织，那些物价归中央，那些归地方需要研究。”

在干部管理问题上，周恩来也提出，“中央不要管得太死，要允许地方有个调动的余地”。“干部的机动权，地方上究竟要多大，可以研究一下，完全由中央管地方不能动

不好，完全交地方中央不过问也不好。中央和地方应该相互配合。”

周恩来的两次讲话，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坚决主张把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一面坚持注意因地、因事制宜，在职权划分上该由中央管理的就由中央管理，该由地方管理的就由地方管理，不搞一刀切。他还要求有关权力下放以后，地方必须有机构有专人负责。他说稍有疏忽就出乱子。周恩来十分尊重与会同志，完全是一种与大家讨论商量的口吻，说自己提的意见，“大家觉得用得上就用，如果用不上，可以完全不用。”

#### **四、《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体制会议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讨论和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拟定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8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三十六次会议对这个决议进行了讨论，又作了若干修改，于10月30日下发各地，要求各地认真地组织研究、讨论，并于11月25日前提出书面意见，以便再加研究、修改，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

决议共分13个问题：

##### **（一）划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管理职权的七项原则。**

（1）明确地规定给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

（2）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

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业和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同他们有关的计划、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一般地应该随着下放；

(3) 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和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者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切实加强对企业和事业的领导；

(4) 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

(5) 某些与地方管理的企业、事业密切有关的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

(6) 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7) 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某些重大的改变，应该采取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步骤，稳步进行。

## (二) 关于计划

决议指出，“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全面综合平衡和分级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具有重大国民经济意义的、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指标（如工业总产值、工农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投资额、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职工总数等）由国务院管理。地方性的、属于地区平衡的指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国务院在它的管理的年度计

划指标中，给予各省、自治区、市一定的机动调整权限。各省、自治区、市在完成国务院下达的指标的条件下，可以对国务院下达的本地区工业总产值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指标在一定幅度内进行调整；在保证完成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计划和征购、调拨计划的条件下，可以制定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计划；可以在国务院下达的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中保留一定的待分配数；可以在国家物资储备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地方物资储备，可以对地方管理的厂矿超计划生产的国家统一分配和部管物资按一定比例进行提成，等等。决议要求在计划执行中，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市，特别是各级计划机构，都应该经常注意和掌握计划实施中各方面的平衡问题，不断采取措施克服可能产生的不平衡现象，以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 （三）关于财政

决议指出：“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都要根据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编造”；“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收入划分上，应该保证中央和地方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要使中央能够对各地方的收入进行必要的调剂，以便保证各地方预算收支的平衡”；“地方预算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和分成收入两部分。为了使地方财政有相当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于地方的固定收入部分应适当的扩大，一般可达到其总支出的70%至80%”；“各项分成收入项目的完成比例，应根据地方预算的年度支出核定，使地方预算达到收支平衡”；“国务院对于地方预算草案，是核定其收支总额和各项分成收入的分成比例”；“地方预算草案经国务院核准以后，……



只要不影响中央规定发展的主要事业指标的完成，地方有权在项目之间进行调整”；“地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收入超收和支出节约部分，由地方根据本地区的需要自付安排支出”。

#### **(四) 关于工业**

决议指出：“国家的工业企业应该由中央工业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分工负责经营管理；分管的比例应该按照工业企业的性质确定。根据我国目前工矿企业的具体情况，可以分为四种：（1）大部分由中央部管理，少部分由地方管理；（2）大部分由地方管理，少部分由中央部管理；（3）中央部和地方分管的比例大体相等；（4）手工业全部由地方经营管理。”

决议还提出：“适当地扩大厂矿企业的职权范围。在保证完成年度和季度计划的条件下，企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月度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财务管理上，应该给予企业一定的机动权限；在干部管理上，除主要干部外，企业对一般干部和技术人员有权提拔和调动；在年度劳动计划范围内，企业可根据生产需要，对劳动力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补充。”

#### **(五) 关于基本建设**

决议提出：“适当下放基本建设设计的审批权限。凡基本建设项目在计划限额以上的重大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概算（扩大初步设计和预算），由国务院每年按审核项目表审批；凡不列在审核项目表的限额以上的和全部限额以下的设计、预算文件，分别由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委员会审批。”

决议还指出：“基本建设任务和设计的审批权限下放后，大大加重了地方的责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基本建设的组织领导，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建设委员会。”

### **(六) 关于农业林业水利**

决议指出，我国的“农业、林业主要是群众性的生产事业，带有极大的分散性和地区性，工作主要是靠地方作。因此，农业和林业两部的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全面规划，研究有关方针、政策和各种重大技术措施，拟制各种主要业务性的章则、办法，进行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组织省际间的协作，总结和交流经验，并直接管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其他各种农业、林业的具体业务和事业、企业都由地方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和管理。”

决议还指出：“农垦部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国营农、牧场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加强方针、政策与业务的领导，并直接管理某些荒原集中的国营农场群，和个别示范性的国营农、牧场”；“森林工业一方面由于资源不足，分布不匀，加之需材量日益增大，需要适当集中管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带有很大的季节性和地区性，又不宜过分集中管理。”需要由森林工业部领导为主者，亦应“改进目前的管理办法，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给地方和群众一定的利益”；“水利部主要负责：大江大河的流域规划，跨越两省的和一省境内个别技术复杂的重大工程的规划设计，大面积除涝工程的规划设计，并领导为上述工作而设置的勘

测设计和科学试验研究机构；承包技术复杂和全国性的重大工程；管理跨越两省的重大工程的操纵运用。其他各河的流域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管理、工程养护、工程的操纵运用和局部地区除涝、小型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工作都由地方管理”。

### **(七) 关于运输邮电**

决议指出：“铁路和民用航空运输，集中性大，技术复杂，并且具有国防意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国防公路和重要经济公路干线，由交通部修建。地方道路的修建，所有公路和地方道路的管理养护，都由地方负责”；“流经两省以上的并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主要内河干线运输，由交通部统一经营管理或委托地方管理；主要运河的开发由交通局负责”；“远洋运输、沿海远程运输，具有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沿海较大港口（部分港口可以委托地方管理）载重千吨级以上的海轮、外轮进出口业务，港口的建设维护，航道（包括港区河道）的疏浚，由交通部统一经营管理”；“邮政、长途电信、电报、无线电通信、具有全国范围的整体性，由邮电部建设与管理”。

### **(八) 关于商业**

决议规定：“经营国家计划平衡商品为主的纺织品、百货、针棉织品、文化用品、石油、医药、五金、运输、邮电器材、化工原料、煤炭建筑器材等公司的一级批发站和一部分二级批发站（将来改为一级批发站），由中央主管，其余的二级批发站以及县和县以下的批发商店，由地方主管”；“经营食品、烟、酒、食用杂品等商品的企业，

由中央主管。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产、供、销指标，归地方掌握”；“经营饮食、家具、珠宝玉器、委托旧货、广告、信托、仓储、托运等地方性很大的企业，由地方主管”；“全部零售企业由地方主管”。还有粮食企业、经营国家计划平衡商品为主的农产品采购企业以及旅大、烟台、青岛、上海、广东五处国营海洋捕捞企业、进出口企业外汇收支均归中央主管。

### **(九) 关于文教科学卫生**

决议规定：“主要为中央各业务部门或者为全国性的某些建设事业培养干部的以及少数带实验性、示范性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由中央各有关部门主管；其中综合大学、关系几个部门的多科专门学院和个别的单科专门学院，由高等教育部主管。主要为地方建设事业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逐步下放，由地方主管。”中、小学教育、中等师范等都由地方主管。

中国科学院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和所属的科学研究机构，以科学院领导为主，地方领导为辅。在学术研究上，中国科学院对全国所有的科学研究机构，都应该加以指导。

电影、出版、艺术、社会文化和文物等事业、企业，除了若干带全国性、实验性、示范性的由文化部主管以外，其它都由地方主管。

医院、疗养院、防治所、站，药品检验机构，交通检疫机构，医药科学研究机构，生物制品所，和医药院校等，除了若干为创造经验，培养中央卫生机关所需要的人



才的卫生事业、企业由卫生部主管以外，其它都由地方主管。

### **(十) 关于政法**

决议对区域变更审批权限以及国家监察机构的设立和领导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 **(十一) 关于劳动**

决议规定：“企业、事业招收和调配工人，必须在国家批准的劳动计划指标范围内按照计划和制度进行。关于劳动力招收调配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度的规定以及地区之间的调剂平衡工作，由中央负责；企业、事业对劳动力的招收工作和企业相互间普通工人的调配工作，由地方负责”；“有关全国性的重大工资问题，必须由中央集中统一管理。有关工资的政策、法规，由中央制定；全国统一实行的工资标准、技术等级标准、奖励和津贴办法由中央统一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地方企业、事业的工资标准、技术等级标准、奖励和津贴办法，可以在中央统一规定的原则下，做适当的规定。”

### **(十二) 关于机构编制**

决议规定：“成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编制委员会，按照各种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的隶属关系，实行分级分工管理机构编制工作。”

决议还指出：“随着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各项措施的实行，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依据实际需要，对所属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的机构编制，要贯彻精简原则，进行合理调整。”

### (十三) 关于少数民族

决议指出，必须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和职权。“各民族自治地方应该比与其同级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有较广泛的财政和企业、事业管理权限。”决议要求“中央和有些省的有关部门都应该设立专门机构或者在领导人员中指定专人管理民族工作，并且将民族工作列入自己的年度计划和业务规划。”

为了执行决议中的各项规定，国务院要求各委员会各部门应该分别制订实施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逐步施行。要求中央下放和地方接管的各项企业，事业，必须上下充分准备，密切配合，做到分好、交好、接好，并注意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国务院还要求在改进行政体制的同时，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保证体制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 \* \*

国务院体制会议，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体制问题的会议。会议对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进行了检查，对于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于1957年9月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以上三个文件经过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讨论，于1957年11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11月5

日由国务院公布执行。从此开始了我国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尽管这次的改革由于“大跃进”的冲击而失败，但是毕竟走出了建国后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第一步。国务院体制会议及其所制定的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在推进这次改革的进行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以及积累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 关于中共陕北建党时间的考辨

高中哲 薛生德 王聚儒 郝敬东 李 林

陕北是陕西省建党时间最早的地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曾经是陕北和陕甘边这两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的13年间，陕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被誉为革命圣地的陕北延安，又曾经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烈火，最终由陕北高原燃遍全国，迎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初革命的星火是怎样在陕北点燃起来的？这一直是关心中国革命的中外人士所注目的一个问题。早在抗战时期英国人斑威廉·克兰尔夫妇合著的《新西行漫记》和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著的《北行漫记》等考察解放区军民坚持抗战的书籍中，就写下了在二十年代初期革命思想在陕北的传播和共产党秘密细胞在这里繁衍的历史。国内一些内部党史书刊对陕北革命的兴起或党的建立也有一些记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记载大多不够准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中共党史事业的繁荣，陕北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亦日



益得到发展。1980年李维汉来到西安，在同陕西党史工作者谈话中，就提出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要从最老、最早的地方写起。头一个支部、头一个游击队在哪里，领导和创造人是谁要搞清楚。遗憾的是几年时间过去了，这第一个支部的诞生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仍在困惑着陕西省党史工作者和热心陕西党史的人们。

陕北建党时间之所以难以确定，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初不曾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档案，而仅存的文件或残缺不全，或内容上不尽一致；第二，至今尚未发现重要当事人李子洲关于陕北建党的详细记载，另一个重要当事人王懋廷也只留下部分团的档案，而没有留下党的文件；第三，在二十年代初党的创建时期，党、团划分并不很严格，如党员兼团员，党、团员会一起开等，在陕北也是如此；第四，当年最早入团入党的一批老同志留下的自传、回忆录等材料，都是在四十或五十年代写的，难得都很准确。当前最为棘手的是：文献记载与当事人的自述很不一致；由于各有其一定可信性，于是在党史工作者中间出现了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局面。如果再没有新的可靠史料出现，陕北建党时间问题似乎大有成为悬案之势。

为充分占有史料，各方都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尽管各方占有史料还不够丰富翔实，对已有史料的看法互有差异，但也并不就是乱麻一团，毫无头绪可言。从已有史料看，我们认为只要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对各类史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比较周密的分析 and 综合的研究，还是有可能理出一条比较切合实际

的历史线索的。我们试图就已有史料加以考订和研究，并愿与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关心党史的老同志们进行共同的探讨。

### 对王懋廷、冯景异五份文献的辨析

陕北最早的建党基地是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四师)，因此，我们对陕北建党时间的探讨也就集中在四师这个焦点上。

四师党、团建立最引人注目视的史料，就是作为绥德SY特支书记王懋廷的3份文献和绥德CY地委书记冯景异的两封信。有些同志以1924年12月19日王懋廷给安石(即邓中夏)的一封信报告成立绥德SY地方团，王并将自己也列入成立的SY地方团团员名单中的一人，和1925年4月王懋廷以正零的笔名写的《陕北地方工作计划》和1925年6月29日写给团中央总书记的信都是谈陕北团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便断定王懋廷在陕北只建立了团的组织。同时又以1926年1月14日和17日冯景异写给曾延的两封信，前者说“组织CP一层，此处已决定成立”，后者说“此地CP已成立支部，有同志8人”，便认定“绥德党支部成立于1926年1月中”。

我们认为这些论断是牵强的。其论据也有推敲的必要。陕北党、团的建立及其相互关系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可以迎刃而解的。它需要在尽可能多的了解当时主客观情况的基础上，

对各类史料经过认真地分析鉴别和综合研究，才能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王懋廷的3份材料来说，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但不能仅以这3份材料就认为1926年1月份前，四师只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这是与党的文献和许多当事人的大量自述相背离的。1935年1月24日《陕北特委代表的报告》，在写到“党团的组织状况”时就有“陕北党团是民国14年（即1925年）春间开始”的记载。在自述材料中，作为当时在四师入党的教师田伯英、李瑞阳、韩叔勋和北京区委派赴陕北特派员耿炳光，以及最早入党的一批学生，都用大量的史实说明了在1924年底四师就有了党的小组，1925年春天四师就建立了党支部并且领导群众开展了重大的革命活动。这都是我们研究四师建党问题绝不可抛开的重要史料。

再以冯景异的两封信件而论，这两封信只是团的文件，仅以团的文件还不足以确定陕北党组织建立的时间和组成人员。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报告贯彻1925年12月团中央121通告规定（即年龄超过20岁的团员或年龄未超过而担任重要职务的团员，都应加入共产党等），进行绥德团组织的调整和团的组织活动的。信中说的“组织CP一层”、“此地CP已成立支部”，都是指按通告规定，党团员分化后，从团内分出的党员（包括党员兼团员的不再兼团员的党员）的CP组织的建立，并不是CP组织在四师的第一次建立。因为第一，党、团组织的分化，并非是1926年初这一次。在这之前的1924年和1925年党、团中央都有关于党、团分化的决议和通告。冯景异和杜衡

的材料都说 1925 年党、团分化过。在这之后的 1926 年 5 月，北方区委特派员耿炳光到陕北就又进行过类似工作。耿在这年 6 月 16 日写给桂仁的信说：“本月 8 日开大、中校（即党、团）联席职员会议，实行两校分化，并改组两校职员。”第二，冯 17 日的信说“此地 CP 已成立支部，有同志 8 人，旧 CP 同志 1 人，由 CY 提出 7 人，2 人与 CY 完全脱离关系，5 人于两方面工作”等。其中由 CY 提出 7 人就字面理解，“提出”与从超龄团员中“分化”出 7 个党员之意显有区别。如信中提到原在团内的李蓉鉴（即李明轩，李本人多次自述他是 1925 年入党的）和马瑞昌（有人证明马也是 1925 年入党的）时，都加注“CP 同志”4 字，可知其意应是从党员而从事团的工作中提出的 7 个人。这 7 人加上旧 CP 1 人，就是说在 1926 年 1 月前至少已有 8 个党员。如在这之前没有党的组织这些人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第三，冯 17 日信说“旧 CP 同志 1 人”和王懋廷在 1925 年 4 月《陕北地方工作计划》中提到的“陕北在去年以前，并无我校同志，只有 CP 1 人。”最为持四师是 1926 年 1 月建党之说的同志所强调。我们认为这同样有个如何理解的问题。王复生是 1921 年“一大”后在北京大学入党的最早党员之一。据他本人日记记述，他是在 1925 年 8 月去四师任教，而于 1926 年寒假时离校的。如果 1925 年到 1926 年四师果真只有 CP 1 人，这 1 人大家都认为是李子洲，那么同时在校的王复生呢？显然所谓 1924 年的 CP 1 人和 1926 年的旧 CP 1 人，都是指 1924 年春李子洲开始任四师校长时的党员人数，那时党员确实



只有他 1 人，但并不包括 1924 年底 1925 年陆续发展的一批党员。否则与当时的史实就难以说通。第四，信中说“请中央批准事，请兄处代为接洽”一句，有的同志认为这是请中央批准四师党支部的成立，有人甚至据此一口断定冯的信件就是“建党报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武断和曲解。根据 1925 年 5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通告》中“团内负重要工作之党员兼团员之去留，必须经党、团中央部或各级执行委员会之共同决定”的规定，在团绥德地委原任书记之马瑞昌此时已成为团的第二支部书记，原任组织委员之李蓉鉴与 CY 完全脱离关系，其去留自然要经中央批准。至于一个学校建立支部是否一定要经中央批准？在“三大”、“四大”党章中都未见有此规定。因此“建党报告”之说难以成立。第五，这两封署名冯景异的信件，冯本人还健在，一再否认出自他的手笔，更不承认他曾经担任过绥德团地委书记这样的职务。1988 年 12 月 14 日冯本人所谈的材料中虽然还说：“给团中央两次报告和信不是我起草，也没托人起草。按笔迹和当时事实看，可能是李瑞阳老师代我起草的。”却承认了在李瑞阳召开的一次团员大会上选他作了团地委书记。而我们在访问李瑞阳时，他看了两封信原文的复印件，并不认为是他写的；而且说他是 1925 年四五月间直接入党的，并未入过团或担任过团的职务，也不知冯景异曾任过绥德团地委书记。

退一步说，即或承认冯景异信上说的是四师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试问又有多少可靠史料加以印证呢？

现在看到的印证史料主要是两份文件和两份当事人的自述。两份文件是1927年3月17日《陕甘区目前工作计划》和同年10月23日陕西党、团省委常委一份报告。在提到陕西党、团关系时，一个说陕西党的历史自1925年12月起，一个说1925年10月以前陕西没有党的组织。但就在前一个文件中说陕北“曾划归北方区”，因此1927年9月25日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将1925年秋后西安党特支的成立，看做是“党在西北的盟〔萌〕芽。”这两个文件所说的并不包括陕北。

两份自述材料，一份是李明轩在看了署名冯景异的两封信后，一改过去反复肯定了的说法，即他是1925年入党，这年三四月党支部扩大为党特支的说法，于1988年11月21日的谈话。谈话中说：“1926年初绥德党支部成立，我由团员转为党员。”但就在他这个材料形成的第4天，即25日他在介绍他入党经过时，又说起：“我是李子洲和王懋廷介绍入党的。那时候……都由王懋廷、田伯英负责党团活动。……他（李子洲）和王懋廷介绍了我，我记得很清楚，在教员韩叔勋家中由王懋廷宣布我们转党。”这段叙述又承认他1925年入党，绥德有党组织了。因为王懋廷于1925年7月就已经离开四师回到北京，并于1926年初担任了北京团地委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同时据当时四师印刷校工王进峰1982年11月25日回忆说他是“1925年夏由李蓉鉴（李明轩）和叶毓荣介绍入党。”李明轩1983年4月7日材料也承认1925年8月县工会成立前，党派白明善、杜嗣尧和他介绍王进峰、雷忠

秀、王进禄、雷成春、李郑俊等 5 人加入共产党组织。这十分明显的史实不是将李明轩的 1926 年初党支部成立的说法否定了吗？

另一份自述材料是马瑞生的自传。马在自传中说：“1926 年上半年北京派耿景三（即耿炳光）来我校（即四师）建立党组织，把团员在 18 岁以上的一律划入党，成立绥德地方党的机构，在绥师校内成立支部。”1926 年上半年耿炳光赴陕北是搞党、团的整顿的，已如前述，而且这时已成立党的绥德地委，显然也不是什么开始在四师建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第一，王懋廷的 3 份材料不能否定当时党组织的存在。第二，署名冯景异的两封信是团的文件，不能做为建党组织的证明，而且是一个孤证。第三，直接讲陕北党的工作的党的文献和其他当事人的大量自述，不容否定。

### 陕北建党时间的确定及其根据

陕北建党时间最难以确定的是党的历史文献严重不足，特别是陕北与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之间联系的文件，即 1924 年下半年到 1926 年期间党组织互相联系的文件至今还是空白。这很可能与当时党的文件在北京和绥德遭到白色恐怖的破坏有直接关系。早在 1959 年李瑞阳就说陕北给北方区委的一切文件在苏联大使馆被破坏，李大钊牺牲后，完全遗失了。北京市委组织史办公室的赵秀德同志

说，北方区委破坏后党的文献关于组织方面的仅剩太原和大连的一部分。在四师 1927 年 8 月井岳秀派兵封闭时焚毁了当时所有的党的档案等。但即使如此，历史还是留下种种踪迹，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分析、辨别、探寻和判定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目前我们看到的党的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一是前面谈到的 1935 年 1 月 24 日《陕北特委代表的报告》的记述：“陕北党团是民国 14 年春间开始”；二是 1927 年 7 月 25 日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问题给绥德地委公函中提到的“绥德为陕北文化枢纽，绥德党组织也比较长久”；三是据 1927 年 8 月 6 日李子洲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在谈到陕西党组织时说“陕西党的历史很浅”，而在 8 月 12 日李子洲在向中央报告提到农民运动时说“陕北延安、绥德等地农运颇有基础，因党的组织较有基础”；四是 1926 年 6 月 25 日《团北方区工作总报》中关于“绥德地方团和我们正式发生关系是 4 月份，……该处党比较健全，而且都是该处的教职员，因此，可以领着学生前进。”这些文献记载虽不完整，至少说明：1925 年春绥德已有党的组织，到 1927 年 7 月党组织成立已比较长久，而且较有基础。至于说 1925 年春成立的“党团”是党还是团，还是有党又有团或党、团混合的组织？我们认为这要从大量当事人的自述中作一番综合的考察认定。

让我们来分别看看，1924 年和 1925 年在四师入党的教师和学生们在自传、登记表、回忆录中是怎样说的：

1. 田伯英——1936 年 5 月 1 日《陕北建党及活动情



况》中说：1924年7月我由北师大毕业，他（魏野畴）介绍我到四师教书。共进社委托我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组织，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预备学校。和我同住的国文教员王懋廷（南方人，野畴介绍的，原系咸林中学教员）认为共进社是个小组织，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不如参加共产党。他常给我讲有关党的组织，介绍阅读有关的书籍。我们的思想一致了，就研究入党的事。他在北方区党组织有熟人，我们俩就给北京党组织写了一封申请入党的信，约有半个多月（1924年10月），北京党组织回信说，已经批准我们参加共产党，要我们在陕北开展党的组织工作。我们先吸收共进社员和其他方面先进的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起初只有三四人，到年底增加到八九人，超过5人就成立四师的党小组，我任组长。四师的党小组到1925年初扩大成为支部，我任书记，懋廷任宣传，李瑞阳任组织，青年团的负责人是赵仰普（赵通儒）。1925年3月间，绥德党支部转为特支，负责人无变动。

2. 李瑞阳——1959年《1925年绥德党组织发展情况》中说：“1925年春，李子洲约我去绥德师范教书，云南人王懋廷也在本校教书，任党支部书记。大约在当年四五月间由王介绍我入党，并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田伯英）。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训育主任常汉三，因为当地军阀井岳秀经常注意绥德师范，所以他们3人在党内都没有担任什么职务。而党的经常工作以及学校内部较重要事务，都均由他们几人和党组织的几个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陕北党的开始建立，我不很清楚，但在这半年

的发展情况（1925年上半年）我是完全参加了的，知道的较为清楚。

教职员中除王懋廷同志外，几个党员同时都是共进社员。共进社常在一个同志韩叔勋的家里开会。这个会实际也就等于教职员的党员全体大会。这个会上，因为李（子洲）、杨（明轩）2人参加，往往决定一些校内的重大问题。

3. 韩叔勋——1951年8月22日《思想总结》中说：1924年春李子洲由陕伪教育厅发表为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共进社内部决定叫杨明轩办教务，我办训育。在这年秋我就离开咸林中学转道绥德。到绥德后同事中有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英。这时子洲已作党的地下活动。后来我因小组决定也成了预备党员。因共进社关系常在我家里开会，子洲说我以校长身份办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明轩办理内部计划（地下计划），叔勋办理庶务（布置工作），以推动我们的工作。计当时发动组织了农民协会，耶稣的反宗教迷信灯节秧歌队。1925年白芳渠（就是当时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局〔区〕，因为不能直接说，谐音为白芳渠）的指示说，中山已死，叫我们响应国民会议的号召，我们即日发动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以促其实现。”

4. 耿炳光——1956年12月8日《自传》中说：1925年春（关于耿炳光1925年春赴陕北的时间问题见本文附件1），党（北方区）给我的另外一个任务，是在陕北发展组织。我由榆林去绥德第四师范，校长是北大同学共进社员李子洲，教务主任是共进社员杨明轩，李早已是党

员，我去同他商量在那里发展组织，建立支部。由他任书记，归北方区直接领导。参加组织的记得有田伯英。

5. 在四师学生中根据本人自传或干部登记表于 1924 年底和 1925 年入党的按目前不完全统计即有：白明善、杜嗣尧、乔国楨、邓重庆、马明方、霍维德、杜衡、杨玉峰、张肇繁、李明轩、冯景异、王进峰、崔凤荣、李登霄、呼震西、李象九、阎红彦、史唯然、雷恩钧等 19 人，加上上述教师中的 3 人，共计 22 人（详见附表之 3）。他们明确提到 1925 年春绥德成立党支部的有田伯英、李瑞阳、耿炳光、杜嗣尧、杜衡、李明轩、冯景异等 7 人，他们提到的党支部主要成员有田伯英、王懋廷、李瑞阳、李子洲等。

这批四师最早入党的师生在各自的材料中都还满含赤情地写出党支部成立后即以四师党、团员师生为骨干在榆林中学、延安四中以及井岳秀部石谦团建立党、团组织的活动，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陕北各地的组织，发动陕北各县的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五卅惨案后的罢课斗争和反帝宣传，组织农民的脚步自保会反拉夫拉差的斗争，以及反对基督教侵华的示威运动等等，大革命初期在陕北的重大政治和群众斗争，使赤化空气笼罩陕北，以致当时四师就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一批师生在 1925 年或 1926 年初就被调往北京、上海党团组织、广州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石谦部队中去工作或学习。

以上各人所说的史实内容尽管一些细节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所说的基本史实是共同的。他们在四、五十年

代的各个不同地方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的这许多自述，我们没有理由采取不承认主义。当然由于记忆等原因，个别人容或记得不准，但绝不至于他们都记错或说错。有人说他们是把人团记成入党，这也是一种主观猜测而已。据我们所知他们入团转党或直接入党的时间、地点、介绍人等都有明确记述；而且在四十年代延安时期，一个干部的人团入党问题的交代都经过组织审查，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并不是可以随意填写或更改的。如果说历史的文物是物化的历史，那么他们亲身经历的自述就是活化的历史。他们共同所说的基本史实是什么呢？有3点：

1. 1925年春绥德就有了党支部的组织，并直属北方区；
2. 党支部成立后即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随后即以四师为中心，发展了陕北各地的党、团组织；
3. 以四师党支部为核心，领导和组织了大革命初期陕北各县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

至于党支部的书记说法不一致的问题，我们分析书记是田伯英，因为，认为田是书记的说法比较集中，王懋廷更多的是从事青年运动和在外地发展组织，李子洲为避开井岳秀的注视和办理校务，王懋廷和他都不可能做党的许多具体工作。在1925年春党支部成立前，田伯英说1924年底成立的党小组，以当时已有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韩叔勋4个党员（关于王懋廷在四师组织身份问题，见附件2），按1923年党的三大党章关于凡有党员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不满5人之处亦当有组织之规定，是具有成立小组条件的。



最后，我们想对研究历史资料的态度说点看法。离开历史资料的历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历史资料本身决不是历史本身。历史资料本身还存在着来源的真伪，内容的虚实，着眼点的差异等问题。因此对历史资料既要对其自身来源、史实内容、反映角度、表述方法等方面加以仔细地探明鉴定，又要把它们纳入与之互相联系的历史资料体系中进行慎密地考察和逻辑推断，弄清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掌握变化中的历史活动和群众的丰富实践，“从联系中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279页）。我们认为这是研究文献资料或自述资料都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

## 附 件 1:

### 耿炳光第一次赴陕北时间考

耿炳光 1924 年在北京大学加入共产党后即在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来陕从事党的工作，还任过 1927 年 2 月后成立的陕甘区委和陕西省委第一任书记。耿在陕的工作，特别是第一次赴陕北发展组织问题，自然是有关陕北建党时间而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由于目前尚未查到耿在当时所写的全部有关报告，尤其是第一次赴陕北的有关档案，解放后耿所写的许多自述和谈话材料在时间上互有出入，有的同志便对他第一次赴陕北予以否定，甚或以第二次赴陕北与第一次混淆，以印证绥德在 1926 年 1 月建党之说。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

的。我们认为只要加以分析考辨，即可明白他第一次赴陕北的时间是清楚的，这次他在陕北发展组织的基本史实是不能否定的。

在耿炳光个人档案中，从1949年到1956年他亲笔撰写了5份自传。2份干部登记表和鉴定表，在陕西省档案部门中保存有他1959年到1960年对党史工作者的三次谈话记录。在这10份材料中对他第一次赴陕北时间的记述可分为三组：一组是1924年、1924年春、1924年下半年；一组是1924年前后，1925年冬（或是1924年冬）；一组是1925年春到夏。那么究竟是在哪一年呢？

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可从三个方面来考核确定：一、耿赴陕北前在北京涉及的人和事；二、耿到陕北后涉及的人和事；三、对耿材料自身的分析。

一、耿炳光在所有自述中都提到当时他是北方区派为于右任的代表赴陕北做井岳秀争取工作的，并说“于那时在北京，表示左倾，常与李达往来。”于右任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呢？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请广州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据屈武谈，与冯一道发动政变的胡景翼同时电邀在上海的于右任到北京，以此推算，于到北京时间是1924年10月底以后。

耿还提到：“我赴陕北前，曾赴东交民巷俄国兵营北方区委员会见李达，接受任务。同时北方区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令我过太原时为太原党委送文件。”据《李达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记载，1924年约在6月上旬，李达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

表大会，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启程返回。1924年初冬回到北京。据《中共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上报本），陈乔年是1925年春至9月任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书记的。北京市委组织史办赵秀德同志谈，陈到北京是在1925年1月。同时根据耿炳光在1949年12月的自传中提到他在1924年冬由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被派赴包头冯玉祥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在包头“住了一个月左右”。在1959年谈话中又说他是“从冯处回来才到榆林、绥德”的。

按照以上涉及的有关人和事的推算，耿炳光离开北京的时间至少是1925年三四月之后。

二、耿反复说他在去陕北路上曾对太原干部作过怎样做秘密工作的报告，在榆林和井岳秀谈了一星期话，然后才由榆林去绥德，在绥德住了半个月。这样从他离开北京加上路途时间和在太原、榆林的停留，到绥德的时间已是1925年四五月了。

三、1928年2月12日耿炳光有一封写给陕西省委常委会的信，其中写道：“民国14年我在陕北考察工作，对北方区曾有一个详细报告，见省委存件中的《北方区通讯》中”。可惜这个报告至今尚未查到，但民国14年即他第一次赴陕北的时间是1925年得到了印证。

耿炳光第一次赴陕北的时间确定了，耿炳光1956年所说的：“我由榆林到绥德第四师范，这学校校长是李子洲，他是党员，学校办的很好，在陕北很有声誉，陕西有不少革命青年都是那校的学生。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与李子洲发展了几个党员，成立了陕北第一个支部直接归北

方区领导”的史实就没有理由因为时间记载的出入而加以否定。

## 附 件 2:

### 王懋廷在四师组织身份考

王懋廷，是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是在大革命时期协同李子洲创建陕北党、团组织，在陕北大地播撒共产主义火种的革命先导，是为陕北广大革命师生所敬仰的杰出人物。但他在绥德第四师范任教时的组织身份究竟是什么，在近年来的党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分歧，由此涉及他在陕北建党的作用以及四师建党的时间等问题。尽管目前各方所占有的资料，尤其文献资料不足难以做出很准确的结论，但是进行一些粗线条的考订还是必要和可能的。

目前关于王懋廷组织身份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一种认为是认为他到四师前并不是党员，而是到四师后入党的；一种认为他在四师加入的不是 CP 而是 SY；还有一种则认为他是在北京大学入党的，陕北党组织的建立王懋廷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到四师前是否脱过党，是什么原因还不清楚。

认为王懋廷是在四师入党的，是根据田伯英的回忆录，即王懋廷在四师时和田同住一室，王认为田在四师发展的共进社组织没有高深的理论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不如参加共产党，并常给田讲有关党的组织知识，介绍阅读有关的书籍、刊物，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



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彼此的思想一致了，他们俩就给北京党组织写了申请入党的信。1924年10月北京党组织回信批准他们入党，并向他们交代了在陕北开展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1925年五六月绥德党支部转为特支后由王懋廷担任书记。认为王懋廷在四师加入的不是CP而是SY的根据是1924年12月29日王懋廷给邓中夏信中曾表示他自到陕北后改变过去自鸣孤高的态度，在青年中找些同志加入SY，跟你们做革命的努力。王还在所报的绥德SY地方团团员名单中将田伯英和他都列入。此外杜衡也说，王懋廷初到陕北还未加入（未加入什么原文未提到），但他的长兄王复生是共产党员，他的三弟是共党青年团员，王本人即受了影响开始在学校组织共党青年团。认为王懋廷在北京大学入党的根据是罗章龙的证明。罗章龙是192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和联系人之一和1921年到1923年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罗老今犹健在。他早年诗篇《云南三王》中即有“吾党多英杰，云南有三王。加盟书记部，亢斋有容光”的诗句。罗老自注：云南三王即王有德、王复生与王德三（王懋廷），均云南人，北大学生、书记部成员。“亢慕义斋”为德文之音译，即“共产主义的书斋”，设于北京大学西斋，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中共北方区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公室。1982年11月18日和1988年12月10日他在材料中，都证明五四运动前后，北大同学王有德、王复生与王德三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懋廷具体入党时间，1988年罗老已回忆不起来，但他肯

定“在 1923 年二七罢工前就是党员了。”又根据 1924 年夏考入四师的赵通儒 1959 年间写的大量材料，1924 年夏李子洲、王懋廷是北方区在陕北仅有的两个通讯员。除此，还有认定王懋廷是党员，并在 1925 年上半年介绍自己入党的四师的师生有李瑞阳、杨玉峰、杜嗣尧、李明轩、乔国桢等人。

上面三种根据究该如何认识呢？我们的分析和看法是：第一，在建党初期为便于党员首先通过青年团吸收青年加入团，从事发展工作的党员首先加入团这不是不可能或仅是个别现象。如北京党的组织产生后，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其后一段时间，北京党组织的最初成员如高尚德、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又是北京第一批团员，并任团的书记等职务。在团内他们的党员身份却是秘密的。王懋廷在四师建团将自己也列入团员名单中可能就是属于上述情况。因此其党员身份不为人所知。

第二，假使王懋廷在北京并无党或团的组织关系，那么他又凭借什么关系一下子就在四师发展了 16 个团员之后才报上级批准呢？事先没有在北京的组织上的联系这是可能的吗？从田伯英回忆看，他 1924 年下半年一到四师所说的对共进社和共产党的不同认识，和常讲的有关党的组织知识以及介绍给田看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等也说明他的思想和活动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进步或仅是一个团员所能有的。王懋廷给邓中夏信上说的改变从前“努力科学不问政治”、“自鸣孤高站在旁边责备活动的朋友”的态度等，我们同时在信中看到其原因就是他认为北京方面的 SY 十分涣

散，他主张团的组织“第一步要能多得些真实的分子，把团体结合的十分巩固，分子训练的十分健全”等，而北京SY“上面三步一步都没有做到，没有团体的训练，真实努力的分子太少。”如果在北京时他无党或团的关系能有如此的主张和了解吗？

第三，王懋廷在四师仅一年的时间，他在绥德和榆林党团的创建上却做出杰出贡献。尽管他认为北京，同时听说上海SY都十分涣散，在给邓中夏的信上犹表示“但是我并不悲观，我看出未来的同志有很多的忠实分子，散在外省的同志也有很多的实地做工的。”因此，1923年他在咸林中学时“除过去北京的人外得到十多个”，到四师“不到半年天气，我们的主义在学生中已经种下极深的根苗了”。信上还说明他在绥德建团时和在西安建团的魏野畴的联系。在《陕北地方工作计划》和1925年2月给中央的报告以及1925年6月29日给总书记的信他都提出“扩充本校势力于榆林中学”，与望瑶堡（即瓦窑堡）、佳县等地的组织联系，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鼓动四师及榆中学生全体到民间去宣传”、在四师组织青年协会、学生会，于红五月派出学生讲演员“到各县宣传国耻与阶级革命”、“鼓动榆中绥德两校学生到各地去组织农民协会”，在绥德“成立脚户会领导脚户奋斗”、“到这次上海事件（即五卅惨案）的运动，民众更融合于我们了。”

第四，四师广大革命师生对王懋廷在陕北的创建党、团贡献作了崇高评价。李瑞阳说：1925年下半年王懋廷同志离开了绥德。这位同志在我的印象上是极为深刻的，

对革命工作踏实耐烦，对每个同志诚恳温和而要求严格。对工作他总是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然后审慎地作出决定，并随时督促执行。我可以这样说：党在陕北以后建立了那样坚实的根据地和王懋廷同志的踏实工作是分不开的。杜嗣尧说：（1924年）11月初，王懋廷领导下，我、罗伯福、白明善一时参加共产党青年团，这是陕北党的初次建立组织。放寒假就发展到11人。王老师给我们指示了寒假工作，调查社会情况，看革命书籍，如唯物史观、巴黎公社、中国青年等，来年来校，要向他报告。冯景异说：同学们对教师最敬爱的是王懋廷同志，他首先给我们选讲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很多有关新时代知识的课程。课外不时和同学们谈话接触，给同学们介绍阅读《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和《向导》。帮助各班学生各自成立了“各种学习讲座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娱演习会”等。四师团支的负责领导者就是王懋廷同志。不知在那一次运动中，他英勇牺牲，痛哉！惜哉！

综上所述，从党、团建立早期组织关系的特点，到王懋廷本人对建立党、团的认识和态度，以至他在陕北广大师生、青年和农民中卓有成效地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的实践活动，王懋廷无疑是一位光辉的共产主义者。在我们研究陕北建党时间而涉及王本人的组织身份时，搞清他入团或入党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是根据片断的历史资料就遽而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以至将王懋廷排除于陕北建党问题之外，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郑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 附件 3:

#### 1924 和 1925 年绥德四师部分党员统计表

姓名	入党时间、地点和介绍人	资料来源	同时期党员证明者
李子洲	1923 年初，在北大由李大钊、刘云汉介绍入党	《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组织史》(1920 年 10 月—1937 年 7 月)。	耿炳光、韩叔勋、杜衡、赵通儒、李明轩、冯景异、呼震西。
王懋廷	1922 年在北大由邓中夏介绍入党。	罗章龙 1982 年 11 月 18 日给云南党史委信和 1988 年 12 月谈话记录。	田伯英、李瑞阳、杜嗣尧、赵通儒、杨玉峰、李明轩、乔国桢、徐步墀、冯景异、张肇繁、马明方、李登霄、王子宜。
田伯英	1924 年 10 月在绥德四师由王懋廷介绍经北京党组织批准入党。	本人 1947、1949、1956、1963 年自传和回忆录。	耿炳光、李瑞阳、李明轩、赵通儒、张肇繁、崔凤荣。
王复生	1921 年一大后在北大入党。	《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组织史》(1920 年 10 月—1937 年 7 月)。	赵通儒、杜衡。
李瑞阳	1925 年四五月在绥德四师经王懋廷介绍入党。	1951 年本人自传 1959 年回忆录。(陕西档案馆 55-5-1180)	田伯英、赵通儒、李明轩、崔凤荣。
韩叔勋	1924 年秋后在绥德四师由小组决定为预备党员。	1951 年 8 月 22 日本人思想总结。	杜衡、李明轩、冯景异、张肇繁。

白明善	1925年在绥德四师入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白明善档案。	杜嗣尧、赵通儒、杨玉峰、李明轩、呼震西、崔凤荣。
杜嗣尧	1925年3月在绥德四师由团入党。	1943年8月20日本人自传。	赵通儒、杨玉峰、李明轩、崔凤荣。
乔国楨	1924年寒假在绥德四师由王懋廷介绍入党。	中央西北党校资料。	杨玉峰。
邓重庆	1925年在绥德四师由团转党。	1955年10月本人自传。	李明轩。
马明方	1925年在绥德四师由马瑞生介绍入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马明方档案。1940年1月，1968年3月18日日本人自传。	
霍维德	1925年5月由霍学光介绍入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霍维德档案。1940年5月14日日本人履历表。	
杜衡	1925年五卅运动后CP绥德特别支部成立时入党。	1933年12月8日《陕西共党沿革》。	李明轩、李瑞阳、罗百福、杨玉峰。
杨玉峰	1924年放寒假时在绥德四师由王懋廷介绍入党。	本人自传。	李瑞阳、李明轩。
张肇繁	1925年在绥德四师入党。	陕西档案馆124—1189—271卷，陕西省出版局本人档案。	李登霄。
李明轩	1925年在绥德四师由李子洲、王懋廷介绍入党。	1988年11月25日谈话记录。	王进峰、赵通儒。

冯景异	1925年下半年在绥德四师由团转党。	1980年6月20日回忆录。	李明轩。
王进峰	1925年夏在绥德四师由李明轩、叶毓荣介绍入党。	1982年11月25日回忆录。	李明轩。
崔凤荣	1925年秋在绥德四师由白明善、杜嗣尧介绍入党。	陕西档案馆崔田夫档案中崔凤荣证明材料。	
李登霄	1924年寒假在绥德四师入党。	李登霄、张肇繁等4人1942年3月27日谈话记录(陕西档案馆124—1189—271)。	张肇繁、王子宜、杨玉峰。
呼震西	1925年在绥德由李子洲、白明善介绍入党。	1983年1月4日谈话记录。	
李象九	1924年在绥德入团,旋即转入党,党籍属绥德支部管理。	1952年《清查总结》1954年《象九自传》。	阎红彦、史唯然。
阎红彦	1925年入党。	1959年5月5日本人谈《陕北党史》(陕西档案馆55—2—1173)。	雷恩钧、呼震西。
史唯然	1925年4月在瓦窑堡李象九连由李象九介绍入党。	1942年12月2日《自传材料》。	雷恩钧、呼震西。
雷恩钧	1925年3月在李象九连由李象九介绍入党。	1959年7月8日本人谈话记录(陕西档案馆55—2—1123)。	呼震西。

注：

①据李瑞阳、邓重庆、王进峰 3 人回忆：1925 年绥德四师学生有 300—400 人，秋后党员约 40—50 人。

②本统计表以有本人自述入党材料，并有同时期党员证明者为对象；以上两项缺自述者不取。

③李象九支部由绥德四师党组织发展并领导，故将在 1925 年前该支部发展党员亦列入绥德四师党员中。

④表列党员共为 25 人，除 4 人北京批准为党员外，其余 21 人皆在绥德四师入党，25 人中除 4 人外，21 人皆有同时期党员证明。

⑤材料来源由解放前形成者共 7 人，即：1933 年 1 人（杜衡），1940 年 1 人（霍维德），1942 年 3 人（李登霄、张肇繁、史唯然），1943 年 1 人（杜嗣尧），1947 年（田伯英）。

（制表：李林、高中哲）



# 陕甘宁边区 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

(1935年10月至1945年9月)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丛书编辑组

## 1935年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1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甘泉县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央机关设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0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罗迈）率中央机关由下寺湾到达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经安塞县到达瓦窑堡。

**中共中央纠正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 在九十月间，西北苏区发生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苏区的老干部被捕。中共中央抵达吴起镇闻讯后，即派王首道等先赴瓦窑堡，向中共陕甘晋省委传达中央关于停止逮

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命令。随后决定组成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事件。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释放，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中央局**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任宣传部部长，张浩（林育英）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办事处），为西北苏区的最高政府机关。主席秦邦宪，财政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长邓发，土地部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部长蔡树藩（蔡乾），工农检查局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部长邓振珣。

**中共中央决定西北苏区设立两个省三个特区** 1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设陕甘、陕北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驻地下寺湾；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驻地瓦窑堡；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后因谢唯俊被叛匪杀害，三边特委未成立）。两个省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

**中共西北中央局号召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11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号召各级党委立即开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

**直罗镇大捷** 11月21日至2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在邠县（今富县）直罗镇地区歼灭进犯苏区的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九师及一〇六师一个团，毙俘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5300余名，缴获各种枪3500余支，彻底粉碎敌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中共中央整编西北红军**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将原陕北和陕甘边的地方革命武装整编组建为三个军和两个独立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关中独立师师长白志文。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

## 1936年

**红军东征** 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红军东征，开通抗日前进道路。

**陕西省开展扩大红军运动** 1月底以前扩大红军6200名，3月扩大6000多名，4月至7月再扩大5700名，超额完成任务。

**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和指示** 1月19日，西北办事处作出决定，确定农民分得的土地所有权。在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区域进行土地登记，发给农民土地证，农民所有的土地可以自由出租、转卖耕种、经营。3月8日，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分给其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不没收各种小业主、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富农、大农业企业主的土地；取消高利贷。4月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示》。指出按照过去政策没收分配了的富农财产仍归分得者所有，富农不能翻案；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按中共中央对富农的新政策执行。

**陕西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 3月10日至15日，陕西省举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329人。马明方，艾楚南等49人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16日，第一次执委会推举13人组成主席团，马明方为主席，霍维德为副主席。

**中共中央及陕西省各界追悼刘志丹** 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24日，中共中央及陕西省各界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秦邦宪先后致词。



**红军西征** 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以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及红二十八军等共 1.5 万余人。5 月 18 日，中央军委下达西征命令，19 日，主力部队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8 月 30 日，彭德怀发出《关于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西征战斗任务之一，要依靠部队方面的各种工作及广泛的群众路线争取国民党军到抗日战线上来。西征消灭马鸿宾部三个团以上的兵力，解放宁条梁、定边、盐池、豫旺、环县、曲子、华池、固原等地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区域扩大到纵横七百余华里。

**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省**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省，辖保安（今志丹）、靖边、安边、定边、庆北、华池等县，并向西发展。6 月，中共陕甘宁省委正式成立，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部长李一氓，军事部部长肖劲光，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青年部部长陈时夫，妇女部部长李学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陕甘宁省委归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办事处领导。

**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纪念西北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移驻志丹县城** 7 月 3 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由瓦窑堡移驻志丹县城。12 月 2 日，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直属机关人员到达志丹县城。

**毛泽东、朱德指示剿匪工作方针** 7月6日，毛泽东、朱德就剿匪问题向陕甘宁省发出指示信。指出剿匪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以军事力量打击，同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分化、改造，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西北苏区** 7月15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志丹县城。16日、17日同毛泽东会谈，并与周恩来、谢觉哉、林伯渠、肖劲光等多次会谈，他到红军部队采访，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作了陕北之行的报道，后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10月中旬，埃德加·斯诺离开西北苏区。

**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哥老会的工作方针**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哥老会的指示》。指出争取哥老会的具体方针是：推动与吸引其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在会中发扬其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其保守、迷信、封建、反动的思想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与革命的发展趋势；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

**中共定边工委成立** 9月22日，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组成，书记李维汉，委员宋任穷、宋时轮、高岗、贾拓夫。因情况变化，不久撤销。

**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三边特委** 10月，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重建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组织部部长朱协辉、宣传部部长贺级三、军事部部长高岗、白区工作部部长秦力生。辖靖边、安边、定边、盐池四个县委。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0月8日和22日，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分别与二、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对进犯山城堡之国民党军实行自卫还击** 11月21日，红军对进犯苏区山城堡之国民党军一个师实行自卫还击，激战一昼夜，全歼其一个旅又两个团，并击溃进至惠安堡之国民党军两个师。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同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宗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全国。应张、杨邀请，1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 1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指示》。指出在陕北恢复的老苏区仍可恢复苏维埃政权，亦可经过抗日革命委员会的过渡时期；在关中恢复的区域及新区一律改变为抗日救国政府，过去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在恢复后仍恢复原先土地分配的情形；在友军撤退后红军接防的区域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宣传抗日纲领，发展商业，保护文教事业，建立党的组织。

## 1937年

**中共中央迁驻延安** 1月7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志丹县城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驻延安。

**延安召开抗日军人家属联欢会** 2月7日，延安召开

抗日军人家属联欢会，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将士家属参加了联欢会。朱德到会并讲话，号召抗日军人家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工作**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准备更名改制工作。

**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 3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改苏维埃制度为民主共和制度，改陕甘宁苏区为陕甘宁特区（不久改为边区），特区府为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方政府。

**陕西省青年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开** 4月7日至9日，陕西省举行青年抗日救国代表大会，12个县的二百余名代表出席。会议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和今后的方针任务，选举产生了陕西省青年救国会。

**西北青救会在延安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三百余名，河北、山西及东北的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林伯渠、徐特立等到会讲话。会议选举执行委员55名、常务委员8名，冯文彬为主任，成立西北青年救国会。“七七”事变后，该会迁至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大会确定，陕



甘宁边区党的总方针是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

**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210余名，列席代表74名。会议选举产生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区党委），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建贞、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为执委，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为候补执委。17日，第一次执委会议选举郭洪涛为书记，确定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部长，李建贞任妇女部部长。边区党委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省委逐步撤销（中共陕甘宁省委已于3月撤销），各级党组织按照边区党委的党组织选举条例，自上而下实行选举，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

**边区党委公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 6月20日，边区党委公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16条。主要包括：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现民主普选制度与议会政治，发扬苏维埃时期实行的各种民主设施；加强人民的抗日武装组织；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

**中共中央号召全面动员抗日**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郊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

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朱德就剿匪问题发出训令** 7月7日，毛泽东、朱德就剿匪问题给各兵团及地方政治机关发出训令。边区原有土匪大小43股共2600余人，经五六两个月的清剿，消灭打散驱逐出境31股2100余人。训令要求对尚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8股500余人枪的土匪，深入开展地方工作，发动和依靠群众，彻底予以肃清。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 7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司法部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谢觉哉任院长。中央司法部是2月13日成立的，于3月10日至15日召开省、县裁判长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司法工作任务。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 8月12日，由中国女作家丁玲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等人发起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为主任，成员有男女青年30余人。15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欢送该团赴前线的晚会上讲话指出：战地服务是一件大工作，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要用自己的笔和口来与日本侵略者战斗。9月22日，该团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活动，1938年7月22日回到延安。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发布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及留陕北各部驻防地的决定。任命朱德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

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留陕北的部队，一一五师的炮兵营和辎重营驻防鄜县、甘泉一带；一二〇师的特务营驻防靖边、横山一带，辎重营和炮兵营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一二九师的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确定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延安、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属东地区留守处，留守处主任陈伯钧，副主任陈先瑞，驻洛川；定边、环县、庆阳、合水、正宁、彬县（今旬邑）、淳化等县属西地区留守处，留守处主任王宏坤，副主任王维舟，驻正宁。同日，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将赤卫军改为抗日自卫军，要求自卫军配合武装部队做好抗战和边区保安工作。

**边区党委决定改造贫农团** 8月27日，边区党委作出《关于贫农团改造的决定》。将原来的贫农团（或农民委员会）改为农民会，吸收中农、富农加入，使其成为广大农民的组织，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陕北公学成立** 9月1日，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六人发起的陕北公学筹备处成立。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开学，校长为成仿吾。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目前的时局》的讲演，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号召实现全民族抗战。1938年7月7日，设立关中分校。1939年3月，总校迁至关中与分校合并。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9月6日，西北办事处正式改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下辖23个县（市），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12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重新划分边区行政区域，取消陕北东、西两个地区的区划，其所属各县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并对县制划分、各县所辖区、乡数目作了新规定。2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示在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的民选政府，并对管辖范围、机构设置、经费、保安队编制等项，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

**边区妇联筹备委员会成立** 9月12日，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延安建立，主任李健贞。26日，边区党委发出《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规定乡以上的各界妇女联合会为不分阶级、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妇女组织。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 9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肖劲光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高岗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周兴为副司令，谭希林为参谋长。

**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逼婚杀人犯黄克功死刑** 10月10日，毛泽东就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公女学员刘茜事，致书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11日，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

**西北青救会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成立** 10月11日，



西北青救会举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泾阳斗口镇开学，主任冯文彬。1938年1月迁至泾阳安吴堡，称安吴青训班。到1940年4月，共举办14期，培训学员万余名。1940年5月2日又迁回延安。

**边区妇联和西北青救会发起为八路军募捐运动** 10月19日，边区妇联和西北青救会发起募捐8双手套和毛袜慰问八路军的运动。经过半年时间，超额完成任务。1938年10月，边区抗敌后援会响应朱德总司令的号召，再次发起募捐6万双毛袜和手套的劳军运动，两月内完成任务。

**“毛泽东指示边区进行直接抗战动员和准备工作** 10月23日，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发出关于边区各军进行直接抗战动员和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日军进占山西大同，正向太原及绥远、宁夏进攻，陕甘宁边区与日军进攻区域接近，即将成为直接抗战的区域，必须立即进行直接抗战的准备和动员。28日，毛泽东电告高双成等，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的通知，八路军即将到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接防，抗击日寇，随后即成立了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为司令员。11月，日军加紧进攻晋南，边区沿河各县七天内动员万余牲口，渡河支援山西前线运输。15日，边区党委发出指示，号召群众加紧各种战备工作，按时完成1.5万石抗日救国公粮的征收任务。

**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 11月14日，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在延安举行。张闻天作《十年来文化运动的

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报告，指出今后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大会选举成仿吾、周扬等为文协的负责人。1936年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至此结束。

**中共中央调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员**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

## 1938年

**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 1月29日，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毛齐华、马豫章等21人为执委。2月中旬，第一次执委会推选毛齐华、史秀云、崔田夫等11人为常务委员，毛齐华为主任。随后各县相继成立抗敌后援会。

**沈鸿抵延安** 2月，工业专家沈鸿同七名技术人员，携带工作“母机”十部和一批科技书籍从武汉抵达延安，参加边区的抗战工业建设。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号召人民准备实行长期抗战** 3月3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名发出《告民众书》。号召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加强战勤工作，防奸防特，动员所有力量，准备实行长期抗战。

**边区举行第一次妇代会** 3月8日，边区第一次妇代会在延安举行，130多名代表出席。毛泽东到会并讲话，指出妇女运动应和整个民族抗战动员运动结合起来。会议选举产生了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15人当选为执委，史

秀云为主任。

**边区抗敌电影社发起人会议召开** 3月28日，边区抗敌电影社发起人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确定了工作总方向，推选高朗山（主任）、沙可夫、曹菊如等七人组织筹备委员会。7月7日，延安电影团由徐肖冰、袁牧之、吴印咸等六人组成，由谭政领导。1942年拍摄了《南泥湾》及《白求恩大夫》影片，1945年拍摄了党的“七大”影片，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张国焘叛逃** 4月3日，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从中部县（今黄陵县）叛逃至西安。17日逃往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29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张国焘的边区政府委员兼代主席职务。

**白求恩抵延安** 4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医生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美国的进步医疗工作者组成的医疗队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及边区各界的欢迎。不久，医疗队转赴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医疗工作。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 4月10日，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发起的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沙可夫兼院长。1939年11月28日，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后任院长）。1940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到1945年11月毕业学员共685名。

**边区举行第一次国防教育代表大会** 4月11日至14日，边区国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40余名。毛泽东、张闻天等到会讲话。毛泽东说：“目前

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会议推举执委 29 名，成仿吾、邵式平、罗瑞卿等 11 人为常委，组成国防教育会。

**边区举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4 月 17 日至 23 日，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 226 名，代表全边区 2.4 万工会会员。香港海员工会等边区以外工会组织亦派代表参加。刘少奇作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和普及》的报告。毛泽东到会作统一战线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讲演。会议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37 人当选为执委。24 日，第一次执委会推选常委九名，主任毛齐华。

**马列学院成立** 5 月 5 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张闻天兼院长。

**中共中央调整边区党委负责人** 5 月，中共中央决定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

**边区政府布告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5 月 15 日边区政府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号召群众防制少数顽固派和匪特对边区的破坏活动。

**世界学联代表抵延安** 6 月 29 日，世界学联代表柯尔曼、雅德、傅洛德、雷克难抵延安。受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代表及各界群众欢迎。7 月 2 日，毛泽东接见时回答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及有关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等问题。代表们参观各机关团体学校后于 7 月 4



日离延。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边区举行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 10月2日至7日，边区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代表204名，代表边区16万青年。贺龙、高岗、王观澜、林伯渠等到会讲话。大会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29人当选为执委，高朗山为主任。

**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10月10日，西北第二次青救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代表共314名。毛泽东、朱德、林伯渠、陈云、徐特立等到会讲话。大会号召“全国青年武装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

**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延安** 11月20日、21日，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共30余架次，投弹159枚，延安损失严重。此后敌机又多次轰炸延安、延长。12月14日，边区14个群众团体致函全国同胞，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延安的罪行。

**国民党顽固派在庆阳地区制造摩擦** 12月，国民党军一六五师侵入八路军防区庆阳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

实行军事压迫，甘肃陇东行政督察区专员钟竞成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不断进行挑衅，阻止八路军购粮、募补，并杀害八路军员兵。奉中共中央之命，谢觉哉持毛泽东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亲笔信，经西安赴陇东，在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飏协助下，与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斗争。

## 1939年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 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到会议员145名。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会议并讲话。林伯渠作《两年来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边区今后工作总方针及应努力完成的具体任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边区选举条例、政府组织条例、各级议会组织条例、土地条例、婚姻条例等单行法规。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王观澜、高述先为参议会常驻议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相、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区政府委员；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2月4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演，指出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一切从事抗战建国事业的人所愿意接受和实行的，批驳了取消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错误论点，指出应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

• 则，对付那些专搞摩擦的人。

**边区举办首届农业展览会** 1月，边区首届农业展览会在延安举办。展品二千多种，展示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状况。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演指出：“我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定能战胜敌人。”

**延安党政军机关开展生产运动**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大会发动生产运动。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指出生产和学习是全党和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要广泛地开展生产运动。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作《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出1939年生产运动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2月，边区政府成立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总生产委员会。3月17日，中央财政经济部发出关于生产突击运动的通知，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春耕期间突击开荒种地。6月21日，边区一级第一阶段生产总结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生产运动全边区机关、学校所开的11.2万亩荒地，共收获粗粮一万多石、蔬菜约120万斤，解决了两万人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蔬菜肉食部分自给，马草自给一半。

**边区政府召开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并宣布各厅局主要负责人** 2月6日至8日，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对政府施政方针、国防建设、国防教育、肃清土匪、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社会救济等问题作出实施决定。并宣布了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负责

人：民政厅厅长高自立（兼），财政厅厅长张慕尧（代），教育厅厅长周扬，建设厅厅长刘景范，秘书长曹力如，保安处处长周兴，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粮食局局长曹胜祥，审计室主任曹力如（兼）。

**《新中华报》改刊** 2月7日，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机关报。

**印度援华医疗队抵延安** 2月12日，由爱德、卓克、柯棣、木克、巴苏五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延安，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妇委指示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 3月3日，中共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确定动员与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工作，坚持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8日，边区妇联召开直属县妇联主任会议，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张闻天等出席并讲话。会议确定今后妇女工作的总方向是深入广大农村，唤起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工作。

**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不断挑衅** 3月初到5月，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不断挑衅，制造多起严重摩擦事件，无故伏击、拘留我八路军战士和工作人员，以至发展到残杀我八路军残废军人。5月24日，驻柞邑的八路军残废院军人陈通外出被当地保安队杀害，该院20多名代表前往柞邑县政府请愿又被全部枪杀；同时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团千余人会同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一营围攻八路军驻防部队独一营和荣军排，独一营撤出柞邑县城时又有17名伤残军人被残杀。这些严重摩擦事件都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多次致电蒋介石、程潜、朱绍良、蒋鼎文等人，揭露反共摩擦分子的罪恶行径。

**边区积极开展青运工作** 3月18日，西北青救会常委会决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由全国各地青年团体共同组织的中国青年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青联”）召开第一届执委会，选举冯文彬为主席，李昌为副主席兼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5月4日，延安召开纪念“五四”20周年及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边区举办首届工业展览会** 5月1日至12日，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办。展出手工业、矿业、机械工业等方面产品2460件，反映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实绩。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阐述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项建设，指出抗日与建设新中国是目前的两大任务。会议评出团体特等奖5个、一等奖37个、二等奖67个，劳动英雄50多名。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 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成仿吾、周扬、肖三、丁玲等为理事，艾思奇为主任。

**边区军民打退日军进攻** 6月初，日军集一师团以上

兵力向晋西进犯，万余人一度占领柳林、军渡一带，并以大炮、飞机轰炸西岸宋家川等地，沿河侦察渡口，企图渡河进攻边区，河防形势急剧紧张。边区党委于7月7日发出《纪念抗战两周年告全边区民众书》，要求边区军民加紧保卫边区的战斗准备，粉碎投降妥协阴谋，迎接日军新的进攻。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军委急调三五九旅由恒山开赴绥米葭吴清地区以加强军事力量。在边区军民坚决阻击与晋西北军民的配合下，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保卫了河防。

**抗大迁校** 7月10日，抗大由延安迁往晋冀豫边区，并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淮北、苏北、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分校。抗大在陕北三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名，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中国女子大学成立** 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成立，校长王明。毛泽东、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边区农业学校成立** 7月23日，边区农校于延安南三十里铺举行开学典礼。林伯渠、刘景范及各界代表参加，学员皆为各县原来的区级干部，朱开铨为校长。

**边区政府禁止妇女缠足** 8月7日，边区政府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18岁以下的妇女一律禁止缠足，已缠足者一律放足，违者追究其家长责任并给以处罚。

**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8月13

日至 14 日，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王明、康生、邓发、张鼎丞到会并讲话。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

**边区党委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 9 月 21 日，边区党委组织部发出《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强调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纪律，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12 月 21 日，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大胆吸收各方面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为建设边区和抗战服务。

**边区师范学校成立** 9 月 22 日，鲁迅师范学校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周扬兼任校长，董纯才任副校长。

**李富春发表《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 9 月 30 日，李富春的《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在《解放》周刊发表。文中指出：截至 8 月底，全边区共开荒 105.5 万多亩，超过原计划的 75%，兴修水利 5490 多亩，植树 139 万余株，羊扩大到 101 万多只，牛扩大到 13.7 万多头，建立合作社 121 处。到年底统计，边区共有耕地 1004 万亩，粮食 175 万石，羊 117 万只，牛驴 28 万头，工农各业得到长足发展。

**边区合作总社成立** 10 月 5 日至 21 日，边区合作总

社成立大会在延安举行。各县代表及来宾 150 多人参加。会议检查了各县两年来的工作，组成以李会友为主席的理事会和以常荫奎为主席的监事会。

**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17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与会代表 170 名。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党代会以来两年半的工作，决定了边区继续抗战动员、加强锄奸保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等八项任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向边区各级党组织提出“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会议通过《大会总决议》、《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等。发出告边区全体党员书及告全边区民众书。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会，高岗任书记。并选举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延安军民集会隆重追悼白求恩** 12 月 1 日，延安军民集会隆重追悼白求恩大夫。毛泽东写了“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的挽联。白求恩大夫是 1939 年 11 月 12 日在华北抗日前线因医治伤员中毒逝世。12 月 21 日，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八路军军医处将八路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摩擦** 12 月 10 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五七八团配合庆阳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



宁县的二营，进占宁县县城。合水县县长率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三五八旅直属队，配合进攻宁县。14日夜，九十七师步炮兵约千人配合数县保安队，围攻八路军驻镇原县城内的三营，16日，进占镇原县城，并公开宣布系奉上级命令进攻边区，消灭八路军。同时在环县等地抢劫烧杀，增兵邠县（今彬县）、枸邑等县，企图大举进攻边区的关中分区，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多次致电蒋介石、程潜、朱绍良，说明事件真相，要求严令禁止。25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林伯渠、高岗、肖劲光等联名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主持公道，惩办肇事魁首，取缔反共邪说，制止反共军事行动。

**边区党委和政府颁布税收条例** 12月28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税收条例》。决定从1940年起加征食盐、营业税，举办油类、牲畜、皮毛、药材、烟酒及迷信品出入境税，以调剂抗战时期金融，发展边区经济。

## 1940年

**边区文化协会举行首次代表大会** 1月4日至12日，边区文化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123名各界知名文化人士和107个文化团体的273位代表参加。吴玉章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大会通过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国民文化促进会等议案。选举成立边区文化协会，主任吴玉章，

副主任艾思奇、丁玲。

**中共中央向南方局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 1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向南方局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电文的主要内容是：一、陕甘宁边区的23县，原为蒋介石所承认，少一县不行，非23县不足保障八路军后方之巩固。23县范围是：甘肃的庆阳、合水、环县；宁夏的盐池；陕西的邠县、甘泉、延安、安塞、安定、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神木、府谷、榆林、横山、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宁县各有一部分原为苏区仍应包括在边区范围内。二、边区名称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委员会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主席林伯渠。三、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20万元。四、已回边区的三五九旅不能撤出，另要求国民党同意再调八路军两个旅到邠县、洛川、淳化、枸邑、庆阳、合水一带驻防，以巩固边区。五、国民党原在边区的行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一律撤退。六、撤除包围边区和阻挡边区周围交通的国民党军队。

**边区举办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 2月2日，边区第二届工业、农业展览会在延安闭幕。展览会是1月16日开幕的。毛泽东、王明、吴玉章、林伯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展览会展品六千多件，受奖千件，受奖劳动英雄三千多人。

**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 2月5日，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各机关学校代表和自然科学界共千

余人参加。毛泽东到会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大会推举执委 35 名，吴玉章为会长。

**毛泽东对边区妇女工作作出指示** 2月8日，毛泽东复函中央妇委，对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作出指示。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就可以逐渐同意了，离开了这一点就很勉强。”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军政首长和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各部队结合自己的条件，陆续开展了生产运动。5月，朱德制定部队屯田政策，踏勘确定南泥湾为三五九旅的垦区。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 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吴玉章报告成立宪政促进会的意义和它的任务。毛泽东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话。大会通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推举毛泽东等 47 人为理事，吴玉章为理事长。

**日军进犯晋西北及陕北河防** 2月23日，日军 1.2 万余人六路进犯晋西北及陕北河防。3月4日，边区党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工作战时化，紧急动员起来，

迎击日军进攻，保卫边区。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及一一五师陈伯钧支队配合山西新军二、四纵队及工卫队暂一师苦战月余，歼敌 1100 多名，俘虏 200 多名，克复岚县、临县、方山及 11 个市镇，粉碎了敌人春季第一次进攻。

**边区人民驱逐反动专员何绍南** 2月，国民党政府委任的陕西绥德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集中 13 个保安中队企图偷袭当地八路军驻军，阴谋未能得逞。何在任内私贩大烟、白银，贪污公款数十万元，并在河防吃紧时擅离职守。地方各界人士极为愤慨，不断联名控告。15日，林伯渠、肖劲光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何绍南，委任王震为专员，并收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行政隶属边区，以利保卫河防。29日夜，何绍南率部分保安队逃跑。

**绥德等地试行“三三制”政权**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遵照中央指示精神，首先在新归属的绥德、郃县、陇东等地试行“三三制”政权。陇东采取聘请非党人士参加的方式，先后建立了各县临时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

**《边区群众报》创刊** 3月25日，由大众读物社主办的《边区群众报》在延安创刊。主编胡绩伟。毛泽东为该报题写了报名。

**边区政府优待移民和难民** 3月，边区政府先后几次颁布优待移民与难民的决定和布告。宣布移民难民开垦的



荒地三年不交纳公粮，其中公荒可取得土地所有权，私荒三年不交地租，第一年免除义务劳动；同时，政府尽力帮助解决其生活、生产等困难。这一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量移民难民，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仅 1941、1942 两年，边区共安置移民难民共 12900 多人，成为生产运动中一支劳动大军。

**光华农场建立** 3 月，光华农场在延安西郊杜甫川筹建。1941 年边区农业学校并入光华农场，称农业试验场。试验场荟集一批优秀专家，实行生产、试验、推广三结合，成为边区农业技术改革的尖兵。

**南洋侨领陈嘉庚抵延安** 5 月 31 日，南洋侨领陈嘉庚应毛泽东、王明、吴玉章邀请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在延安参观期间，会见了各界人士，与毛泽东、朱德多次晤谈。6 月 7 日，延安举行盛大欢送会。8 日，陈嘉庚一行离延赴第二战区。

**边区国医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6 月 10 日至 29 日，边区国医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了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问题，通过国医研究会会章及宣言。边区国医研究会成立。

**边区政府赈济灾民** 6 月下旬至 7 月初，安塞、华池、庆阳、志丹、郃县遭冰雹袭击，延长、甘泉、合水遭暴雨的袭击，灾情之重为几十年来所未有。边区党委号召开展“一两米”运动，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响应，人人节省粮食、捐献救灾。9 月，边区政府拨粮 990 石，款 8 万多元，赈济灾民。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 7月7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这个同盟是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由在延日本士兵森健、高山进等创建的，通过各种形式向日军士兵开展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

**边区政府命令庆环分区合并于陇东分区** 7月11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将庆环分区并于陇东分区，任命马锡五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

**边区保安司令部在延安召开军事会议** 7月21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军事会议在延安召开。陇东、绥德、三边、延属、关中五个军分区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参加。毛泽东到会并讲话。会议研究了在统一战线时期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必须紧紧把握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等问题。

**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 8月13日至9月2日，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在延安举行。晋西北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张闻天、徐特立等到会并讲话，强调在教育工作上要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提高教育质量，大量培养师资，提高小学教员的地位和待遇，解决教材困难。会议修改和草就了小学法、小学规程、实施义务教育暂行条例、民教馆组织条例等法规。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 9月5日，留延华侨大会召开。到会的有新加坡、爪哇、美、法、英等地归侨170多人。王明、张闻天等参加。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华侨是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延安华侨应起核心作用，以推动全

世界千余万华侨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会上宣布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发出开秋荒 20 万亩通知** 9 月 19 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发出开垦秋荒 20 万亩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民学努力从事经济建设，立即动员群众开荒，完成全年开荒任务，增加粮食产量，支援长期抗战。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 10 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以下简称边区中央局）按照中央政治局 9 月 11 日会议决定，由边区党委改组成立。高岗为书记，肖劲光、谢觉哉等为成员。

**边区首次回民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10 月 7 日，边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边区各地回民代表及在延安全体回民、各机关代表千余人出席。朱德、张闻天等到会并讲话。大会宣布成立回民文化促进会，选举高岗、林伯渠、延安马阿訇、定边马阿訇等 30 多人为理事，谢觉哉为会长；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鲜维俊为主任。会议讨论了争取回民在全国的平等权利与抗日团结，边区回民的任务等问题。同日，延安清真寺在青年文化沟落成，朱德、高自立、谢觉哉等参加落成典礼并讲话。1941 年春，关中、陇东、三边各分区相继成立回协支会。

**边区政府调整部门负责人** 10 月 12 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谢觉哉任秘书长，高自立兼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兼民政厅厅长，谭生彬任粮食局局长，曹菊如任建设厅副

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

**边区中央局发出开展经济建设的决定** 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实行强有力的领导，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23日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要求边区财经工作执行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政策，即发展边区国民经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使经济与财政相适应。

**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 11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停发八路军军饷（实际上10月份也只发给一部分）30日，朱德、彭德怀发出通电，质问何应钦，“八路军经费特少，而今停发，不啻置我军于死地。”呼吁全国各界主持公道，仗义执言。

**边区中央局召开生产动员大会** 10月3日，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召开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林伯渠作报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边区1941年自给自足的计划和任务。朱德在讲话中要求发展边区的各种生产，建立生产合作社。张闻天在讲话中阐述了经济工作中集中与分散、公与私以及学会做生意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会议宣布中央、边区和军队机关分别成立财政经济组织，邓洁、曹力如和叶季壮负责。9日，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各分区、县、区、乡的党政军（保安部队除外）民教等机关工作人员。1941年除粮食和三个月生活费由政府供给外，其余一切经费实行自给。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 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首次播音。每天播音两小时，主要是广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文告及国内外新闻。

## 1941年

**皖南事变发生** 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 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2月，顽固派一面组织所谓“军委会游击军”袭击驻葭县、米脂的八路军，一面捏造延安已组织南进司令部要进攻西安等谣言蛊惑人心。23日，胡宗南电令九十军军长李文侦察延安、延长、延川、安塞、甘泉地形，企图对边区发动突然进攻。27日，胡宗南西安办事处处长汪震面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公然声称将增兵榆林。3月1日，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应严正提出要求国民党最高当局立即制止胡宗南的非法行径。

**边区加强保育工作** 1月12日，中共中央妇委在延安召开保育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儿童教育委员会、儿童家长会等组织。21日，边区政府公布保育儿童的决定。此后民政厅制定保育工作条例，开办保育员训练班。推动了各县儿童保育工作的发展。

**边区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 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发行边区货币，禁止国民政府的法币在边区

流通。30日，边区政府颁布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布告。2月18日，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一元、五元、十元的边币在边区境内流通。22日，边区政府向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发出训令，要求采取得力措施使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通货单位。此后，边区政府财政厅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条例、规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巩固边区金融，实现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边区经济，保障改善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

**边区开展“三三制”的选举活动** 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就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同日，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造和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聘请党政军民各界人士组成边区选举委员会，乔钟灵为主任委员。县、乡均成立了选举委员会，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其中绥德、延川、清涧达95%左右。全边区选出各级参议会议员三万余名，县、乡两级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

**边区政府发布本年经济建设计划** 2月20日，边区政府发布《1941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计划》。规定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是由半自给的地位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位，摆脱对外的依赖性，以适应抗战的民生的需要，打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边区政府发行建设救国公债** 2月20日，边区政府决定4月份发行建设救国公债500万元。3月22日，边区政府向各分区、县发出指示信，要求认真做好建设救国公债的宣传和发行工作。干部群众踊跃认购，超额100多

万元完成原定的发行任务。

**边区贸易总局成立** 2月22日，边区贸易总局在延安成立，局长朱理治。其主要任务是调剂边区之外的贸易，保护边区之内的贸易自由与流通发展，调剂商品，平抑物价，安定民生，发展商业。

**边区政府确定财政税收基本原则** 3月17日，边区政府委员会议讨论税收问题。确定新民主主义财政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一、在顾及人民生活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税收，保证供给抗战需要；二、防止非必需品的输入，保护富余土产品的输出；三、人民的纳税负担应普遍而合理。

**延安公营工厂开展“五一”生产大竞赛** 3月25日至4月25日，延安公营工厂职工开展竞赛日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通过群众性的竞赛活动，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平均产量超过原计划的43%，产品质量、工人技术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274名生产竞赛优胜者、劳动英雄、技术改革者在“五一”纪念大会上受到奖励。

**边区加强和发展教育工作** 3月30日，边区政府公布1941年教育工作计划。主要内容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充实教育设施与内容；建立教育界的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开展边区教育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发展与充实师范教育。

**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屯垦** 3月，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之后边区其他部队一致响应，实

行军垦屯田，开辟了各自的“南泥湾”。

**边区施政纲领公布**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亦称“五一施政纲领”）的指示。28日，毛泽东致函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要求边区各级党组织切实遵照实施边区施政纲领，并在边区境内外及海外华侨中进行广泛宣传。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由边区中央局颁布。施政纲领内容共21条，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各方面的施政方针和基本政策。

**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以下简称西北局），统一西北工作的领导。高岗、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6月7日，西北局常委会议确定分工：高岗任书记，谢觉哉任副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部长，李卓然任宣传部部长，高岗兼统战部部长，贾拓夫任民运部部长，任作民任秘书长，高长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高朗山任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白茜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崔田夫任党务委员会书记。

**《解放日报》创刊** 5月16日，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秦邦宪任社长。

**边区广泛动员运销食盐** 5月18日，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食盐是边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运销食盐是增加边区外汇收入，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



措施之一。决定指出运销食盐是党与边区人民迫切的中心任务。边区政府成立了以高岗为主任的食盐督运委员会，委任阎红彦、习仲勋、王维舟、贺晋年、王震为督导运输食盐的各路司令，全年运销食盐约30万驮（每驮150市斤）。1942年完成33万驮，1943年完成38万驮。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边区部队生产指示** 5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出部队的生产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联系起来，以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党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

**日本工农学校成立** 5月，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中日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这是一所教育日本反战士兵的学校。此后相继建立了晋西北、山东、华中、鲁中、鲁南、渤海等分校。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分设民委** 7月，西北局设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贾拓夫，委员有李卓然、杨一木、刘春、朱侠夫、鲜维俊、刘瑞森、赵通儒、刘英勇。8月11日，边区政府决定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通儒。

**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与政治部成立** 8月27日，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与政治部成立。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牛书申任政治部主任。

**延安大学成立** 8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公、

女大、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943年4月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大。1944年4月7日，西北局决定延大与行政学院合并，仍命名为延安大学，受边区政府直接领导。

**西北党校成立** 9月，陕甘宁边区党校更名为西北党校，习仲勋任校长。该校成为培养地方县区级和军队营连级干部的学校。

**边区司法会议召开** 10月7日至19日，边区司法会议在延安召开。各县裁判员及军法处、保安处、延大法学院等代表参加。林伯渠到会讲话，要求会议依据《十大纲领》、《五一施政纲领》检查工作，订出保护各抗日阶级利益的新法律，大量培训新司法人员，提高业务技能，改进审讯工作。雷经天作关于边区司法组织、工作制度、诉讼程序等问题的报告。会议起草了新的法律条例。

**民族学院成立** 经中共中央决定，民族学院10月10日在延安成立，由西北局领导。院长高岗，副院长高克林。

**聘请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 10月15日，西北局发出《关于聘请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的通知》。明确指出聘请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目的在于保证边区一级的民意机关和政府实行“三三制”，各县党委应指定专人将此决定传达给各有关非党人士。随即，边区政府聘请46位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 10月26日，东方

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东方各国和国内 18 个民族一百多位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朱德等到会并讲话。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举朱德、林伯渠等 37 人为执委，朱德为主席。会上，日本工农学校 35 名学员集体宣誓参加八路军。

**西北局召开高干会**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讲演。朱德作关于边区军事任务与军民关系等问题的讲话。林伯渠作关于边区财经政策问题的报告，指出财经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保证军需，保证抗战建国的需要，工作方针就是加紧农业生产，帮助私人发展工业，尤其是家庭纺织业。

**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 11 月 6 日至 21 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出席议员 193 名，候补议员 16 名。晋察冀、鲁西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和各界来宾 500 余人应邀参加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林伯渠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五一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施政纲领，通过李鼎铭等 11 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案及其他各类提案 380 件。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高岗为参议会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22 日，新当选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誓就职。

**精简整编政府机构和人员** 11 月 27 日，边区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整编委员会，刘景范任主任。12 月 3

日，边区政府训令各级政府必须坚决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并提出边区一级机关要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边区一级的整编工作于 1942 年 3 月基本结束，裁减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 1598 名，充实到基层或派出学习。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将干部以文化、政治、理论程度和工作经验等情况分为四类，分别规定了学习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方向，责成总政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及中直党委宣传科直接组织、检查、督导延安在职干部学习。

**延安党政军群机关举行生产动员大会** 12 月 15 日，延安党政军群机关举行 1942 年生产动员大会。朱德到会讲话指出，一切应以军事为第一，后方要努力生产解决军事上的给养问题。林伯渠报告 1941 年生产经验和 1942 年生产计划。李富春讲话号召大搞生产自给，渡过严重困难。大会决定 1942 年开荒 60 万亩，运盐 30 万驮，发展交通运输，平衡财政收支，实行统筹统支，发展贸易，稳定金融，保证军事供给。

**西北局作出 1942 年财经建设的决定** 12 月 25 日，西北局作出《关于 1942 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用全力贯彻以农业为第一、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解决财政困难的中心环节是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边区政府于 15 日公布了《1942 年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



**边区政府公布新的县市建制** 12月23日，边区政府公布新调整的边区县、市建制。将原23个县调整为28个县一个市，即：延安、延长、甘泉、安塞、志丹、鄜县、固临、延川、清涧、葭县、安定、绥德、靖边、神府、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定边、吴堡、盐池、庆阳、合水、镇原、曲子、华池、环县、米脂县和延安市。

## 1942年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1月4日至6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全国各省区、香港、南洋、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各界及少数民族青年二百余人到会。朱德、冯文彬、凯丰等讲了话，号召青年参军参战、参加生产，学习军事、技术知识。会议通过重要议案8件，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选举凯丰、冯文彬等19人为委员。

**陕甘宁与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成立** 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两个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任命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傅钟、甘泗淇兼政治部副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并入联防军政治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关于地租和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三个附件。规定实行减租减息以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

极性；实行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上述四个文件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期土地政策。10月10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减息的指示》，要求各地切实执行政府的减租减息法令。12月29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进一步确定地租限额。成立了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由刘景范负责。

**边区政府发布本年经济建设计划** 1月，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1942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规定：边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继续发展农工商业，提高生产，推广食盐运销，平衡出、入贸易，繁荣商业，便利交换，以适应抗战民生的需要，从经济上巩固提高边区，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贯彻以农业为主广泛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在“分散经营，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巩固发展公营经济，力争生产自给。

**教育厅制定本年教育工作计划** 1月，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规定本年教育的中心是：建立正规化教育制度；提高各级教育质量；继续推行新文字，扫除文盲。

**边区物资总局成立** 1月，边区政府将贸易总局与禁烟督察局合并成立物资总局。下设土产、盐业两个总公司及关中、陇东、绥德三个分局。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8日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12日，西北局宣传部发出指示，要求根据中央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有关决定、报告精神，改造宣传教育工作，深刻开展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在职干部教育居全部教育工作第一位，教育范围应包括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个内容。同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延安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的决定》，要求党政军民学各系统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整顿三风的指示精神，检查工作，改进作风。

**边区实行民办合作社政策** 2月2日至7日，边区合作指导局在延安召开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各直属县及绥德分区合作主任出席。会议总结推广南区合作社经验，确定以民办公助为方针发展扩大合作社，加强合作社与商业、工业及其他方面的联系，发展生产运输社。并确定当年发放股金360万元。到年底，边区已有各类合作社250个，股金达900万元，社员14万以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开展春耕运动** 2月6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要求集中一切力量，在二季度内完成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提出的全年开荒地40万亩，增产细粮20万石，植棉15万亩，种苜蓿5万亩的任务。

**边区文委成立** 2月12日，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主任吴玉章，聘请林伯渠、李鼎铭、贺连城、徐

特立、丁玲等 27 人为委员。3 月 5 日，文委召开会议，确定针对边区的需要培养地方文化干部，联系全国文化界，共同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方针。

**边区政府指示充实“三三制”政权** 3 月 6 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完善、充实“三三制”政权的指示。要求各县在三四两个月内开完第二次参议会。认真检查半年来的政府工作；各参议员提出的有实际内容的议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后，交政府认真执行；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自动退出，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县政府可酌量聘请一些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县参议员和县政府委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被调离或缺额时，以非党人士补充。6 月 12 日，西北局作出《关于“三三制”政权工作初步经验的总结》。

**边区政府减征公粮** 3 月 30 日，边区政府决定本年征收公粮 16 万石，比上年减少 20%；征公草 1600 万斤，比上年减少 40%。

**边区整理自卫军** 4 月 1 日，边区政府公布《重新整理自卫军工作的决定》。22 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自卫军为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接受各级政府领导，军事指挥属于各级保安司令部。5 月下旬，各分区、县开始整顿自卫军，同时健全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大队部、营部、连部的组织。各地在整健工作中形成党员带头参加自卫军、学习军事技术的热潮。

**边区政府召开第二次委员会** 4 月 6 日至 10 日，边



区政府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的决议》、《组织边区防疫委员会》以及民政、教育、司法等27项议案。决定本年政府工作的中心是安排好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厉行精兵简政。

**边区开展学习吴满有运动** 4月30日、5月5日，《解放日报》两次发表社论，表彰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勤劳致富后在各方面的先进模范事迹。林伯渠、李鼎铭通令号召全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学习吴满有的运动在边区迅速展开。

**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经边区政府批准，5月1日，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以纪念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之一谢子长。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5月2日、16日、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三次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中央有关负责人、各文艺团体负责人及文学艺术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3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边区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 5月11日，边区政府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代表开会讨论关于第二次精兵简政问题。决定由李富春、陈正人、叶剑英、谢觉哉、肖劲光、林伯渠、李鼎铭组成整编总委员会，统一领

导各系统整编工作，各系统设立分会。20日，边区政府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宣布精简政府机关人员二分之一，二百多名干部到县、区级以及其他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工作，并成立边区政府整编委员会。6月30日，边区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指出政府组织机构的原则是：“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明，合署办公”。这次精兵简政，边区政府所属全部人员减至11500人，其中各级政府及附属机关8200人，各中等学校及保小3200人。

### 中央决定统一陕甘宁与晋西北的军事指挥及财经工作

5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军下辖：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14日和19日，中央军委任命高岗为留守兵团政委，张经武为副司令员，方强为副政委。联防军司令部设在延安。同时，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吕振球为政委，袁任远为绥德警备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6月8日，中共中央确定联防军司令部的职权为，统一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区域的军事指挥、财政经济建设和加强党政军民关系。并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以林伯渠、贺龙、李鼎铭、续范亭、高岗、林枫、陈正人、牛荫冠、南汉宸、白如冰、徐向前、肖劲光、叶季壮、王震、王世

泰、高自立、朱理治、霍维德、李六如为委员，林伯渠为主任，贺龙为副主任，下设财经办事处，贺龙负责。10月，财经办事处正式对外工作。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成立** 6月23日，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人在反战同盟的基础上创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建立了支部。

**边区审判委员会成立** 7月17日，边区参议会批准设立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林伯渠为主任委员。8月22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边区审判委员会的职权为受理第三审案件。

**边区工青妇组织合并** 为实行精兵简政，8月10日，西北局提议边区总工会、青救会和妇联会合并，组成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统一民运政策与组织。9月2日，边区召开各地委、县委及群众团体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讨论整顿群众团体问题，决定统一区级以上工、青、妇等团体的工作机构。1943年5月13日，边区抗联在延安成立，精简干部，充实基层。

**中共中央确定边区工作方针**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人口方面着手，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的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国营为辅。平衡出、人口，只有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输为辅。党政军各方应着重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统一意志与行动，加强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边区政府党团应完全执行西北局的决定。

**边区举行首届运动会** 9月1日至6日，边区首届运动会在延安举行。朱德致开幕词。1388名运动员参加了球类、体操、武术、田径、军事等各项比赛。运动会期间举行了边区体育工作会议，决定成立边区体育总会，确定9月9日为体育节。

**边区准备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 9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精兵简政纲领（草案）》。指出：统一，少而精，提高效率是边区精兵简政的全部意义。脱离生产的部队不应超过边区人民总数的2%，脱产工作人员不应超过1%。

**西北局作出关于《解放日报》的决定** 9月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宣布《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同时又是西北局的机关报。

**边区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 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学习农具厂工人赵占魁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学习赵占魁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教育边区广大职工和促进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部队精简整编** 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为贯彻精兵简政，统一军事指挥，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



令部合并（对外称留守兵团司令部），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还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副政委高岗，参谋长张经武。方强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为参谋处处长。联防司令部于10月1日召开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整编工作会议。边区部队在西北局领导下开始精简，实行一元化领导。

**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出席，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到会旁听。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三、明确了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边区分设五个警备区** 11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发布命令：陕甘宁边区分设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警备区。

**边区政府确定1943年工作任务** 12月3日至9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三次委员会议，听取简政、整军、财经等专门报告，讨论通过《简政实施纲要》及其他法规条例。确定边区的任务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11日至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科长以上干部和在延安的政府委员出席，林伯渠就1943年的工作任务和方针作报告，对精

简、经济、教育、财政、司法、保安、乡政、干部、“三三制”等政策问题作了原则说明。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 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1935年九、十月间所进行的错误肃反，作了全面的复查和彻底的平反。

## 1943年

**西北局设立常委会和办公厅** 1月6日，西北局发出通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贾拓夫为西北局秘书长、杨清为副秘书长，并组成西北局办公厅；张秀山为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边区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 1月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15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运动月指示》，规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还颁布《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条例》。2月1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解放日报》发表贺龙撰写的《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社论。17日至23日，林伯渠率领边区党政民及延安、安塞县各界拥军慰劳团抵南泥湾慰问军队，垦区部队举行拥政爱民大会欢迎慰劳团。以后每年春节前后，边区都广泛开展拥军优属与拥政爱民活动。

**中共中央提出丰衣足食的号召** 1月8日，中共中央

在延安召开中央、军委各直属机关学校生产负责人会议。李富春作《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提出的1943年要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指出生产是本年各机关的中心任务之一，各系统要制订“丰衣足食”生产计划，组织临时生产委员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于9日和19日两次召开各单位主管生产的干部会议，响应中央号召，布置生产。之后，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纷纷举行生产动员大会，掀起新的生产热潮。

**边区政府发放农贷** 1月13日，边区政府决定发放农业贷款2080万元，主要发放对象为贫苦勤劳的农民。

**留守兵团各部制定生产计划** 1月17日，留守兵团召开生产筹备会议。徐向前要求各单位响应朱德提出的“屯田”号召，认真研究李富春8日的报告，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会后各部队普遍制定生产计划，陇东驻军计划年内把大风川变成“南泥湾”，三边驻军计划全年经费自给率达到80%以上。

**西北局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座谈，李鼎铭、柳湜、贺连城、李丹生、毕光斗等到会。贾拓夫介绍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李鼎铭等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座谈会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种座谈会应每两月举行一次。”

**边区进行第三次精简** 3月3日，边区政府命令颁布《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开始第三次精简。纲要规定简政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为目的，

1

强调加强乡政权为当务之急，要求把简政同整风学习联系起来，同检查工作结合进行。29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31日，边区政府会议决定精简区级以上机构，加强乡政权，裁并区以上机关百余处，精简区以上干部及杂务人员1200多名。

**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召开** 3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在延安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50多名党员文艺工作者出席。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陈云、秦邦宪、李卓然等到会并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工农兵中去，一面参加实际工作，一面体验生活、改造自己，为创作打好基础。会后，艾青、塞克、刘白羽、丁玲等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工作，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中央文委确定戏剧工作总方针** 3月22日，中共中央文委开会讨论戏剧工作总方针。会议确定各抗日根据地戏剧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为了指导各根据地的戏剧工作，首先要在陕甘宁边区具体执行这个方针，以便取得经验。决定中央文委与西北局文委联合成立戏剧工作委员会，周扬为主任，柯仲平、张庚、王震之、钟敬之为成员，加强对边区戏剧工作的指导。

**边区反特斗争扩大化**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0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两万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错误地将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扩大为各个机



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

**延安公祭刘志丹** 4月23日，延安各界万人公祭刘志丹。朱德、任弼时讲话，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将士向刘志丹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送了挽联。毛泽东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5月2日，志丹县城举行万人公葬刘志丹大会。

**欢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设宴欢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冈野进一行。日中两党负责人就争取两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讨论，双方深信，法西斯主义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合击下，必然被粉碎。后冈野进被任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

**制止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从5月开始，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师以上指挥官参加的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和原封锁边区的十多个师进驻洛川、宜君、耀县、三原、栒邑、淳化、邠县、平凉、固原等地，企图九路进攻边区。7月4日和6日，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8日，毛泽东电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召集民众会议，发动当地舆论，造成压倒反动气焰的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斗争。9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林伯渠、朱德、高岗、贺龙等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

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

**边区政府公布民刑事调解条例** 6月11日，边区政府公布民刑事调解条例。条例规定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十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边区举行首届劳模代表大会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 11月26日，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及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开幕。朱德、贺龙、彭德怀、高岗、林伯渠、李鼎铭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朱德号召把发展生产与保卫边区结合起来。出席劳动英雄大会的代表185名。会上交流生产经验15项，对以后农业、工业、合作事业、畜牧业及部队机关学校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展览会展出展品 6600 多件，反映生产过程的图表、照片 1980 多张，表明本年耕地面积扩大为 1338 万亩，粮食总产量 184 万石，棉花总产量 173 万斤，产盐 60 万驮，全边区的 32 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的占四分之一，改造好 4500 个“二流子”，安置移民 8000 户，部队开荒 21 万亩，合作社发展到 255 处，国营工厂百余家，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展览会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 25 名、甲等 34 名、乙等 8 名。16 日，两大盛会闭幕。林伯渠号召劳动英雄们回去后，要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生产运动中的旗帜，争取明年涌现出更多的劳动英雄，为实现“耕三余一”而努力。

**新设子洲县** 12 月 25 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将原绥西办事处自 1944 年 1 月 1 日起改为子洲县，以纪念革命烈士李子洲。

**边区政府部署 1944 年工作** 12 月 24 日至 1944 年 1 月 10 日，边区政府举行第四次委员会议。会议检查一年来施政工作，并确定 1944 年工作方针。李鼎铭在边区政府简政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已裁并减少了四分之一，政府直属机关从 35 个减至 22 个，边区干部比过去减少了 40%，基本达到了精简、统一、节约、效能、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林伯渠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为备荒和准备反攻创造更充实的条件，是边区 1944 年全部工作最主要的任务。

## 1944年

**甄别平反冤假错案** 1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进行甄别工作，分清是非，平反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的党政军群机关认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有组织有领导地甄别平反冤假错案，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边区改善司法工作** 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改善司法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县以上政府：一、讨论改善司法工作，拟定新的计划；二、清理监所人犯，检查监所工作；三、清理案件；四、总结审判经验；五、总结民事刑事调解经验。同时成立边区司法委员会，主任谢觉哉，委员有李维汉、李木庵、雷经天、唐洪澄等九人。3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专文，推广马锡五深入群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就地审判，群众参加，不拘形式的审判经验。6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要求普及调解工作方法，调解民事纠纷，增强农村和睦，节省劳力，发展生产。

**陈云任西北局委员主持西北财办工作** 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为西北局委员，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办事处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作关于边区工作的报告** 4月，任弼时在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关于1943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1944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报告。提出边区经济现阶段的两个基本特点，即：一、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二、国民经济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边区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 5月1日至25日，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到会代表203名。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发等到会讲话。大会确定为今后两年全面实现自给与提高质量而斗争的工业生产方向和任务，提出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学习赵占魁运动的新内容为革命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的统一，工厂企业化等重大原则和方针。奖励了李强、沈鸿、钱志道、陈振夏、赵占魁、袁广发、刘考生、申仲义等8名特等劳动英雄及73名甲等劳动英雄。

**边区加强群众防疫工作** 5月6日，西北局召集边区医药卫生工作负责人会议。蔡畅出席并讲话，提出要为边区群众解决“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入春以来，延安县数区传染病急剧流行，5月10日，边区政府成立以傅连璋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工作，并组织流动医疗队下乡扑灭疫病。6月30日，边区卫生动员大会在延安召开，

三千名群众参加，朱德、李鼎铭、蔡畅等到会并讲话，号召人民群众讲究卫生，医务工作者热心为群众服务，造成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做到人财两旺。会上奖励了70余名模范卫生工作者。

**西北局等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工程师、技师沈鸿、陈振夏、钱志道、林华等和管理干部50多人到会。陈云、邓发、贺龙、李鼎铭、贾拓夫、李强等出席。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中外记者团参观边区** 5月31日，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进入边区。先到陕北凉水崖，参观了固临、延长，6月6日到南泥湾受到三五九旅指战员的欢迎，9日到达延安。记者团在延安参观访问期间，党政军领导分别接见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边区军民紧急动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 四五月间，日本侵略军占领郑州、许昌，潼关吃紧。6月14日，延安军民四万多人集会，紧急动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16日，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西北局发布保卫西北联合训令。指出潼关危机，西安吃紧，民族危亡空前严重，保卫西安、陕西、西北已成为西北军民的天职，号召边区军民与共产党员紧急动员，协助友军、友区人民。

同心协力，支援前线。

**边区举行合作社联席会议** 6月27日至7月7日，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在延安举行。朱德到会并讲话，指出合作社要努力作到以生产为主，消费为辅。大会确定合作社的八项任务为：把棉花织成布；把铁打成农具；把边区的盐运出去；每区一个信用社；每区一个医药社；每社一个货郎担子；每社办夜校、冬学、识字组、黑板报；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大会通过《进一步发展合作社决议》，号召组织30万人参加纺织。还总结推广了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奖励了94名合作模范。7月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合作模范及会议代表。

**美军观察组抵驻延安** 7月22日，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率美军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由重庆到延安。8月7日，第二批人员到达。两批共18人。观察组多次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并参观了南泥湾三五九旅的训练和在绥德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观察组还分别到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参观。

**西北局作出关于工业品自给的决定** 7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在二、三年内完成工业品全部自给的任务，要求：一、各工业管理部门要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二、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三、提高工业品质量；四、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五、加强领导和坚持学习赵占魁运

动等。

**中直机关追悼张思德** 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作《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张思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5日在安塞县山中烧炭时牺牲。

**边区召开文教代表大会** 10月11日至11月16日，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与会代表450余名。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朱德、吴玉章、徐特立也到会并讲话。会议总结交流了1942年整风运动和1943年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通过了教育、卫生、艺术、报纸等工作的决议，提出今后五年至七年内文教工作的目标。李维汉作题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会上对先进集体和个人颁了奖。

**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在延安举行 12月4日至19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到会议员187名。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代表参加了会议。林伯渠作题为《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任弼时、刘伯承等到会并讲话。15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题为《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而只有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不论在



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都要为此目的而奋斗。李鼎铭作了关于文教工作方向的发言。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4项法规和35件提案。

**边区举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 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在延安召开。林伯渠致开幕词。1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13日，刘景范作《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总结。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等讲了话。会议选举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463名。

**边区举办建设展览会** 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5日，边区建设展览会在延安举行。展览会反映了一年来的边区财政经济、民政司法、文化教育、保安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开垦荒地100万亩；产粮200万石；植棉30万亩，收净花300万斤；造纸1.5万令。生产自给占财政总收入的69%，取之于民部分占30%。

**边区政府秘书处公布边区幅员** 边区政府秘书处就边区的幅员作出说明并对外公布。陕甘宁边区的面积共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划分为5个分区和31个市、县。即：延属分区、关中分区、陇东分区、三边分区、绥德分区，延安市、延安县、甘泉县、延长县、延川县、固临县、郃县、志丹县、子长县、淳耀县、赤水县、新正县、新宁县、庆阳县、合水县、镇原县、华池县、曲子县、环县、定边县、盐池县、靖边县、吴旗县、子洲县、绥德县、米脂县、葭县、吴堡县、清涧县、神府县。

## 1945年

**边区党政机关检查领导作风** 1月5日至9日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检查领导作风。会议认为区乡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其主要责任在上级，所以首先要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1月17日，边区政府办公厅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布置检查工作，李维汉讲话指出，检查工作应以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为中心。会后边区政府机关结合检查业务，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边区工妇青组织倡议建立解放区工妇青联合团体** 2月10日，边区总工会电邀各解放区工会代表赴延安组织解放区工会联合会筹备会，4月22日筹备会在延安正式成立，邓发为主任。3月8日，延安及在延各解放区妇女代表、模范工作者举行座谈会，通过由边区妇联召集成立解放区妇女筹备会的提议，6月20日筹备会在延安成立，蔡畅为主任。5月3日，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倡议的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在延安成立，冯文彬为主任。

**边区选举委员会成立** 2月28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讨论筹备选举工作。决定聘请党政军民和少数民族及劳动英雄代表11人，组成边区选举委员会，谢觉哉为主任，刘景范、甘泗淇、毕光斗等为委员。确定乡、县、边区三级的选举同时进行。

**延安文化界集会声援大后方文化运动** 3月28日，延安文化界百余人集会座谈大后方的文化运动。周恩来到

会讲话，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作了详细介绍，希望延安文化界努力工作，写出好作品，并将自己与工农兵结合的经验转告大后方文化界，作为他们“文化下乡”的参考。何其芳介绍了大后方文化界不屈不挠为抗战艰苦工作、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情况。4月7日，延安文化界致电重庆文化界，慰问在国民党高压下艰苦奋斗的大后方文化界。

**董必武赴美参加联合国旧金山会议** 4月12日，董必武代表各抗日根据地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员赴美出席于25日召开的联合国旧金山会议。董必武出国前在重庆中国民主同盟主持的送别茶话会上讲话称：联合政府是我们全体希望立即产生的，民主必须在中国实现，否则中国和中国人民将得不到自由。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到会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了121万党员。西北代表93名。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中共中央抽调陕甘宁边区大批干部支援抗日前线** 6月，中共中央陆续从边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地方干部，开赴晋西北及华北地区，帮助开辟新解放区。18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由陕甘宁边区出发南下，当进至河南

新安地区时，日本投降，受命开赴东北。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六人访问延安** 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2日，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欢迎会，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左舜生讲话。参政员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多次与他们晤谈，就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5日，参政员离延返渝。

**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成立** 7月13日，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延安举行。到会有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山东、华南等解放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等26个单位110名代表。毛泽东、朱德参加会议，林伯渠、周恩来分别报告筹备经过及选举等事宜。大会通过《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事项的决议》等议案。选举周恩来为筹委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为副主任，谢觉哉等25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向各地发了通电，宣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正式成立。8月1日，筹委会常委会通过《纲领起草计划的意见》，并成立起草委员会，周恩来、陈云等29人为委员。会上，还选举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董必武、李富春等15人为委员，主任董必武。

**边区军民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淳耀地区的进犯** 7月21日，国民党军队突然向淳耀县爷台山防地发起攻击。占领边区长100华里、宽20华里的地域。驻防八路军和地方武装部队扼守爷台山主峰阵地，展开爷台山保卫战。



23日，朱德、彭德怀电请蒋介石、胡宗南制止进攻边区的战争。24日，胡宗南集结兵力向淳化方面进攻。26日，朱德、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关向应等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及国民参政会，宣布淳化事件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回原防。八路军为顾全大局，主动撤出爷台山及以西41个村庄，但国民党军队节节进逼，向枸邑、耀县等地继续侵入。8月8日，边区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联防司令部关于反对内战、坚持自卫的原则，对国民党入侵之军队予以坚决还击，9日收复爷台山地区，11日将来犯国民党军队全部赶出边区，取得爷台山保卫战的胜利。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 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8月25日，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及克服内战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措施。

**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依靠美国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但蒋介石后来一手撕毁了这个纪要，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延安文艺工作团赴华北工作** 为了充实华北前线的革命文化力量，由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发起并与鲁迅艺术学院联合组成延安文艺工作团。8月24日，延安文化界举行欢送会。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到会讲话，勉励去前方的同志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鲁迅的方向，为更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延安文艺工作团共百余人分为两团，分别由舒群、艾青带领赴华北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延安各界隆重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9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人冒雨集会，庆祝抗战胜利。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鼎铭等到会。朱德讲话指出，现在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作者 =

页数 = 2 4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